

目 录

编辑说明

奈曼——辽西革命斗争中的一块红色

- 基地……………王枫 李海晨整理 (1)
- 奈曼旗蒙族青年与自治运动联合会……………杨晓春 (15)
- 陶铸同志在奈曼活动片断……………田爱军 (31)
- 在奈曼旗的土地改革工作……………李兴唐 (34)
- 解放战争时期奈曼旗的支前活动……………王吉祥 (40)
- 奇袭小西梁……………马德山 (52)
- 特殊的使命……………马德山 (55)
- 辽代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简介……………张 宇 (59)
- 历史上的鄂尔土板……………梁凤云 (86)
- 奈曼东部部分地区农垦的起源与发展……………杨晓春 (93)
- 八仙筒商业史料……………郑 记 (98)
- 工程庙泡子……………王文涛 嘎力僧扎木苏 (100)
- 叫来河……………王文涛 (103)
- 解放前奈曼旗教育概况……………涂献廷 王化中 高福德 (106)

我的教育生涯·····	王家驷口述	张斌整理	(123)
中兴印刷局的由来与 发展·····	刘贵民忆述	胡永平整理	(130)
宝石柱艺术成果录·····	王占山		(136)
蒙医学家占巴拉道尔吉与《蒙医正 典》·····	周惠民	乌力吉白音	(140)
奈曼旗鼠疫及防治概况·····	徐宝栋		(143)
奈曼旗四任王爷被削职的经过·····	希儒博		(150)
奈曼旗郡王玛什巴图尔传略·····	希儒博		(156)
年轻的扎萨克——苏珠克图巴图尔·····	希儒博		(161)
波日和硕庙及其末代葛根——舍冷旺布·····	金长岭		(167)

奈曼—辽西革命斗争中的一块红色基地

王 枫

解放战争初期，地处科尔沁草原西部边缘的奈曼旗，是辽吉省管辖的一个偏僻地区。十八万蒙汉各族人民，生活在这块八千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它被创建成革命斗争前线中的一块红色根据地。我辽吉省一地委及五地委路西分委和他们所属的部队，避开敌人锋芒，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休整练兵，积蓄力量和广大奈曼人民一起奋战，剿匪反霸，抗击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进攻，开展土地改革，把奈曼建成一块强大的反攻基地，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奈曼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立足奈曼 整顿队伍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我新四军三师独立旅十七团二个营和蒙骑二师一部，进军奈曼，击溃了盘踞在奈曼旗大沁他拉镇的张念祖部，于三月十六日建立了人民政府。四月份划归辽北省哲里木盟政府领导。根据中央关于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在奈曼旗委的领导下，迅速开展了除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陆续建立各级政权，使奈曼成为一块红色的解放区。

一九四六年九月，为了便于领导，西满分局决定把奈

曼、库伦划归一地委代管，使处于战争前线的一、五地委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军在辽西战场上发起猖狂进攻。

十月中旬，阜新、彰武、黑山、北镇等地被国民党占领，五地委的路西分委及所属的路西支队（三、四团），在分委书记赵龙和司令员孙兴华的带领下，经务欢池、旧庙、福兴地等处，先后于十一月份撤到奈曼旗大沁他拉镇。随同撤退的还有阜新县委、县大队、蒙民大队和所属各县的机关干部，以及被服厂、医疗队等后勤机关。除蒙民大队在奈曼略事休整，继续北上林东外，其余人均在奈曼驻扎下来。

与此同时，一地委在法库建立的根据地被国民党政府军占领。一地委和一分区，由法库撤到康平。不久，国民党政府又由郑家屯派出一个团的兵力，攻占了华子扬创建的康平县根据地。使我一地委和一分区不得不撤到由宋志霖任书记的科左前旗。但因这里靠近铁路线，地理条件不好，加之群众发动较晚，我军不便立足。最后，根据省委书记陶铸的建议，在一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和分区司令员田维扬带领下，一地委、一分区（十三团、十四团、十五团）及其所属的康平县、科左前旗、库伦旗干部三千余人，于一九四六年十月末，经库伦撤到大沁他拉镇。铁岭、法库、新民、昌图等四个县的干部，由于在撤退中和地委失掉联系，于是经中长线转战到白城子，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才由曾志带领到大沁他拉镇与地委会合。

由于奈曼旗是辽吉和热河省接壤的边缘地区，境内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国民党主力部队不易到达，周围地区虽然被国民党占领，但奈曼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是辽吉战争前线中的一个空隙。鉴于这种情况，省委决定把奈曼

建成一块后方基地，以便于我军休养生息，整顿队伍，蓄积反攻力量。我一地委和五地委路西分委于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到次年七月，会集了一万二千余人，在奈曼这块土地上站住了脚。立足奈曼，面向阜新、彰武、新立屯、康平、法库等辽西广大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他们驻扎下来以后，首先抓了统一思想，整顿队伍，由于大片的地区被国民党占领，我们丢掉了一些地盘，损失了一些人员和物资，整个战争处于敌进我退的局面。面对这种形势，在机关干部和部队中，出现了种种看法，甚至有少数人被国民党的气势汹汹所迷惑，产生悲观情绪，思想发生动摇，看不清革命的光明前途。为此，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十至十二月间，多次来奈曼，帮助一地委和路西分委进行整顿，提高广大干部和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一地委到达奈曼后，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大沁他拉镇召开了一、五地委委员、两个分区团以上干部和康平、科左前旗、阜新县委、库伦、奈曼等旗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由刘瑞森、赵龙轮流主持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全体与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前段工作进行全面总结，面对面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各种看法，交流了思想。特别是对一分区领导在撤退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不做任何抵抗，仓惶撤退的问题，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陶铸同志于十一月十二日作了《关于一分区工作总结报告》，在肯定了一分区前段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一地委和一分区在执行省委决议中犯了原则错误，主要要是对敌我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根据地建设抓的不紧，未能造成“狡兔三窟”，

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没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军事上，对主力部队的建设未能抓紧，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军队抓在手里不打仗，造成一分区的原有地盘全部丢失。对今后怎么办？陶铸同志提出了首先要树立信心，指出我们的社会基础占百分之九十，现在的敌人比过去也弱多了，一分区地区再加路西地区很辽阔，敌人兵力空虚，要有信心坚持奈曼地区，估计敌人会打一下，但各处驻根据点可能性是小的。今后一段工作的总方针是：“展开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游击根据地，打击土匪降队，以路西地区为基地，向东向南发展，缩小敌人占领区，扩大我之占领区”。具体安排是：“集中力量打土匪，很快向东发展。组织东进支队，先派骑兵过去打进去出来，再进去打个局面，而后再带游击队武工队进去和昌图吕北取得联系，把铁法的武装干部接过来”。并对部队的整顿，群众工作，财政问题，组织领导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为解决干部和战士的思想问题。陶铸同志在奈曼期间，又接见了方方面面的代表，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会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阜新蒙民大队撤到奈曼后，陶铸同志亲自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高兴地说：“我们蒙古族中有这样一支坚强的队伍，不简单！”看到指战员们在寒冬里还穿着单衣时，他立即把管后勤的同志找来商量办法，发给每人一身单衣片和羊毛，自己动手做棉衣。又发给他们四十多只步枪，用他们缴获的二十几辆大车和当地群众换了马匹，把这个二百多人的队伍，全部武装起来。当他得知库伦撤到奈曼的干部和战士在卓帽山遭到国民党张念祖部的袭击后，立即接见了他们并给予安慰和鼓励，还发给了二百块银洋解决经费困难。

陶铸同志十分注意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关心蒙古族干部的成长，他经常教育撤退到奈曼的老同志，要他们关心新干部，加强培养教育。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份，在奈曼旗王府联合会办公室亲自召集了阜新、库伦、宾图、科左右旗和奈曼旗的蒙古族青年进行座谈。陶铸同志耐心听取了广大青年的呼声后，亲切地和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分析了当前形势，讲明了党的战略部署，并着重宣传和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对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一、五地委扩大会议以后，根据陶铸把部队变成教导团的指示，所有撤退到奈曼的机关和部队开展了诉苦三查运动，诉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之苦，查阶级，查立场，查斗志，使大家明确当兵受苦流血拚命是为了什么，认清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做好群众工作，取得群众的支持，革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根据省委指示，地委和分区在组织上也作了相应的整顿和调整。一九四七年一月份，一、五地委合并为一地委（亦称五地委），吕明仁任书记，刘瑞森任副书记。设哲里木盟办事处，赵龙任主任，李明、包忠爱任副主任。在军队方面，一分区和路西支队合并，将田维扬调走，由刘述刚任司令员，孙兴华任副司令员，统辖十三、十四、十五团和由路西支队扩编的二十五团。并整顿和扩编了各县的县大队，大大加强了我军的实力。

建设根据地，保卫根据地

撤退到奈曼的机关和部队，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在此基础上，地委对路西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将整个路西地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

本区，主要是奈曼旗的大部分。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清算减租，分粮分地，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是以贫雇农为主力军，团结中农，分化地主富农。对小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动员中地主献粮献地，尽量缩小打击面，减少敌对势力，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恶霸地主和大地主。口号是“民主独立，民主自由，反美反蒋，反恶霸，反倒算，反对中央胡子，安家保家。”使广大农民确实得到翻身，分到土地和财产，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权，真正确立贫雇中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势。二是游击区，主要是库伦和阜新地区，主要工作是开展减租减息，镇压最反动的恶霸地主，建立秘密或公开的农会组织，成立两面政权，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口号是“蒙汉穷富好人团结起来，反对中央胡子”。并随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将游击区变为游击根据地。

根据地委的指示精神，奈曼旗在清剿土匪的同时，大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加强根据地建设。从一九四六年三月中共奈曼旗委成立，即开始在王府等四个区进行除奸反霸，减租减息，发放了部分粮食、耕畜和财产，群众得到一些利益。一九四六年七月，旗委提出了“推平土地”的要求，主张“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房，牧者有其畜”，在全旗四个汉区和四个蒙区，百分之七十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工作进行了近两个月，以哲里木盟政府的命令为依据，强迫汉奸，恶霸大地主拿出土地、耕地、农具和粮食，分给贫苦农牧民。八月份形势开始紧张，旗内蒙骑二师十五团部分连叛变，国民党政府地方武装张念祖部和李守信部也开始进犯奈曼。浩沁苏木、八仙筒和白音他拉等地区不断发生地主反把倒算的事件，有的党政干部农会积极分子和军属相继被杀害，旗大队付大队长罗云彪，旗委宣传部长梁东明，洁沁苏

本区委书记于德水，八仙筒农会主任吕踢躐等十几名干部被杀害。一些被斗地主公开宣扬“打八路、杀干部，杀了干部娶寡妇”，勾结坏人，撵出工作队，向农民讨还分的土改果实。群众思想动摇，全旗范围内的土改被迫停止。

一地委和路西分委进驻奈曼后，为了把奈曼建成巩固的后方基地，首先把着重点放在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这个基点上。地委一百二十名干部和奈曼旗干部互相配合，在内地组成了工作队，在边缘区组成武工队，边剿匪，边开展土改。全旗分南北中三片，北部由旗委书记薛光军负责，中部由地委宣传部长褚风岐负责，南部由旗委民运部长王枫负责，组成了老河沿、王府、西地三个工作队和由华子扬，张雪涛负责的康平县武工队，宋志霖负责的科左前旗武工队，配合开展工作。一九四七年四月份为了加强蒙古族地区的工作，代理旗长协儒博僧格和一地委蒙工部部长梁一鸣又组织了十几名蒙古族干部赴沙日浩来和章古台两个蒙族比较集中的努图克（区）开展工作。

这场斗争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份开始，历时七个月。基本方针是：“大胆放手，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以大地主为主要斗争对象，中地主说服献地，小地主、富农完全不动。要求在巩固的基础上求发展、不求快，只求透，在具体做法上，经过宣传发动，扎根串连，开展斗争，建立农会和村政权收缴地主武装，组织民兵、自卫队和换工插具，组织生产等几个阶段。在全旗五个汉区、二个蒙区等七个区中，有的普遍搞了一次，有的搞了试点，大体占全旗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场斗争由于执行了“在巩固的基础上求发展”的方针，政策比较明确，方法较为稳妥，所以，群众发动的比较

扎实，斗争成果也比较显著。在全旗25,833户，148,016人中参加斗争的户数13,017户，占总户数的50%，参加斗争的成年男女27,488人。被斗户数2,814户，占总户数的10%，被斗人数20,229人，占总数的14%。分配到土改果实的户数12,537户，占总数的48.5%，人数69,755人，占总人口的近48%。通过土改斗争的实践和工作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使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大大提高，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真正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在经济上、政治上确立了贫下中农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壮大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取得了斗争经验，为了革命的继续深入创造了良好条件。七个月中全旗培养出新干部369名，其中蒙族干部77名。并写出了《德隆地屯分地的经验》、《深入群众教育的一种方法、洗脸照镜子与挖臭根》《王府区五个月群众运动总结》、《奈曼旗衙门营子北部工作概况的报告》等十几篇文章，分别在地委会上交流，在《胜利报》和内部工作通讯上发表，这些宝贵经验对指导当时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和以后开辟新区的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趁国民党发动大规模进攻之机，奈曼王爷苏达那木达尔吉和伪保安团团团长梁洛不等，不顾党的多方面劝导，公然策动蒙骑二师十五团三、四连叛变革命，流窜于奈曼境内，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杀害我地方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国民党地方军李守信部和张念祖部也伺机进犯，对奈曼这块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胁。一地委和路西分委撤退到奈曼后，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一方面和旗内武装联合起来围剿叛匪和流窜于各地的胡子，抗击中少军保卫土改，保卫根据地建设。

路西支队撤退到奈曼后，首先配合奈曼旗委，对十五团进行了整顿。派陈明山、张健民、赵旭、赵桓、刘君山等政治军事干部充任团政委和各连指导员，并选派一些蒙族进步青年调整、充实了军事干部。对部分哗变士兵，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说服动员，使一部分人回归部队。使十五团真正成为一支人民的武装力量。

一分区和路西支队合并后，分区武装力量发展到三个步兵团（十三、十四、二十五团）和一个骑兵团（十五团），战斗力大大加强。在刘述刚和孙兴华的带领下，驰骋于辽西的北部地区，转战千里，清剿流窜于各地的土匪武装，抗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从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地委武装和奈曼旗地方武装互相配合，在奈曼境内进行了十多次大小战斗，打退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的三次进攻，在平安地一带围歼国民党政府军李守信部二个连，俘获了一百多人，并缴获了部分马匹。在奈曼境内歼灭了土匪梁洛不等，嘎斯拉、金宝昌、黄世忠等四百五十余人，肃清了四处流窜的仁义、大庄稼人、占山、野狼、扫北等散匪二十五股，四百八十余人，保境安民，使奈曼的土改，建党建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在奈曼周围地区，也不断发起攻击，在南部，阜新县武工队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八日，在高东台打退了阜新伪县长率领的百余名蒋军的进攻。生擒“长山”等两名匪首，歼敌数十名，被群众称为“神八路”。不久又和分区部队配合，先后攻击了福兴地，哈力呼哨等敌人据点，歼敌二百余人，收复了水泉、旧庙、务欢池等地。在东部，分区三个步兵团，长途奔袭位于开鲁和通辽之间的扎兰营子，全歼了国民党的一个杂牌部队，解除了对开鲁的威胁。

地委和分区部队，在奈曼经过三个多月的整顿和锻炼，度过了困难时期，蓄积了反攻的力量。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吕明仁主持下召开了地委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中央二月一日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会议决定，组织东进纵队，由吕明仁、刘瑞森、赵东寰带领原一地委干部和部队，向康平、法库方向出击，打击敌人，收复失地。刘述刚带领二十五团赴洮南待命，准备参加四平战役，并恢复了路西分委，由曾志和赵龙负责，分管阜新、彰武、库伦、奈曼等地的工作。同时，留下百余名干部，在奈曼全面铺开土改和建党建政工作，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建设，保证后勤支援。

全力以赴 支援前线

翻身解放的奈曼人民，在旗委的领导下，满怀喜悦的心情，积极投入到战争行列中去，不怕牺牲，不怕艰苦，奋力支前，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踊跃参军参战，扩充地方和主力部队的武装力量。一九四七年我军在东北地区发起了强大的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急需补充兵源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在旗委的领导下，各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扩兵运动。首先从宣传工作抓起，利用大会、小会、家庭会、黑板报、广播、刷标语等各种形式，向农民讲清国民党中央军不打倒，穷人就不能彻底翻身；蒋介石反动政权是封建势力的总后台，总根子，只有彻底推翻蒋家王朝，拔掉这个老根子，才能建立起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必须由人民自己拿起枪杆子来保卫。翻身农民明白了参军参战的道理，一改过去“好铁不捻钉、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提出了“好铁要捻钉，好人要当兵”。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口号，干部带头，积极分子带头，积极报名参军。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生动局面。沙日浩来区太不歹屯宝力刀老汉，在群众大会上当场替两个儿子报了名，并表示说：“伪满把我大儿子抓去当劳工，受够了罪。今天替我们自己打天下，让我四个儿子都去当兵也行！”还有的青年在检查落伍时，哭叫着要跟队伍走，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这个区原计划扩兵八十名，结果完成了二百一十六名，超过了近二倍。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年中，全旗参军人数三千四百五十六人。有的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在战火纷飞的戎马生涯中，锻炼成长，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有的随军转战南北立下了不朽功勋，为子孙后代作出了光辉典范。

组织庞大的后勤队伍，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一地委撤到奈曼后，为了筹集资金，解决军政的给养问题，地委在王府区成立了后勤供给处。在大沁他拉镇建立了大北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和敌占区做买卖，换回食品、布匹和日用百货，供给部队和机关的需要。奈曼旗政府成立了战勤委员会，由旗长亲自担任主任。下设供给科，负责粮食，草料和各种军需物资的筹集；运输科，负责运送粮草，物资和伤病人员；招待科，负责伤病员的安置和过往部队、干部、民伕的食宿；担架科，负责担架队的征集和组织，内设救护组，以便及时抢救伤员；宣传科，负责组织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和进步人士向广大群众开展支前的宣传鼓动工作。各区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山区长亲自负责。并在旗内曹家洼子、大沁他拉、兴隆地、接都、勿丹勿苏、张家店、八仙筒等处先后设立了兵站，安排过往部队食宿。

组织担架队，开赴前线。为了及时支援战争，全旗各个村镇普遍成立了战勤组织，凡十七岁到五十岁的男子，均编入战勤小组，成立担架队。每六人一付担架为一班，三个班为一个小队，三个小队为一中队，然后根据需要由若干中队组成一个担架大队。并以区为单位，集中起来教以必要的军事知识，讲清任务，并进行多次训练和演习，以便及时出动，临战不乱。

一九四六年十月，王府、西地、衙门营子等南部七个区，组成一百付担架、六百人的队伍，由耿晨刚和陈景阳任正付大队长，开赴前线，随我军某部二十师参加战斗，转战于黑山、北镇、新民、新立屯、彰武等地。在硝烟迷漫的战场上，队员们置个人生命于度外，个个奋勇争先，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及时安全地送到后方兵站。在解放彰武的高山台战斗中，激战了三天三夜，队员们也人不休息，担架不闲，奔跑了三个昼夜。八大队队员高合，为了掩护伤员，不幸中弹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旗委为了纪念这位烈士将他的家乡“窦家梁村”改名为“高合村”。这个担架大队随军奋战了三个多月，直到彰武解放，才奉命返回。

一九四八年一月，旗内北部地区又出动担架一百付，六百入，由孙占奎任大队长，随七纵二十师直奔沈阳，参加了攻打沈阳的外围战斗，解放了苏家屯。随后进军四平，参加了这场激烈的战斗，队员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舍生忘死的抢救伤员，受到部队指战员的称赞。很多人立功受奖，为家乡人民争取了荣誉。在担架队奉命返回时，部队赠给一辆全套胶轮大车，装满战利品。并给了三十条美式步枪和两麻袋子弹，交给旗里，装备了地方武装。

在解放辽东、辽西的战争中，奈曼旗先后出动担架五百

多付，人员三千三百多人，奔赴战场，贡献了应尽的力量。

同时，为保证部队的供应，满足军需，全旗动员了近千辆大车出动了二千零五十个车次，将粮、草和支前物资运往前方。并出动了大批民伕修复了八仙筒至下洼、大沁他拉到福兴地、土城子至福兴地、八仙筒至二龙山、八仙筒至开鲁等五条公路。清沙填坑，架桥铺路，整修一新，保证了运输通畅。

随着土改的逐步深入，农民分得了土地，满怀热情地掀起了生产高潮。在“多开荒，多上粪，不撂荒一亩地”的口号鼓舞下，大量种植棉麻，大力生产粮食，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在四年解放战争中，全旗人民缴纳军粮二百四十三万斤，军草七万斤，马料三万斤，军马九十匹。并做军鞋二千多双，军袜二千五百多双，满足前线和过往部队的需要。

为了保证前方将士安心作战，解除后顾之忧，全旗人民千方百计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村村组织了助耕队，为缺少劳力的军烈属代耕土地。在分配土地、发放贷款和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中，给军烈属以优先照顾，公粮和各种税收减征百分之十到二十，军属子弟还可以免费入学。逢年过节，由干部带头，组织秧歌队载歌载舞地给军烈属拜年，赠光荣匾，挂光荣牌，送立功喜报，并发给大米、白面、猪肉和衣服、布匹等物资。使军烈属不但在政治上受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尊重，在物质生活上也得到了保障，真正提高了军烈属的社会地位。他们以喜悦的心情，不断给前方亲人写信，报告家乡的好消息叮嘱儿女英勇作战，杀敌立功，为祖国解放出力，为家乡父老增光。

全旗各族人民，为了表示对前方将士的敬意，曾多次派

出慰问团，长途跋涉，奔赴前线，向指战员们赠送慰问信、慰问品和奖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一次劳军活动，就去了五十四名蒙汉族男女代表，带着二百四十二封慰问信和十五辆大车，满载着猪、羊、鸡、蛋、粉条、黄烟和各种奶制品，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把亲人们的心意送上前线。当指战员们手捧一袋袋慰问品、读着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时，笑在脸上，暖在心头。个个表示一定要多杀敌，多立功，早日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李海晨整理)



奈曼旗蒙族青年 与自治运动联合会

杨晓春

“八·一五”光复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奈曼地区统治的结束，奈曼旗伪政权也相继瓦解。为继续维持世袭的统治地位，奈曼旗的末代王爷苏达那木达尔济趁动荡之机，组建了“奈曼旗维持会”，并自任会长，由包庆丰任副会长。同时还组建了由苏达那木达尔济任司令，梁洛不等任副司令的奈曼旗保安司令部，约有武装人员二百左右。其名义是维持社会秩序，实际上是把守地方，阻止八路军、共产党进入奈曼，以维护他们的统治。

一、寻求光明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时局动荡，奈曼旗一批在外地国民高等学校和大学的蒙族学生辍学归家。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耳闻目睹了十几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好河山的蹂躏和对中国各族民众的欺凌，也切身感受到了满蒙各级政权的腐败、软弱和无能。尤其是有许多学生如旺楚克道尔吉、米其僧格等在学校读书时受学校地下党组织及进步师生的影响，已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成为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他们对日伪政权深恶痛绝，对王爷的“维持会”也不抱任何幻想。

奈曼朝何处去，谁来解放水深火热中的奈曼人民，成为这些热血青年深切关心的大问题。

苏联红军对日开战后，听说苏军要从奈曼经过，对苏联十月革命有较深了解的一部分青年怀着对苏联十月革命崇敬的心情，由旺楚克道尔吉、米其僧格等八人组成了奈曼旗迎接团去开鲁一带迎接苏联红军。行至辽河时因大水未能过河，于是就在八仙筒等了一段时间。当苏联红军到达八仙筒后，迎接团主动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一则对其表示欢迎，二则征求对奈曼地方的治理措施。但由于语言不甚通晓，加之苏联红军军务紧急，只对迎接团表示感谢，对地方政务却爱莫能助。

两个多月后，苏联红军撤离奈曼，青年们又获悉了辗转传来的乌兰浩特方面搞自治运动的消息。于是，旺楚克道尔吉和刘大模林加布两人又赴库伦，联系库伦旗的知识青年，了解乌兰浩特的自治运动情况。当时库伦旗的部分知识青年和乌兰浩特方面已有联系，并按其指示开展库伦旗自治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旺、刘二人到达库伦后，受到了库伦旗知识青年的热情接待。当其二人详细地了解了乌兰浩特的自治运动情况后，决定由旺楚克道尔吉一人随库伦马林加卜、布和朝鲁和德力黑等人一起去乌兰浩特联系，刘大模林加布马上返回奈曼，将在库伦旗了解到的情况和旺楚克道尔吉去乌兰浩特的消息转告给奈曼旗的青年们。当时，奈曼旗的蒙古上层思想很复杂，以苏达那木达尔济为首的王公贵族不相信甚至反对内蒙的自治运动，更不能容忍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而只向往着国民党的到来。当时，一部分蒙族知识青年还幼稚单纯，而且对走什么道路正犹豫彷徨。所以，刘大模林加布回到奈曼后向青年们介绍了了解到的乌兰浩特方面的情

况后，使许多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旺楚克道尔吉与库伦旗的青年代表步行经宾图旗到郑家屯，先与内蒙驻郑家屯办事处联系，并遇到了从昭盟和哲盟其他旗县来的青年（大部分是蒙族青年）二十多人。说明来意后，内蒙驻郑家屯办事处介绍他们到八路军驻郑家屯办事处，受到了办事处主任赵维克专员的热情接待。赵专员了解青年们的革命意图后非常高兴，亲自开具证明，用红布做袖标，用俄文写上“革命青年通讯员”的字样，然后亲自和苏军驻郑家屯部队联系，让青年们坐苏联红军的火车赴乌兰浩特。苏联红军的车因军务关系走走停停，青年们因急于赶路，故到白城子后全部下车，步行赶到了乌兰浩特。东盟临时政府非常重视旺楚克道尔吉汇报的奈曼旗政治、军事，及民众状况，待他们休息一段时间后，十一月份，东蒙临时政府召集兴南地区（哲盟地区）的青年开会，指示他们回去选举代表，参加第一次东盟人民代表大会，以准备正式成立东蒙自治政府。

旺楚克道尔吉返回奈曼后，马上召集三十多名青年在大沁庙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旺楚克道尔吉把去乌兰浩特期间耳闻目睹的各方面的情况更详尽的介绍给了青年们，并按照东蒙临时政府指示号召青年们参加革命，投身到内蒙古自治运动中来。会议结束后，青年们选举了旺楚克道尔吉、那木云道尔吉、那顺巴雅尔、米其僧格、阿力坦包力嘎等八名代表于四五年十二月份骑马奔赴乌兰浩特，参加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大会（第一次东部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当代表们奔波数日，风尘仆仆赶到乌兰浩特时，乌兰浩特发生疫情，于是会址改在葛根庙。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东蒙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完成了预定的议程，内蒙古

东部地区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了。会议选举了博彦满都为政府主席，并制定公布了政府的施政纲领。内蒙古东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代表们倍感欣慰，但自己地方上的问题未能圆满解决，他们又甚感焦急。代表们当即向东蒙自治政府请示解决办法。政府指示说：兴南地区组织军队、建立政权的问题由政府内防部长阿斯根代表政府协助处理，你们可找他联系。于是，代表们经过协商决定，由旺楚克道尔吉随同东科中旗代表直接去找已经去东科中旗开展工作的阿斯根部长，其余七名代表回奈曼传达代表会议精神并做宣传发动青年们的工作。

二、迎来救星

旺楚克道尔吉到达中旗后，中旗的政权和军队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阿斯根已经去了后旗。于是旺楚克道尔吉又单人匹马赶到后旗。到了后旗后，旺楚克道尔吉受到了阿斯根的热烈欢迎，并同时见到了原库伦旗委书记，辽西省委准备派往奈曼任旗委书记的赵任远同志。他们邀请旺楚克道尔吉待宾图、库伦两旗工作开展起来后再一同回奈曼。

库伦旗建政、建军工作完成后，赵任远、阿斯根等在详细了解奈曼旗的情况后，认真研究安排了去奈曼的人员、武装及行动日期。一九四六年三月初，赵任远、阿斯根带领东盟自治军一小部分战士，由旺楚克道尔吉为向导从库伦向奈曼进发。

一九四六年三月，就在参加东盟自治政府成立大会的七名代表回到奈曼不久，国民党降队张念祖部一千余人突然从开鲁窜来奈曼，占领了大沁他拉，并恢复了伪绥东县政权，任命侯勋烈为县长。这突然的变故，使青年们非常着急。就

在张念祖占领大沁他拉七天左右，米其僧格带领两名青年，冒险跑出大沁他拉，去库伦旗找八路军和阿斯根报告消息并请示解决办法。行至半路，正好与来奈曼的阿斯根、赵任远等人不期而遇。了解情况后，赵任远当即写信，请求驻彰武的新四军老三师独立旅支援。阿斯根又把库伦、宾图等旗的自卫军组织起来准备参战。两天后，独立旅二团蔡团长率部赶来，与库伦、宾图等自卫军一千余人集结于大沁庙。赵、阿等人详细地做了作战部署后，于三月十日对驻扎在大沁他拉的张念祖部发起了进攻。战斗于十日凌晨打响，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完全解决。不堪一击的匪徒在战斗打响之后大部都从西门逃走，来不及逃走的一百余人被我军俘虏。奈曼人民迎来了救星共产党，奈曼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经过五天紧张的筹备，奈曼旗政府在全旗蒙汉人民喜庆胜利的锣鼓声中宣告成立了。同时，以赵任远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奈曼旗委会也秘密地建立了（对外称民众运动工作部）。按照辽西省委的指示，对奈曼旗的建政、建军、除奸反霸斗争实施领导。

根据东蒙地区的实际情况，为了贯彻党的民族地区的统一战线政策，旗政府成立时旗长由伪满时期旗公署的劝业科科长，光复后奈曼旗维持会成员，积极靠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哈斯通力嘎担任。从黑山支队调来的云戒三同志担任副旗长。旺楚克道尔吉担任了民教科科长；那木云道尔吉担任了秘书科长；布和文都苏担任了财粮科副科长；原旗公署警察署长王承德担任了公安局长。由阿斯根主持将原维持会保安大队改编为东蒙古自卫军第九团。团长马占峰（旺哈尔），副团长梁洛不等。同时旗委也组织了一支地方人民武装——旗大队。大队长由旗长哈斯通力嘎兼任，副大队长由黑山支队

调来的罗云彪同志担任，政委由旗委书记赵任远同志兼任。至此，奈曼旗旗级的建政、建军工作初步完成。

对于旺楚克道尔吉、哈斯通力嘎等人同东蒙自治政府及共产党的频繁联络，奈曼旗“末代王爷”苏达那木达尔济颇为不满。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治地位，他亲自南下北京找国民党政府讨教。当他拿到国民党政府的旗长委任状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回时，奈曼旗政府已成立多日。无奈，他只得饮恨在心，悄悄地搬出王府，蜷居到后仓的家中。

三、组织起来

鉴于民族地区的特点和蒙族知识青年积极向上的革命热情，在旗政府成立后不久，旗委会指示布和文都苏把仍散居在家的蒙族知青敖力玛扎布、布和吉雅、王业喜、高阿尔斯朗、拉喜道尔吉、马业喜、宝喜、达尔玛等二十多人召集到大沁他拉，组织成立了青年团，选举布和文都苏为书记。青年团成立之后，在原王府东院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由旗委书记赵任远和新任旗公安局长的狄云猷同志上课，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地讲解革命道理。青年们通过学习，逐渐明白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救星”、“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等革命道理。使其提高了觉悟，坚定了跟共产党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学习结束后，把其中表现较好的几位青年选送到辽吉干部学校学习。被选送的青年有敖力玛扎布、道尔吉、嘎日达、沙力卜等五人。敖力玛扎布等在校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奈曼旗蒙族知识青年中最早的共产党员。其余的青年集中学习完后都分头到牧区、农村去向广大的各族农牧民宣传革命道理。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西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和东部内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在承德召开会议（后称“四、三”会议），乌兰夫和哈丰阿都参加了会议。通过讨论和协商，根据共产党中央对内蒙问题的指示最后达成了协议：

一、撤销东蒙自治政府；

二、取消内蒙人民革命党；

三、建立东西内蒙古一体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自治运动联合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盟、旗两级政府可保留。

至此，分裂了近三百年的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得到了统一。

按照“四、三”承德会议精神，东蒙自治政府即筹备于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东盟人民临时代表会议。奈曼旗选派旺楚克道尔吉、宋宝山、西力卜加木萨、晓生阿、阿生嘎、斯琴、色其都等二十余人做为代表去乌兰浩特参加会议。代表们骑马赶到通辽，正要坐火车赶往乌兰浩特时，得知了郑家屯、四平等城市均被敌人占领的消息。火车停运，绕路走又赶不上会议时间，只得半路返回。

一九四六年六月，旗政府成立四个月后，由于我党有些同志在民族地区的政策执行上有“左”的倾向；也由于旗政府成立初期主要领导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意识；再加上五爷苏达那木达尔济一伙人的离间作梗，奈曼旗一度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由辽西五地委调来的同志不熟悉民族地区工作的特点，加上某些政策及做法的失误以及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所以一个时期内未能及时树立起应有的形象和确立其领导地位。一部分蒙古族上层进步人士认为只有东盟自治政府才是其唯一合法的上级，共产党来领导属多此一举，故双方发生许多不睦，使开始的除奸反霸和减租减

息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以苏达那木达尔济为首的反动上层则利用一切关系和手段，以达到离间双方而从中渔利之目的。当时，奈曼旗交通不便，通信、通讯很不及时。鉴于此种情况，上级地委于东蒙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结束后，派额尔德木图从通辽来奈曼传达“四、三”承德会议精神；传达东蒙地区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精神；传达毛主席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并按两个会议的指示精神组建奈曼旗自治运动联合会。额尔德木图在传达中说：东蒙地区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于五月二十五日在乌兰浩特召开，按照“四、三”承德会议的决议精神，东蒙自治政府已撤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已解散；东部区成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总分会，盟、地级成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分会，各旗、县也要成立自治运动联合会支会。并明确规定：各级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必须接受同级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上级的指示和形势的发展使一些人的模糊观念澄清了，也更加激起了广大青年的革命热情。旗委会按着上级的指示，马上着手组建自治运动联合会奈曼支会。组建初期，就有四十余名青年参加。为了便于工作，青年团也归入联合会。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员是：

主任：额尔德木图

副主任：旺楚克道尔吉

联合会下设四个部。青年部部长布和文都苏；妇女部部长斯琴；组织部部长达尔玛；后勤部部长布和吉雅。

联合会支会成立之后，为了动员号召更多的青年参加革命，联合会的男女青年在业余时间排练文娱节目，利用大沁庙六月十五（旧历）庙会的机会演出。演出吸引了很多群众和青年观看。于是一个节目演完之后，就由联合会的领导登

台讲演，使宣传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庙会结束后，就有许多青年直接报名参加了联合会。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广大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由联合会青年部出面，动员分散在全旗各地的知识青年二百余名来大沁他拉，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至十八日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青年大会。大会期间，旗委书记赵任远讲话，他向青年们详细地介绍了国内外形势，讲解了国内外土地革命的经验，并通过南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实例，交待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鼓励青年认清形势，认清时息，投身革命。联合会主任额尔德木图也讲了话，他介绍了“四、三”承德会议后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情况和联合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工作方法，要求青年们走出家庭投身到自治运动中来。大会休会时青年们分组讨论，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献身内蒙古自治运动，献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会议期间，青年们演节目，贴标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并且召开了“八·一五”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一时间，青年们的心血沸腾了，大沁他拉街沸腾了。

四、深入基层

大会结束以后，在旗委的领导下，组成了发动群众工作团。

团 长：额尔德木图

副团长：哈斯通力嘎

政 委：赵任远

工作团下设四个工作队，分别深入全旗八个主要区（努图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搞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工作。参加青年大会的二百多青年就有一百多人报名并分别被编在

四个工作队内。旗委书记赵任远负责一个工作队，主要深入三个汉族群众居住区，（八仙筒、衙门营子、大沁他拉）并由旗大队配合工作；旺楚克道尔吉带领一个工作队深入到沙日浩来和大歹区；额尔德木图和那木云道尔吉带一个工作队深入到章古台和扎苏台区；布和文都苏带一个工作队去白音他拉区。这时，选送到辽吉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敖力玛扎布等人也毕业归来，同时，该校毕业的后旗学员博音图、何文清、色音巴雅尔、喜文、达花巴雅尔、那萨乌力塔，宝音特古斯等七人也由上级直接分配到奈曼旗联合会支会，不仅给支会增加了有生力量，同时也提高了支会的政治素质。

工作队深入各区后，青年们以八路军为榜样，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坚持徒步行车。每到一地都找最贫穷的农牧民家吃住。并通过演出自编自演的小节目，开大会演讲，开小会扎根串联等不同形式宣传发动群众。根据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工作队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住者有其房。”于是，每到一地，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对蒙族王公贵族彻底清算，对中、小地主减租减息退租退息。这些沿用汉族地区群众斗争经验的过早过高的口号和作法在实施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打击了蒙古族上层的进步人士，也影响了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所以，一个多月的工作，虽然在形式上轰轰烈烈，但由于群众觉悟的提高未跟上形势的发展，其工作效果不甚显著。与此同时，东北的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大股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进犯我东北解放区。辽西战场上的阜新、北票、库伦、赤峰、通辽、开鲁等地都被国民党部队相继占领，驻科左中旗、科左后旗、寅图旗、库伦旗的蒙古骑兵二师的十一团、十二团、十三团、十四团的一部或大部也相继叛变投

敌。科左后旗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图日根，纳嘎木仁等蒙族知识青年都被迫后撤到奈曼，参加了奈曼旗自治运动联合会。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在苏达那木达尔济和梁洛不等（原东蒙自卫军九团副团长，在整编中被解职回家）的策划胁迫下，驻奈曼的蒙骑二师十五团的三连一部四连全部发生叛乱。叛匪们向旗大队驻地八仙筒发动进攻，致使我旗大队副大队长罗云彪等同志牺牲，八仙筒失守。奈曼旗的斗争形势急转之下。

为了保护青年的安全，旗委决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化整为零就地解散。联合会机关的工作人员随旗委转移到下洼一带。十五团的叛匪又向大沁他拉进攻。当时街里只有十五团一连和警卫连二百余人，政委陈玉良带领警卫员请求支援，新四军独立旅及时赶到，十五团的叛匪望风而逃。苏达那木达尔济带领一部分人逃到阜新投靠了国民党七十一军，另一部分逃到了开鲁、通辽一带。

十五团的叛匪逃散之后，一部分被迫参加叛乱行动的十五团战士都跑回家或亲戚家中，躲了起来。联合会机关的同志们遵照旗委的指示，分别找到这些战士，向他们反复交待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并指明弃暗投明的光明前途，使二十多名受蒙蔽的战士及时携枪带马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

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联合会的同志们都发放了武器，变成了武装工作队，配合旗委、旗政府及旗大队继续开展工作，并且随时和土匪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去浩沁苏木筹集军需的旗委宣传部长梁东明等二百来人突然遭到一千多土匪的袭击，由于情况紧急，很多战士又都是刚从步兵转为骑兵的，骑术不佳，形势非常紧张。联合

会的二十来名干部表现得非常勇敢，靠着他们娴熟的骑技，掩护同志们突围。梁东明等人虽然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但大多数人都突出了重围。联合会的何什格多仁也在这次突围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联合会的武装工作队还配合旗大队参加了石匠沟、大沁庙东村等数次剿匪战斗，为建立奈曼这块辽吉战场的后方根据地立下了战功。

由于联合会的青年们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斗争觉悟提高的很快，立场也较坚定。所以，当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他们大都能站稳脚跟，不随波逐流。在斗争形势大起大落的变化中，没有一个人同叛匪合污，有许多人躲回家后还同叛匪巧妙地周旋，表现了革命者应有的气节。

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大举进犯，铁岭、法库、康平相继被国民党占领。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共西满分局决定把奈曼、库伦划归辽吉一地委代管。地委机关，一分区路东工作队，阜（新）彰（武）大队等地方干部和部队三万余人陆续集结于奈曼。根据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坚持奈曼地区”的指示，以奈曼为根据地组织战略反攻。至十月下旬，奈曼旗形势好转，旗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后勤供应和剿灭残匪上。地委派出大量干部深入到大沁他拉，八仙筒及衙门营子区开展工作。联合会原工作队的青年也都陆续从家中归来，继续深入到几个蒙族区开展工作。工作队的同志们动员群众做军鞋、筹军粮、征收蒙族青年参军，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争。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中共西满分局针对东蒙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关于东蒙工作的指示》。《指示》就蒙族地区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明确指出：“目前在蒙古地区，不是消灭封建剥削，而是削弱封建剥削；不是

‘耕者有其田’，而是一般减租减息，增加青户收入，改善青户待遇。……目前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培养干部，整顿部队”。

为了探索蒙古地区工作的特点，辽吉一地委蒙古工作部部长梁一鸣和哲盟自治运动联合会分会主任李鸿范（协儒博僧格），奉上级指示来奈曼，并分别深入到章古台区和沙日浩来区，指导蒙族地区的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支前扩军工作。并以此为点，总结经验，指导全局。奈曼旗联合会支会的五十多人都参加了这两个区的工作队。在工作中，梁、李二人十分注意民族政策，也非常关心工作队中的蒙族青年。他们对青年们既放手使用，又随时注意教育培养。在做喇嘛的工作时，对多数人耐心地教育争取，只孤立打击积少数反动喇嘛。并时刻提醒青年们注意政策，防止过“左”。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这两个区的工作基本打开了局面，联合会的青年们也受到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教育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使他们一天天成熟起来。

一九四六年秋冬两季，奈曼已经成为辽吉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牢固后方，局势越来越稳定。自治运动联合会奈曼支会已有七十四人。大部分同志仍坚持工作在广大的蒙族地区。由于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日益深入人心，群众觉悟一天天提高，减租减息运动亦步步深入。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广大群众积极运军粮、做军鞋支援前线，青年们也积极报名，应征入伍，打击敌人。由于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同志积极工作，奈曼旗的蒙族上层进步人士更加倾向革命，蒙族群众的觉悟提高很快，使蒙古族极端反动分子受到了孤立和打击。全旗蒙、汉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了，使奈曼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充分发挥了后方基地的重要作用，为东北的解放和

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锻炼成长

自治运动联合会奈曼支会的绝大部分同志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他们有文化、热情高，接受新事物快。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不仅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也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考验了自己，并迅速成长起来。一九四七年二月，联合会支会主任额尔德木图因工作关系调走，由旺楚克道尔吉任联合会主任职务。根据青年们的表现，党组织对他们及时进行教育培养，并大胆放手使用。当时，旗政府遵照上级指示对所属职能部门进行整顿，抽调了蒙古族青年图日根、德力格尔、业喜、达尔玛、乌英阿、纳嘎木仁、何文清、色登加卜等十余人充实了旗政府的各职能科室，使科、局级干部的成份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批优秀分子经过党的教育、培养和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优秀青年如刘大模林加布、布和朝鲁、那仁满都呼、那达那巴拉、查格德扎布、贺什克图、舍力和、胡力沙、白振纲、德力格尔、确日乐卜、阿尔斯朗、三那才图、达瓦宁布、那顺乌力吉、布和文都苏、敖力玛扎布等都先后走上了领导岗位，分别担任了区长、区委书记、科长或旗长。四十个春秋过去了，当年这些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都已年逾花甲，有的还在坚守着岗位为人民勤奋工作；有的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有的还在潜心钻研自己的学术课题。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都无不感慨地说：“是党把我们组织起来，是自治运动使我们成长进步的。”

自治运动联合会不仅团结了蒙古族各阶层人士，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巨大威力，同时也增强了蒙古族人民同

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为建立内蒙古民族自治的民主政权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民族人才，成为培养和输送蒙古族干部的摇篮和基地。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工作，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乌兰浩特隆重开幕。奈曼旗选派包忠爱、敖力玛扎布、王国荣、那木云道尔吉、布和文都苏、纳嘎木仁、图日根、于宗海、那达那巴拉、达尔玛、那仁满都呼等二十余人为奈曼旗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团长为包忠爱、副团长为纳嘎木仁，其余均为代表。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喜庆胜利的锣鼓声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奈曼支会的组织，并未立即撤销，而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支会执委会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又进一步进行了调整：

主任：阿尔斯冷

副主任：云戒三

执委：包忠爱、刘大模林加布、王业喜、那木云道尔吉、中乃、布和文都苏、于宗海、旺哈尔。

执委会调整之后，仍带领全体会员深入到蒙族地区，遵照辽吉省委建立“三大思想”即消灭地主阶级、满足群众、团结中农的指示，提出“彻底分地，彻底翻身”的口号，投身于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去。在此期间，根据上级党委的“回避”政策，联合会中二十五名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调离家乡，被送到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深造学习。毕业以后，大部分分配到内蒙古西部地区工作，成为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化战线的骨干力量。直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交权审干运动结束后，自治运动联合会奈曼支会才告撤销。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奈曼支会从成立到撤销，始终主动接受党的领导，积极认真地进行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上级领导部门交给的各项任务，其功绩为历史所承认。额尔德木图回忆说：“五、一大会召开以前，哈丰阿同志曾对乌兰夫同志说：‘在东蒙地区旗县级联合会支会中，有组织、有活动、有影响并能坚持始终的唯有奈曼旗支会’。”

（本资料在成文之前，笔者曾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 and 档案，并先后访问了布和文都苏、旺楚克道尔吉、额尔德木图、王国荣、那木云道尔吉、敖力玛扎布、德力格尔、米其僧格、马业喜、那仁满都呼、晓声阿、海棠、才吉力虎、斯琴、白拉喜道尔吉等当事人、知情人，得到其指导和关怀，在此一并致谢。由于资料有限，时间仓促，且水平不高，错误和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陶铸同志在奈曼的活动片断

田 爱 军

一九四六年初冬，国民党反动派向我东北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斗争形势急剧变化。我军为保存革命实力，进行了战略退却，先后让出阜新、北票、库伦、赤峰、通辽、开鲁等地。十月后，一、五地委的机关干部及所属部队一万二千多人，先后汇集于奈曼旗大沁他拉镇附近。此时，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也来到奈曼。

当时，一些同志不清楚战略转移的具体情况 和 战 略 意 义，怨气很大。到大沁他拉后，由于交通不便，给养供应比较困难，部分同志士气不高，精神不振。十一月十二日，一地委、路西分委的干部在大沁他拉开了会，由刘瑞森、赵龙主持。会议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前一段在撤退中的经验教训。陶铸同志参加了会议，并以《关于一分区工作总结报告》为题发表了讲话。分析批评了一分区的工作失误，提出展开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游击根据地，打击土匪的斗争任务。会议具体指出，以路西地区为基础，向东向南发展，缩小敌战区，扩大游击区和根据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战略方针。作出一、五地委要合并为一地委（亦称五地委）、组织东进支队、成立骑兵团和哲里木盟办事处等一系列决定，对各项工作，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为与会的同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同年十二月，陶铸参加了蒙古族青年座谈会。地点在王府院内联合会办公室。阜新、库伦、宾图、科左后旗的一些同志和本旗部分蒙古族青年参加了会议。当时屋里屋外都是人，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面色清癯的陶政委披着褪色的军大衣听了大家的发言后，用他那短促有力的语音讲了一个多小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宣传了党的战略部署和民族政策。最后满怀信心地讲道：“革命成功为期不远，最多再换三次棉衣！”

在奈曼期间，为了做好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陶铸同志不顾劳累，往返于奈曼、库伦等地。四七年初，他指示梁一鸣等作上层活佛的工作，并亲自找麦德尔活佛谈话，争取了格日僧活佛。再此一些进步喇嘛开始倾向八路军，帮助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共产党好。同时还教育其他喇嘛不要去当土匪，要跟共产党走光明之路，有的喇嘛当了土匪，很快就被撵出了庙门。这对稳定奈曼的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陶铸十分关怀体贴战士。四六年十月，阜新十三支队护送阜彰吐苏联合政府成员来到奈曼，陶铸同志亲自接见了支队和联合政府的领导干部。听完汇报后，他高兴地说：“我们蒙古族中有这样一支坚强的队伍，不简单！是个很了不起的力量。有了党的领导，再加上蒙汉人民的团结，我们国家一定会得到解放和振兴，我们的革命一定能胜利！”当他看到支队的同志还穿着单衣时，眼睛立即湿润了。“这一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立即把管后勤的找来商量办法，决定由辽吉军分区给支队每人发一身单衣片和半斤羊毛。还亲自出主意，用单衣片做面儿，用身上的旧单衣当里儿，絮上羊毛，自己动手做“棉衣”，在明确支队到奈曼后的任务时说：

“你们先原地休整，一面学习，一面训练，当前主要是训练，提高队伍的战斗能力，准备配合主力部队抗击敌人，肃清库伦、宾图、开鲁、奈曼等地的土匪，扰乱敌人的部署，保护联合政府开展工作，同时帮助组建武工队、为内蒙古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支队武器不足，他责成军区补发了四十条步枪，数千发子弹；支队马少，他出面和奈曼政府协商，用支队转移途中缴获的二十几辆大车换了马，将二百多名战士全部武装起来。同时单独接见了参加支队的格口僧活佛，把他和两名日本人一起送往乌兰浩特，又指示支队选送部分负责干部到军区教导队学习。

由于斗争的需要，陶铸同志的身份当时不能公开，人们都称他为十一号首长。陶铸同志在奈曼的时间虽然不长，可在培养民族干部，组织地方武装、宣传党的政策等方面，给奈曼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在奈曼旗的土地改革工作

李兴唐

一九四七年初，以吕明仁为政委、赵东寰为司令员的东进支队，从白城子出发，过榆树，越舍伯吐，经开鲁县界，和东蒙军（司令阿斯根）一起进入奈曼旗大沁他拉。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区的扩大，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的党组织，坚决彻底的进行土改，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根据这一指示，东进支队把薛光军、王枫（女）、张良静、侯士儒和我约有三、四十人，留在了奈曼旗，开展土地改革。转眼三十八年过去了，往事如云，奈曼土改工作的情景还不时在脑海萦绕。我对奈曼几个地方土改的经历、见闻回忆如下，希望对研究、编写这段历史有所补益。

从大沁他拉到八仙筒

我们东进支队是一九四七年初到达奈曼旗的，当时各解放区多数在进行土地改革，清奸反霸、分粮分田。在行政区划上，奈曼旗属于辽吉五地委领导。划归通辽（辽吉四分区）是四八年的事。

我们来这里后，薛光军同志担任奈曼旗委书记兼土改工作团长。后来组织上又派巩绍英同志来任旗委书记，薛光军同志则专事土改工作。薛光军同志立即着手进行土改试点的组织工作。组成了几个工作队。以王枫同志为队长带领我和

侯士儒等十几名同志的工作队很快进入二区的大营子屯。这个屯姓李的地主已经闻风而逃。王枫同志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她工作雷厉风行，掌握政策稳妥，原则性强。早在延安整风时，她经住了爱人被错打成“红旗党”，对她进行审查的风浪。她胆识过人，在东北昌图县打土匪时，她单枪匹马和敌人谈判过。侯士儒是法库县城关区的铁匠，纯朴、热忱、待人和气，参加革命后，在法库县委工作，为开辟新区，随东进支队来到奈曼。我是国高毕业生，作了几年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前读过一些进步书籍，参加革命后入了辽宁省民主学院学习过《联共党史》、《整风文献》、《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东北问题》等理论政治书籍，当时是被看做新的知识分子。

王枫同志、侯士儒同志和我实际上是工作队的三个主力队员，有王枫同志这个核心领导，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互相帮助，密切配合，工作开展起来了。我们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对大营子屯进行阶级分析，清土豪、斗恶霸、减租减息、没收地主财产、分财物，进行得很快。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村政权和农会，选举了农会会长老孙、村长老秦。在这一段工作中产生了一次争论，主要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老秦是中农，人老实勤快还识几个字，当村长行不行？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民主选举结果，人们多数赞成老秦。工作队讨论也认为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还是由群众说了算好。这场争论以老秦当选结束了。

这时，旗委召开了土改试点会议，工作团、旗委的同志们对大营子的工作很满意。土改试点后，以王枫同志为队长的工作队调到了架干塔拉去搞土改工作。我又一次参加了这支土改工作队。我们有了大营子工作的经验，深入群众，发

动群众，经过反复社会调查，依靠群众挖开了地主的一个地下粮仓。这个地下粮仓就在地主园子里，上面还种菜，粮食总数约有几百石，粮食存在里边已经霉烂，光粘在四壁上的霉粮就有二三尺厚。村里贫苦群众义愤填膺。我们召开了霉粮现场展览会，群众大会，斗争了地主，教育了群众。群众决心大了，情绪起来了。这时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中间产生过火情绪：在划阶级排队时把圈划大了，有“解渴”劲头。王枫同志及时提醒大家注意政策，斗争不要搞过火了，打击面不要扩大了。在架干塔拉土改快要结束时，我们工作队有一番热烈的讨论，题目是“土改胜利后党领导农民干什么”，大家把群众反映端了出来，集中一点就是发展生产。工作队和农会统一了思想，召开了顺理成章闹大生产的群众大会，王枫责成我作“三人同了心，黄土变成金”的动员讲话。这一下和了农民的心，和社会发展规律合了拍。多少农民为盼望了多年的发家致富、摆脱贫困的愿望已经成了现实而笑得热泪纵横。王枫带领我们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培养积极分子上。这个村很快就出现了添车买马闹生产的热闹景象。架干塔拉出现一片生机勃勃的局面。

五月，架干塔拉土改工作基本就绪，我回到八仙筒区的时候，薛光军已调任双辽县委书记。旗委书记巩绍英和我谈的话，肯定了架干塔拉的土改工作，并通知任命我为八仙筒的副区长。八仙筒的区委书记赵旭刚把工作交给张良静同志，就调到浩钦苏木去了。张良静又领着工作队搞土改。八仙筒区党政的实际工作担子就落在了我的肩上。这时，已调任县委组织部部长的王枫又带队到八仙筒屯继续搞土改，这对我这个刚走上领导岗位的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支持。我们很快在八仙筒区铺开了四个土改试点：八仙筒、麻吉杆筒、北八

仙筒、庙西荒。在这段工作中，我们根据全区实际情况，在宣讲中央关于土改工作指示的同时，对工作队进行了整顿，进一步端正了工作队人员的思想，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很快建立了村政权。

七月末，旗工作队撤回大沁他拉，王枫同志调出了奈曼旗。王克同志这时来八仙筒任区委书记。虽然老同志都走了，但他们给我留下了一支基本队伍，一批积极分子，一批新发展的党员队伍，留下了党的优良传统。

一九四七年春节，我是在大沁他拉过的，这是因为旗里正在召开土改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争论的焦点是怎样对待富农、中农，怎样对待蒙古上层人物，主要是要人们端正立场，把土改进行到底。会议可能开了七八天，会议贯彻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五四指示”的方针。会议期间我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兼区长。一九四八年二、三月，王克同志调走，我担任了八仙筒区委书记。由于东进支队政委吕明仁牺牲，为了纪念他，把辽河南岸一块地方命名为明仁区。我接任八仙筒区委书记后，又到明仁区搞了两个月的土改。一九四八年初，土地改革在奈曼旗全面铺开。这时我留在区里，负责土改、生产建设以及领导工作队的全面工作。土改彻底摧垮了旧政权，彻底瓦解了封建经济，广大人民群众发动了起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一个大生产运动在解放了生产力的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了。

党在秘密中发展壮大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发自中国亿万人民心中的歌。我们一手搞土改，一手把土改积极分子中的优秀者培养成党员对象。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秘密发展党

员。李彦是我在奈曼旗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家住在架干塔拉屯西北角，家贫，跟共产党走决心大、立场坚定，入党后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李彦入党后，受到社会上的歪风腐蚀，一度犯了错误，后来，经组织帮助，又跟上来了。长工出身的程宝泉是我在奈曼旗发展的第二个党员。我们到架干塔拉后，程宝泉一直躲躲闪闪，经多次促膝谈心，才弄清他存在着“兴别人不仁，不兴咱不义”的思想，他认识字，我就借书给他看，一次又一次跟他讲革命道理，特别是联系地主埋烂粮食的事，他认清了是非，积极投入了土地改革，在斗争中入了党。与此同时，王枫同志培养翟永山加入了党组织，并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架干塔拉党支部是奈曼旗建立最早的党支部之一。这个支部在土改中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我到北八仙筒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窦光海（后来曾任四平机床厂厂长）、王树森（曾任沈阳农学院党委书记）、张凤歧（曾任北镇县委书记）、张桂芝（原在呼市食品公司工作）。在八仙筒街培养的积极分子和党员有：史文富（林区吉文林业局党委书记）、臧淑贞（哲盟妇联主任），还有已经牺牲和逝世的冯国才、钱喜等同志。

八仙筒区第一批党员有一些调出来在奈曼土改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还有些同志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调出随解放军进了关，为全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有的同志还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钱喜同志就牺牲在辽沈战役中了。

蓬勃的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八年四、五月，我被调到旗委任宣传部长，这时旗委书记仍是现绍英（后由边亭接任），副书记王克，旗长

敖力玛扎布，组织部长张寿泉。我们这个班子，在土改一结束就领导群众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的口号很响亮，也很实际，诸如：“农民当了家才能把家发，添车买马、发家致富”，“要发家，种棉花”，“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搞生产挖穷根。”在发展生产、城乡交流的大好形势下，在旗委领导下，宣传部这个工具大力宣传发展生产力，提倡闹大生产，宣讲了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又成立了一个宣传队，队长是吴富。宣传队员有傅桂英、张×忠、董桂珍、杨秋玲等同志，冯世学同志是歌咏教员。排演了“杨小林”等小型歌剧，内容是提倡养牛搞工副业，发家致富。这些活动受到了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农民的热烈欢迎。

一九四九年秋，在大生产的热潮中，我被调到开鲁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奈曼是我接触新鲜事物，受到革命启蒙教育很深的地方。土改中我从多方受到了锻炼，奈曼各族人民是我提高觉悟成长前进的老师，那里有很多和我一起向封建制度冲击的亲密战友，说句动感情的话，奈曼！我深深的怀念你！



解放战争时期奈曼旗的支前活动

王吉祥

解放战争时期，奈曼旗经过剿匪、反霸、建党、建政、建军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奈曼人民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不怕艰苦，不畏牺牲，同其它解放区的穷苦人民一道，积极地投入到战争中去，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奈曼的史册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踊跃报名 参军参战

在战争的年代里，翻身解放的奈曼人民，为彻底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积极报名参军参战，为部队输送新的血液。

一九四七年初，我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在东北战场上发起了强大的攻势。由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三月份在全旗范围内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模范事迹，层出不穷，处处可见。王府区在扩兵活动中，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一方面作好宣传工作，向群众讲清：“反动派、中央军不打倒，穷人不得翻身。”“穷人的总穷根在蒋介石身上，非挖掉不可。”“自己拿起枪杆子，保护自己的利益。”使群众真正地认识到穷困的根源，明白只有推倒三座大山，才能彻底翻身的道理。同时，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报名参军参战，

为广大群众作出表率。德隆地屯农会主任杨占山，患病卧床刚好，在说服自己的母亲之后，决定报名参军。李青山老汉是村农会候补委员，他家除了他顶半个劳力外，只有他儿子李富是全劳力，但他置个人利益于脑后，毅然决然地在群众大会上为儿子报了名，他说：“我家过去有困难，现在不困难了，房子有了，地也有了，我的小儿子要参军，这正和我心意，谁都不当兵，我们的政权谁来保护？我们到岁数人，千万别扯青年人的后腿。”并嘱咐儿子：“到部队好好干，多杀蒋匪，为人民立功。”兴隆庄村妇女干部张老太太在参军动员会上也为儿子报了名。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区在十二天内就有四十七名新战士入伍。

一九四七年八月，为了充实旗地方武装——蒙骑二师十五团的力量，改善军队成份，提高军队素质，省政府决定动员一百名青壮年战士来作补充。全旗各族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密切配合，走家串户，会上会下积极作宣传鼓动工作，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圆满地完成了一次扩兵任务，使蒙古骑兵二师十五团成为一支精悍的武装部队。一九四八年四月，这支部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配合我军秋季攻势的胜利，在全旗范围内展开扩军宣传后，十天左右，全旗就有二千余名蒙汉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军。

一九四八年春耕前，全旗搞完了平分土地运动。贫苦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粮食、衣物等各种果实，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家家户户无不兴高采烈。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仍在蒋管区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全旗分春秋两季共送出新兵九百九十二名，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一九四九年五月，奈曼人民又在锣鼓鞭炮声中，欢送了二百三十名新兵应征入伍。八月份，又补充了二百零三名新兵加入了正规军部队，挥戈南下，去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乡亲们把参军看成一件大喜事，每当一批青年即将走上前线之际，各村、屯就组织人员对新战士进行慰问、饯行。妇女会给他们做新鞋，绣“光荣参军”袖章；农会送毛巾、被子，给换上新衣服；儿童团给戴大红花，左邻右舍争先恐后地请吃团圆饭。十里八村的人们，也扶老携幼地到旗政府所在地大沁他拉街欢送。锣鼓声鞭炮声，震耳欲聋，入伍青年胸前佩戴大红花，精神振奋，英姿飒爽。在这欢乐的气氛中，父母叮嘱儿子听党的话，要为人民立功。妻子告诉丈夫不必挂念家，表示一定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邻里百姓们都鼓励他们多杀敌，多立功，为家乡争光。奈曼的无数优秀儿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就是这样一批批走上战场，为祖国解放贡献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四七年初至解放战争胜利，奈曼旗参军人数达三千四百五十六名，并有一支地方武装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组织战勤 支援战争

一九四七年九月末，根据路西分委、哲盟办事处指示，为了争取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奈曼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支前活动。

1、组织担架队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根据前方作战的激烈情况，需要后方增援担架队。遵照辽吉省政府命令，奈曼旗迅速在南部七个区组织了六百多人、一百付担架的担架大队，于本月十

七日集合在白音昌区公所，出发之前，旗政府领导作了战前动员讲话，并将担架队编为一个大队，由耿晨刚任大队长，陈景阳任副大队长，进行战前整训，对队员带的物品做了较细致的检查。时隔不久，接到了出发的命令，全部人马立即赶到库伦旗的下石碑村待命。当时，由前方部队派来的一位同志，与担架大队接上了关系，并对担架队员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战前教育。

十二月上旬，这个担架大队划分为两个大队，随我军某部二十师行动，正式开赴前线，两个大队的番号分别为二十师八大队，二十师十大队。二十师八大队由陈景阳担任大队长，二十师十大队由耿晨刚为大队长，各带五十付担架。两个大队随部队在彰武、新立屯、新民县、北镇、黑山等地巡回活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盘踞在彰武县城附近的高山台山上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地进攻，高山台恰似这座小城的天然屏障，国民党军队凭借有利地形，龟缩在山上，并将山坡泼水冻上了一层冰，给我军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二十师十大队，在高山台的西北角，负责转运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伤员，队员们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及时地把伤员安全地护送到后方兵站。经过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全歼了高山台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彰武。

解放彰武，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激励了我军和担架队员的斗志，大家纷纷表示，要求跟随部队打过江南，直捣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时置隆冬，寒风刺骨，队员们的穿戴都很单薄。为了继续前进，部队立即派十多名同志回奈曼取棉衣，其余同志在彰武等候。这期间他们帮助老乡担水、打柴、扫院子，发扬了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受到群

众赞扬。约十天之后，担架大队接到命令，要求全部返回，旗政府另派北部地区的担架队接替他们。接此命令，全体队员才不得不返回家乡。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军冬季攻势取得了可喜的胜利，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日趋削弱，我军力量日益壮大，东北的战局处于决战的紧要关头，需要后方大力支援。十月上旬辽吉省政府命令奈曼旗再出一百付担架支援阜新解放战争。八仙筒、浩沁苏木、白音塔拉等北部地区迅速组成担架队，在八仙筒区集合，编为一个大队，由孙占奎担任大队长，经过几天的整训后，全部人马顺章古台区南下。当到库伦旗扣河子村时，接到省里命令，阜新已解放，担架队原地待命。过了一段时间，奉命返回。当路过奈曼旗衙门营子区时，正赶上旗里领导同志和从部队来的干部在该区扩兵。于是，就从担架队里动员队员们加入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当场就有五十多名队员应征入伍。其余队员回来后又重新组织了六百多人，一百付担架的担架大队，等待命令。

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旬，接到了出发的命令，全体队员不辞劳苦，日夜兼程，取道黑山、新立屯，直奔沈阳。与部队取得联系后，原大队又分两个大队编入第七纵队二十师随军服务。由于当时沈阳城内集结着一大批国民党军队，兵力较强，我军改变了原来攻打沈阳城的计划，先攻打盘踞在沈阳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龟缩在苏家屯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进攻。担架队员们与部队密切配合，奔波在战场上抢救伤员，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解放了苏家屯，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苏家屯刚一解放，担架大队又跟随部队经沙河站向四平

进军，参加解放四平的战斗。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封锁很严，部队改为夜间行军白天宿营，辗转了六七天，来到了目的地。三月八日，攻打四平外围的战斗打响了，担架大队同部队一样，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抬送伤员。经过四天四夜的浴血奋战，将四平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扫净。十二日清晨，开始围攻四平，刹时，火光冲天，枪炮声震耳欲聋，国民党军队晕头转向，弄不清我军的攻击目标，我军很快攻占了四平北山的制高点，设置了炮兵观测所和炮兵阵地，使国民党军队的火力受到了压制，难于发挥。解放军战士和担架队员们一个个士气旺盛，奋勇杀敌，双方密切配合，将敌军的据点一一攻破。当日深夜，炮声隆隆，整个四平城内恰似火的海洋，映红了半个天空。担架队员们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指战员们一鼓作气，攻破了敌军的最后一个据点“红万字会”。解放了四平，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为支援辽沈战役，全旗人民响应旗政府和旗战勤委员会的号召，积极出人，出担架、出绳子、毡子等，很快就组织起来四百付担架。王府区、西地区、沙口浩米区、上城子区、衙门营子区、大歹区、章古台区、白音塔拉区八个区各设一个中队，八仙筒区、浩沁苏木区两个区设四个中队，全旗总共设立了十二个中队。六月末，旗战勤委员会对全旗十个区的担架、人员及备品、衣服、鞋帽等准备情况进行一次周密的检查。做到人员、组织、装备三落实，随时准备开赴前线。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下，攻克了昌黎，切断了锦榆线，断绝了华北国民党军队增援东北的陆上交通，开始对盘踞在东北境内的

国民党军队发起声势浩大的进攻，把辽沈战役推向了高潮。

我军切断锦榆线之后，经过八天的浴血奋战，先后攻克义县、锦州，继续东进。于十月二十日，在辽西会战，全歼了廖耀湘西进兵团，随后兵分两路，向沈阳、营口急进。十月十九日，我军解放了长春。翌日，挥师南下，直指沈阳。国民党不甘心在东北的失败，大部分军队都集结在沈阳，企图负隅顽抗。形势越来越紧张，一需要速战速决，二需要后方增援力量。十月十日，奉哲盟政府命令，奈曼旗又出一百付担架。本月十五日，旗政府命令南部衙门营子区、大歹区、沙日浩来区、土城子区，四个区组织一百付担架，共六百多人。每区为一个中队，中队长由区干部担任，小队长、分队长均由村干部选派觉悟较高的同志担任，每区又选派两名较强的村干部任指导员及司务长，并出一名通讯员。四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旗政府选派一名干部任大队长，沙日浩来区派一名区干部任副大队长，并由大歹、衙门营子两区各选一名村干部任管理员。二十日又接到哲盟政府命令，令我旗再组织二百付担架。于是，由北部七个区组织了二百付担架，一千二百多人，组成一个大队。这样，两个大队共有两千零九十九名队员，整装待命。二十六日，接到盟政府命令，南部四个区的担架大队及部分大车，于二十八日夜晩，从马家洼子村出发，到后旗彰古台车站待命。另一个大队也于二十八日集合到八仙筒街，次日，向通辽挺进。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东进的北部区担架大队赶到浩沁苏木区时奉命返回，八日（此时辽沈战役已结束，南部区的担架大队驻扎在新民县下崖，长岗两屯，随某部独立三营服务。驻勤中，大队长动员全体队员一方面搞好宣传活动，一方面帮助新区老乡搞好生产。给老乡扫院子、扫大街，挑水、做饭、

抹房子、打柴、锄草等，另外还帮助村里成立农会和学校。据统计半个月的时间他们给老乡抹四十间房子，起一百车粪，编十五领炕席和十多块折子锄七百多斤草，受到了新区老乡的欢迎。在返回时，两个屯的老乡自动赠送了四面“爱民模范”奖旗，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末，全旗共出动担架六百付，队员四千多人。

2、支援车辆

为了保证前线的物资供应，奈曼旗充分发挥后方根据地的作用，积极地组织车辆，为前方部队运送大批军需物资，仅四七年五月至四八年末，全旗就出动二千三百辆车次。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旗政府派牛、驴车共四百一十辆，组成了运输队，为前方部队运送物资，往返七十五天，于八月十五日返回。同年十月，前方来信，要求我旗派十八辆大车，帮助运输军需物资。旗政府派南部白音昌、大歹、衙门营子、西地、土城子、沙日浩来六个区各出动参辆大车，于本月十六日在马家洼子集合待命。二十二日，旗政府又派二十辆大车帮助卫生处迁往前线，十一月十九日接到辽北省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通令，前线急需大车，命我旗组织三十五辆大车，编为一个大队，每辆车套三套马和四套，并选熟练车夫二人，每十辆或十二辆为一小队，大队干部由政府派人担任，出发时将我旗公粮载上一部分，运到阜新的莫古土、平安地一带。

一九四八年一月，为了支援爱国保田自卫战争胜利，我旗根据前方需要又派了四十辆大车把供给处搬到前方。六月十九日，前线急需粮食，奈曼旗政府，旗战勤委员会，根据辽北省第五专署指示，组织了四百辆大车，将奈曼旗的公粮运到福兴地，保证了前方部队的粮食供给。十月二十六日，

根据盟政府指示我旗又组织五十二辆大车支援前线。

3、修补公路，保证运输

解放前夕，奈曼旗境内的公路大小近十几条，其中最主要的有大沁他拉至通辽和承德等地的公路，随时都有部队民伕路过，转运伤员和军需物资的车辆也源源不断。当时，奈曼境内的公路就是土路，一到雨季，交通常常中断。为此，奈曼旗各旗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出动大批民伕抢修公路，架设桥梁，保证了前方部队军需物资运输的畅通无阻。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根据辽北省政府，西线后勤司令部联合通令，对旗的交通要道八仙筒至下洼的干线，大沁他拉至福兴地的干线，土城子至福兴地的支线，均由各管理区组织民工进行修整。十月份，旗内由二龙山至八仙筒、大沁他拉至八仙筒和八仙筒去开鲁的一段公路，各管理区民伕仅用三、四天的时间就全部抢修完毕。到四月二十日，大沁他拉至下洼的公路也修整一新，及时地保证了军需物资的运输。

捐献物资，支援战争

全旗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号召，自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捐募物资，保证军队作战的需要。当时奈曼旗刚解放，人民的生活还不算富裕。但是为了解放战争早日胜利，奈曼旗人民节衣缩食，提出每人省一斤米，一尺布，每头牲畜节省一斤草，一斤料来支援前线。村村户户积极地为前方部队制做军鞋、军袜、出粮、菜、草、料、柴等。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奉东蒙人民自卫军兴南地区司令部，兴南地区行政公署命令，为前方部队制做了五百双军鞋和五百双军袜。翌年九月，又为前方部队制做了一千五百双

军鞋和二千双军袜，同年，为了保证前方骑兵部队的建设，抽调了二十三匹精壮骑马和二十五付鞍具，送到前方。并为旗地方武装蒙古骑兵二师十五团提供骑马六十五匹，鞍具十五付，增强了十五团的战斗实力。

当时，经常有部队和运送粮草、伤员的车辆路过奈曼，为了解决供给问题，在全旗境内设立了四处兵站，那里堆集着粮、草、料供过往部队食用。据不完全统计，为前方部队供给饲草七万多斤，马料三万多斤，烧柴五万多斤，另外，还供给了大量的食粮和蔬菜。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前方部队四十名伤员来到我旗休养，旗政府一方面动员群众慰劳伤员，一方面给予治疗，并派去人安置住宿，给伤员喂水，喂饭，上药等，经过精心的护理，使伤员很快痊愈，返回部队。

拥军优属，慰劳部队

奈曼旗各族人民在大力支前的同时，积极作好拥军优属工作，解除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在拥军优属活动中，军人的家属不但在政治地位上得到了尊重，而且在物质生活上也得到了照顾，真正地提高了军属的社会地位，一九四七年六月，根据哲盟办事处的指示，军属对政府发放的各种贷款享有优先权，在土地分配上享有优先权，并可优先参加各种互助组织或合作社，对其公粮征收和其它税收减征百分之十至二十。军属子弟入学时免收学费，对缺少劳力的军属出租的土地不搞减租减息。同时，各区、努图克组织了助耕队，为缺乏劳力的军属耕种土地，从而免去了前方将士们的后顾之忧。

逢年过节各区、努图克都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优属活

动。发动群众捐募肉、菜或现款，村干部带领秧歌队敲锣打鼓，给军属拜年问好，挂光荣匾，送肉送面，让他们欢欢乐乐地过年过节，减轻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据奈曼旗委会出刊的《工作通讯》记载，四八年阴历八月十五前夕，全旗开展了一次拥军优属活动。大沁他拉街的士农工商一天之中就动员了七十万元现金，农会又从生产款中拿出四十万元，计一百一十万元。（一万元等于人民币一元）买猪羊肉一百九十五斤，分给了全街四十户军属。同时，请三十九名军属开了座谈会，大家纷纷表示要当模范军属，努力搞好生产，支持亲人在前方多杀敌多立功，为父母，为家乡争光。

全旗人民为了表示对前方指战员的敬意，曾多次派出慰问团，长途跋涉奔赴前线，向指战员们赠送慰问品，慰问信和锦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正值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发起的秋季攻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奈曼党政军民为了鼓舞我军的斗志，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劳军、慰问活动。全旗捐募物资有，猪十七口，羊一百七十只，鸡七十五只，鸡蛋三百七十枚，旱烟一千九百零三斤，粉条三百三十一斤，小麦六斗，荞麦三百一十九斤，奶豆腐五十三块，奶皮子十四块，黄油四斤，现款二十一万三千六百九十元，带着锦旗和慰问信，由二十多人（其中十名妇女）组成一个慰问团，赶着两辆大车，满载着全旗人民对解放军的深情厚意，冒着严寒，爬山越岭，起早贪黑，赶赴前线慰问亲人。

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全部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东北各族人民结束了苦难生涯。为庆祝我军解放东北取得伟大胜利，全旗各族人民积极响应旗委和政府的号召，争先恐后地捐献慰劳品，再次掀起了支前劳军高潮。村村开庆祝

会，校校办秧歌队。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军属都写慰问信，妇女们作了慰问袋，有的老太太将自己保存的鸡蛋，精心喂养的小鸡拿出来亲自送到区上。大歹区仅用三、四天的时间就募集了六车慰劳品，运往前方。

奈曼旗在解放战争中，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革命战争，这种无私的奉献，将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

(《奈曼旗参军参战及军属统计表》附后)

奈曼旗参军参战及军属统计表

项 目 区 别	户 数	参 军 人 数	军 属			参 战 数			占 总 人 口 百 分 比
			户 数	人 数	劳 动 力 数	人 员	车 辆	牲 畜	
章古台区	2,030	190	166	1,131	279	100	7	11.95	
衙门营子区	2,492	393	345	2,275	592	510	126	703.03	
白音他拉区	3,105	362	346	2,112	454	451	152	262.28	
大歹区	2,309	324	299	1,904	617	312	65	163.03	
土城子区	1,635	293	248	1,475	952	454	143	6733.62	
西地区	1,563	344	315	1,896	465	390	182	3.79	
沙力好来区	2,057	340	315	1,923	482	709	304	493.11	
八仙筒区	5,370	588	558	3,718	738	1,699	383	202.18	
王府区	2,172	305	267	1,751	416	394	228	9122.09	
浩沁苏木区	4,655	317	307	1,713	374	737	460	1,5941.43	
合 计	27,438	3,456	3,165	19,998	5,369	5,756	2,050	3,3712.24	

备注：1、参军包括主力、分区部队及地方武装。
2、参战系指出担架、大车及运粮等勤务(运粮只算出县的)。

奇袭小西梁

马德山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午夜，因借道不允而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流血战斗，这就是当时轰动奈曼旗的奇袭小西梁战斗。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的几个月里，东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凭借美式现代化武器的优势，到处强占地盘，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和部分重镇多被中央军盘踞，其表面的强大确也蒙骗了不少群众。国民党虽没有踏进奈曼大地，但议论国事，关心形势发展的人却很多。在奈曼旗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关注。末代王爷苏达那木达尔济抓住风头，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勾结了何文章、洛不等之流，经过予谋，把伪官吏、伪国兵及地主、牧主等地方势力组织起来，为保护自己的统治及上层的利益成立了所谓的维持会。于是在全旗范围内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约五百人的地方武装——保安队。这伙人名为维持奈曼旗的治安，实则是为迎接所谓的“正统”——国民党中央军而作准备。这伙人在全旗范围内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刚受完亡国奴之苦的人民，生活又失去了平静。

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指导下，本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原则，我八路军张学思部先后进驻了北票、阜新一带的广大地区。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其前沿部队已接近了我奈曼旗的南梁村。部队准备继续北上开辟新区。而奈曼

旗的义隆永至大沁他拉一线是必经之路。为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本着友好的精神，某部侯参谋曾派人几经同保安队协商，并一再阐明观点，只是借道，别无企图，保证秋毫不犯。然而，全被保安队拒绝。在这种形势下，为完成北上的使命，侯参谋以克制的态度带领几名战士于一月初亲赴大沁他拉再次协商。接见侯参谋的是何文章、洛不等几人，他们如临大敌，严加防范，犹如八路军就要打进来。然而，谈判席上，身着羊皮袄的侯参谋却以诚相待，平易近人，晓之以礼，侃侃而谈。他从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的腐败，一直讲到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军人的气质和风度。侯参谋的到来，赢得了很多有识之士和百姓的赞赏与支持，经过谈判，何文章也有所动摇。这就引起保安队内部意见不一，在借与不借道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坚决反对，有的则表示同情或暧昧。最后还是以洛不等为首的多数在苏达那木达尔济的支持下战胜了以何文章为代表的少数暧昧派。结论是坚决不借。

侯参谋返回部队之前，还一再向保安队告诫。认清形势，要识时务。苏达那木达尔济和洛不等一伙深知问题严重，于是经过精心策划，把保安队的大部人马调到防守的前沿，企图阻击八路军的所谓进犯。洛不等、何文章带领一部分人马驻守在交通要冲——小西梁（距南梁村仅二十华里），苏达那木达尔济带领一部分人马续后，驻扎在扎兰湾子（距小西梁不足十华里），以听动静，紧要关头，准备驰援。

为完成北上的任务，我八路军某部不得不采取果断的措施。经过几番周密地侦察，牢牢掌握了保安队的人数、装备及其战斗力等底细，随及派几名战士化装成卖酒的小贩子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午后到了小西梁村。保安队的成员中

许多人都是酒鬼或赌徒，所“贩”的酒被他们买抢一空。为防止保安队的怀疑，“小贩”们借机住了下来，准备接应。

午夜，正当保安队喝醉沉睡和打牌寻欢之际，我部队两个连的兵力把小西梁包围起来。当部队摸到了地主李凤和的土围子墙根时，放哨的保安队员才发现了情况，未等还手，就在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中上了西天。手榴弹爆炸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吓得醉眼惺忪的保安队员不知所措。在毫无准备和目标的情况下，便胡乱地打枪，企图保住土围子。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大墙的一部分炸倒了，炮台也被炸塌了。站在西北炮台里的何文章高喊什么“大家不要怕，要顶住，后边的人马很快……”话还未说完就被手榴弹炸飞了脑袋。树倒猢猻散，何文章一死，顽抗的队员看到大势已去，就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当时洛不等带领的一伙人住在土围子外的另一个院子里，见势不妙，狼狈逃跑，才幸免被歼。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问题。住在李家大院的二十四名保安队员死亡八人，其余全部被俘。

奇袭小西梁是我部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取得了胜利，还仍然遵守信义，对俘虏进行了教育后陆续地释放了。因何文章在谈判时趋向于借道，故把其尸体装进棺材埋上了。

前进的道路打通了，也赢得了群众的信誉。

损兵折将的保安队如惊弓之鸟，未敢返回大沁他拉而取道三道古街一直往东逃跑了。我八路军某部为执行战略任务，经奈曼顺利地挥师北上了。这是最早来奈曼的八路军部队，他们秋毫不犯，爱护百姓的举动，不仅给奈曼的广大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引起了保安队内部强烈的反思。

特殊的使命

——护送吕明仁烈士灵柩

那德木都 口述

马德山 整理

内蒙古骑兵二师十五团，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在开鲁县的船营子一带休整，以备协同辽吉军区的潢水部队、长江骑兵团和蒙骑一师等兄弟部队迎接更艰巨的任务。

四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二连三排的部分同志热烈地议论着东北战局的大好形势和表述着彼此求战心切的心情，突然连部来人告诉我到团政治部去一趟，并且说越快越好。我当即安排了一下排里的工作就到了政治处。这时特古斯政委正在等我。一见面他就严肃地对我说：“团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你看有什么困难吗？”

“没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我立即作了回答。

“你们排现有多少人，战斗情绪和武器装备怎么样？”

“共三十八人，个个求战心切。四十匹马，其中有两匹是备用的。机枪一挺，爆破筒六根，每人一支大枪，一百发子弹。”

“要到远处执行任务。”

“可以，只是有五六匹马的鞍伤未好，需要调换一下。”

“好，把伤马换下来，把年纪大的战士留下来，然后从

二连其他排调一个精悍的班补充你们。再给你一挺机枪，并让政治处的干事财音勿力塔任你们的临时辅导员。”

“马上出发吗？”

“这不要急，到时候通知你。”

当我离开政治处时，特政委边送边叮嘱我：“至于什么任务，什么时间行动你不必打听，也不必和战士讲，只是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待命。”

我回到连部后，立即向指导员高海清作了汇报。经研究从二连一排选出由梁根德加卜为班长的精悍班补充了三排。一切准备都象一级战备那样，只要命令一下就能马上到战场。战士询问时，只是以“准备战斗，有特殊任务”而答复。

第三天，我们带着团部的介绍信急驰到开鲁，并向地委的梁一鸣同志报了到。他看完介绍信，就把我们安排到事先已准备好的大车店住下。同时还告诉我们好好休息，待命执行重要任务。

次日一早，我们排奉命到开鲁政府院内报到。院内有个席棚，里面放着一口棺材，旁边有两名持枪的战士守灵。整个大院肃穆庄严，一位年青的军官走过来严肃地向我们排交待了任务：“从现在起，由你们排负责守灵，未经允许，不准任何人接近灵棚，发现情况，要立即报告。”到这时，我们才有所醒悟，意识到是吕明仁烈士的灵柩。吕明仁同志当时是辽吉一地委书记，因工作从开鲁返回奈曼时（奈曼是地委的临时驻地），为在老哈河抢救落水的警卫员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一个小时后，梁一鸣同志带领十几个人来到了烈士的灵前，大家一起鞠了三个躬。当把棺材盖揭开后，一个身着黑制服的女同志首先上前瞻仰烈士的遗容，当他发现烈士的嘴

有点微张时，便俯下身子用手往上提了提。随后她就举起右手庄重地说：“明仁同志，你放心吧，我一定踏着你的足迹迎着困难，加倍工作，完成你的未竟事业。用你的业绩教育好孩子，让他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安息吧。”然后又用毛笔把话写在一块白布上，贴在靠近头部的棺材里面。在场的人又共同三鞠躬，以表示对吕明仁烈士的深切悼念和尊敬。接着用三道铁丝子把棺材箍紧，缝隙处又封上了黄蜡。这时我们才知道那个女同志就是明仁烈士的爱人——丁修同志。她没有流泪，只是从微咬嘴唇的表情看，她在忍受着巨大的悲痛。

简短的仪式之后，梁一鸣同志便向我们排交代了任务：“安全的把吕明仁烈士的灵柩护送到白城子，就是你们排的任务。沿途要严加防范，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遇有敌人抢尸，宁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弃灵逃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首先开枪。明白吗？”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全排战士齐声回答。

任务明确之后，梁一鸣同志便和我们排一起出发了。

为防备不测，沿途的护卫是这样安排的：灵车前二百米一个班，左右二百米各一个班，梁一鸣同志带十几个人尾随于后。

从开鲁出发，沿小街集、舍伯吐、大庙等地一直向白城子进发。每到一地，都有当地的领导和群众迎送。晚上，群众自觉地搭席棚，点油灯，摆各种祭品，以表对烈士的沉痛悼念。值班的为五个人，三个为固定的，两个是游动的。当灵车到达大庙时，那一带正有一股土匪进行骚扰。当地的干部和群众曾请我们去剿灭，但考虑到我们的特殊任务，只好谢绝了。为了安全，这一夜我们特别加强了戒备。七八天之

后，我们就接近了突泉，还未等进街，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出来接替了我们。交接之后，梁一鸣同志对我们说：“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你们排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途中还为群众做了几件好事，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高尚品质。这一切我将如实地反映给你们团……”接着我们又接受了另一重要任务——护送奈曼旗代表到王爷庙（乌兰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大会。

在突泉，我们见到了包忠爱、钢嘎木仁和敖力玛加卜等二十余名奈曼代表，并把他们安全地送到王爷庙。休息几天后，我们又护卫着蒙骑二师的七辆军需品火车顺利地返回了通辽。



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简介

张 宇

1987年六月七日，奈曼旗考古工作者配合内蒙古自治区考古队，在奈曼旗东南山区发掘一座辽墓，出土一批罕见文物。这是我国考古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发现。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对重新评价我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在缔造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历史贡献，及深入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现将墓葬发掘情况简介如下：

一、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

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位于大沁他拉镇的东南部，约80公里，距青龙山镇约十公里。镇的东北，斯卜格图屯北，镇大苹果基地的山洼里。背靠庙山，海拔高度624米。西、北、东三面群山环抱，山上苍松翠柏，台地上果树成行，红绿相间的深秋密林，景色秀丽。墓前方是栏洪蓄水大坝，每当雨季，飞流瀑布冲灌池中。平日涓涓细流长年不息。坝前是大川溪水，四、五华里的开阔地。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就在蓄水池面北角的边缘上。

二、墓的结构与形制

经过20余日的破土发掘，已全部披露。依次是：由上而下是墓道、天井、墓门及门楼、甬道、对称左右小龛、对称

左右耳室、主室等几部分组成。是仿木建筑的砖室墓，总长15余米，最宽处约7米，墓向南偏东 46°

（一）墓道

墓道为斜坡阶梯形。倾斜坡度 15° ，内宽外窄敛口，向外拾级而上计16阶梯，阶梯高10—15厘米不等。宽30—40厘米。斜长6.50、水平长6.15米，生土台阶。

墓道接天井处，底宽1.25米、向外收敛，至地表一级、底宽1.10米。

墓道的横断面为梯形，上宽下窄。靠天井处，上口宽2.47米，下口宽1.25米；至地表一级，上口宽1.85米，下口宽1.10米。

墓道至天井处高4米，至地表一级高1.28米。

墓道和天井处前壁均抹白灰，长7.60米。墓道左右两壁抹一层厚约0.6—1厘米的黄土泥，泥上先后抹两层白灰，厚约0.6—1厘米，表面彩绘壁画。

墓道用杂花土、碎石、断砖填实。接近阶梯时碎石较多，偶而出现大快石。

（二）天井

天井呈长方形。前抵墓道。临阶为界，后接墓门是拱形的立壁，上宽下窄。接墓门处的立壁垂直高度为4.45米，立壁长度上宽下窄。上口长度为4.50米，下口长度为4.20米，左右两个侧壁上宽0.75米，下宽0.62米右壁现存两层立砖，左壁三层立砖，其高各为0.34、和0.63米。

左右侧壁及接墓道的转角处，由上而下抹三层白灰。天井内回填黄土、碎石、砖瓦、石块和木门飞檐上被毁掉的滴水、瓦当混杂，又因门楼上的筒瓦和瓦当各为一体，半干后粘合，其联合体又不甚牢固，回填土时全被撞落于天井内。

瓦当为环形乳钉状，园内为五角或四角的凸起。

滴水呈等腰三角形，空心底。花缘锯齿纹饰。

天井回填土掘下二米处，披露封门砖，塞满墓门及天井两翼。上一层是卧砖，下十四层为立砖，高达2.65米。砖是长方体，长短、宽窄、厚薄不等，长35—37、宽15—17、厚5—7厘米。

天井与左右侧壁，从上至下第一层一行卧砖，第二层至第九层并排两行立砖。砖与砖的缝隙均由白灰灌浆。

封门砖从上至下，到第八层砖起，内凹外凸，呈弧形。

（三）门楼与墓门

墓门的门楼为仿木的砖雕砖磨建筑。门楼正面为仿木建筑的雕彩斗拱，部件有的砖雕，有的影作。门楼的立壁高度，4.45、上宽4.59下宽4.25米。

门楼的斗拱、飞檐、椽头、楹柱为砖雕；砖磨栏板；横梁为影作。门楼的正面抹一层白灰，厚约0.1厘米，其上彩绘勾线

墓门券顶呈园拱形。高2.65米，宽1.93米，进深14厘米装有木门框，门楼高2.09米。墓门的门槽和门框底坎槽宽17厘米。左右两立框厚14厘米；宽20厘米；长2.31米；下坎厚约14厘米；宽16厘米；长2.39米构成长方形木框，因木门已腐朽，倒于甬道内。门板上有铜质鎏金的门鼻、插棍、锁蕊、铜钥匙。门板虽以散乱，但可以断定为对开的双肩板门。

上坎的上部有弧形的木质门额，内外抹白灰，板厚约2.5厘米，内外抹白灰各厚0.6—1厘米。

拱形墓门外的颊框，宽2.22米；高2.85米。门额上部，颊框左右角有一对对称门簪，宽14厘米；厚10厘米；里外凸凹距8厘米，用两层平置的磨雕砖，四周呈半圆形槽，颊框

墓门向外凸出3厘米。

颊框左右的外侧各一楹柱，高3.1米；宽20厘米，中间凸起，呈半圆形，楹柱涂硃红色。柱顶为一斗三升的斗拱一朵。墓门立顶的中间也有一朵与两翼相同的一斗三升的斗拱。拱下设楹柱，斗拱与斗拱之间有上下影作、横梁。横梁下，斗拱底有上下影作拦板。檐板上卧22根磨砖椽头，椽头上有砖雕飞檐，飞檐之上有22根砖雕飞椽与椽头上下相对齐。飞椽之上有砖雕笆板上卧滴水、瓦当。脊瓦珑与迎面瓦当17垝，瓦珑沟与迎面滴水16个沟。脊瓦垝滴水沟、瓦当均做倾斜流水势。瓦珑顶部卧上下两层横砖，扣一排瓦。门楼顶部。砌立砖上下三层白灰灌浆。其建筑坚实耐久，砌雕精巧，磨砖细腻，影作可以以假乱真，彩绘新颖独特。

（四）甬道与小龛

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2.48米，宽1.93米。左右两壁从下至上2.10处起券顶，呈半圆形拱，通高2.65米地面铺方砖（30×30）平方厘米，厚6厘米。左右接近墓门处，有两个对称的凸字形小龛，高62厘米；宽40厘米；凹深30厘米。

甬道左右两壁与拱形券顶，白灰抹面。厚约1厘米，其上彩绘壁画。

从起券顶的顶部砖开始，至甬道顶部的砖，厚约1.10米。

（五）耳室

左右耳室置于甬道的中部，相互对称。左右耳室均为蒙古包式建筑，穹窿顶。耳室为圆拱形门通高1.53米；宽0.82米，左耳室门进深0.87米，地面为圆形，直径1.58米，室壁略内收，呈穹窿顶，通高2.43厘米。周壁与穹窿顶均抹白

灰，厚约1厘米。地面铺长方体砖，长36厘米，宽17厘米，厚约5—6厘米。

右耳室门洞进深84厘米，耳室地面呈圆形，内直径为1.64米，周壁从下至上1.34米处，起券顶内收穹窿顶。

左、右耳室均安装木板门，但已朽烂倒落于甬道和耳室内，门板厚约2厘米，宽22—23厘米不等，长近1.2米，板上安铜质鎏金门鼻。

左、右耳室门上均有木质门额。呈拱形，板厚约2厘米，高三厘米，内外抹白灰厚约1厘米。

左、右耳室原设有门框，因年久木朽倒落，仅存框槽痕迹，宽6厘米，深2厘米，槽内依然存留朽木痕迹。门的两侧下方各有一长方形槽窝，长25厘米；宽14厘米，槽深部分5厘米，为门框的门墩槽。

左、右耳室的墙壁，各发现一段18厘米长的水纹痕迹，距地表1.38米—1.40米，据断定为墓渗透水痕。

(六) 主室

主室位于甬道的后部。标准的蒙古包式建筑。

甬道通主室有墓门，内呈圆形，周围镶嵌柏木护壁，内设尸床、祭台、作穹窿顶、压盖顶石。

墓门通高2.65米；框高2.10米；宽80厘米；厚15厘米。现残高1.84米。下坎原出土地面6厘米；宽14厘米。上坎宽14厘米；上下坎厚度为22厘米，上坎顶部为弧形拱式空心门额。

墓门门板厚约为5厘米，残高为1.24米，宽20—28厘米不等。门板与框用铜质鎏金合页固定。合页展开后呈长方形20×16平方厘米。每片上下各三个铆钉固定。合页用三接管，中间用插柱相接。

倒塌甬道一方的门板上，有铜质鍍金的铜锁，铜钥匙，门鼻子，铜插棍，从合页转动分析，可以断定是外开的双扇板门。

主室内地面呈圆形，直径为4.45米（不包护壁的柏木方）周围立壁，由底至上2.10米处，开始起券，逐层迭压内收，作穹窿顶，至顶部由九块立砖砌做外切正九边形，上压盖顶石，内切圆直径为48厘米，主室通高3.97米。

主室内壁抹白灰，厚约1—2厘米，然后镶护壁的柏木方，随墙壁的形状，柏木方做弧形，镶于墓室周壁。木方长1—1.15米不等，宽13厘米，厚15厘米，一端为凸起形，另一端为凹陷形，相互衔接，凸凹吻合。柏木方中间有一长方形凿孔，长10厘米；宽4厘米，上下柏木方以木楔固定。从下至上十五层柏木方，然后起券。2.10米处以上，用长1.10米—1.20米；宽17厘米；厚5厘米的柏木板迭压内收，木板两端仍以凸凹相接，中间以木楔固定柏木板，贴顶起券的砖上抹白灰，厚约4—10厘米；顶部残存木板8—14层；白灰上残留木板的痕迹22—23层。木板是否券至顶部迹象不明。但残存的板木方8—12层。主室的周壁由一层横卧和一层竖卧砖逐层迭压内收。主室铺方砖30×30平方厘米，厚约6—7厘米。

尸床位于主室正面（偏西北方向）呈长方形，贴主室的面北壁呈弧形。西南东北方向长2.61米，宽1.90米（包括弧形部分）。尸床脚下和头部宽1.40米，高36厘米。用长36厘米，宽17厘米，厚5厘米的长方体大砖平卧起台，尸体两端各有三个柿蒂形小龕，龕高28厘米，宽36厘米，向内凹深5厘米，内绘牡丹花卉，正面两侧各有同式样的两个小龕。

尸体置于尸床之上，头东北，脚西南，头向北偏东40°

主室正中央设祭台，紧贴尸床正中，呈长方形。长1.54米；宽71厘米；高52厘米。其正面设四个小龕，两端各两个小龕，与尸床两端小龕样式、大小、绘画纹饰完全一样。

祭台和尸床的大砖型号完全相同。平卧砌成。

尸床5层砖，祭台七层砖。

三、壁画

（一）墓道

墓道左壁，绘黄马和一契丹服饰的侍从。黄马装备齐全。鞍饰以银白色。前后辮、羈鞞齐全。鞍的前后轆，笼头（羈）、缰绳（轡）扯勒、捎绳均饰以银白色均匀小动物，每隔5—6厘米1件。鞞为银白色。

马的双耳一耳显有缺口，银白色的鞍饰以云纹。蹬分内外各坠一支。马身高1.23米。身长1.73米，门鬃束以结，眼球在回填土时被砸陷，黑灰色的马尾细长，中束以结。

马前有一契丹服饰的仆人，身高1.49米。髡发梳刘海，眼帘下垂，八字小胡须，右手执轡，左手擎鞭，身着圆领与膝平的短袍，腰束板带，衣之下襟上提压于腹前带上，衣着青颜色，衬以白色内衣，淡绿色的裤子。足蹬银白色皮靴。牵马人从内廓缓缓步出，显得文雅而又虔诚，似在耐心等待他的主人。黄马鬃尾乱套，昂首前视。显得精神而又健壮。

右壁黑马身高1.15米，身长1.60米，四蹄毛色不清。马的门鬃中束以小结，身上饰以鞍，鞞、辮、羈、扯勒、嚼环，样样齐全，银白色的鞍，灰白色的鞞，绘以黑绿相间的云纹，银白色的轡、羈、捎绳，均无白色小动物饰件。马僮立于马前颈部左侧，右手拉羈，左手擎鞭，依附左肩上。拉羈的右臂向前曲伸至马颌下。捧马人头梳髡发，作刘海式，发缕

垂于两颊，双耳前照悬垂，鼻上八字小胡，颌下垂须，项后髻。身着圆领青绿色与膝平的短袍，腰束革带，腹前配带饰，衣襟掖于带下，裤子着黄色，足蹬黄色革靴。身高1.54米。

墓道左右壁，各绘廊檐式对称建筑。檐下是横梁，横梁上绘滴水、瓦当。下设椽头，椽头与檐板下绘三朵斗拱。（其中一组剥落）斗拱下设楹柱，斗拱间绘上下横梁拦板。陪衬两侧的卷云纹，恰如空中楼阁，仙人洞府，捧马侍从缓缓步出，神态严肃庄重，似在恭候墓主人出行。

（二）甬道

甬道的左右壁各为一组壁画。左壁为墓主人的二侍仆；右壁为墓主人的二侍卫，皆背壁面内相对而立。

左壁靠主室的内侧，绘男、女二仆人，男在外女在内，均偏向主室，凝视主人。女仆面现悲凄之容，愁眉不展，焦虑不安。身着淡黄色的过膝长袍，腰束墨绿色的宽带下垂。双手托毛巾擎于胸前，白色内衣。淡绿色的革靴。身高1.42米。

女仆外侧，为一契丹装束的男仆，两缕过耳鬓发，前额似刘海式发型，小胡须，身着墨绿色过膝长袍，轻拂地面。黄色的腰带。黑色革靴，领口呈圆形，双手擎银白色的唾盂。右手执盂颈，左手托盂底，表情庄重虔诚。身高1.50米

男女二仆人，面露凄容，慢抬腿，轻落步，小心翼翼，作缓缓向墓主人移动状。

相对右壁，绘二男性契丹装束的人。面偏向主室一侧。每人右臂曲折近90°，各擎一枝骨朵，依附于右肩；左手曲肘，指微弯曲按于胸前，虔恭至极，尽职尽责地给墓主人祈祷祝福。

二位男性仆人一式装束，梳髻发头式，两鬓长发垂于耳

前，作刘海式。八字小胡，颌髭须，身着墨绿色与膝平的短袍，圆领内穿白色衬衣。腰束黄色革带。靠近主室的侍卫配银白色的饰件，均穿黄色裤子，足蹬黑色革靴两足呈“八”字形，做稍息状。二人身高相近，均为1.50米，后者腮下有络腮短须。左右两壁的外侧，即左、右耳室的外侧，小龛的上部，各有一隻仙鹤，向内飞行在彩云间，喻意引渡墓主人成仙，以享仙境之乐。

墓甬道上部券顶，涂墨绿色，缀衬银白色的点点繁星，券顶的北侧，有银白色的北斗七星在闪闪发光，正是夜空晴朗，繁星满天。

左侧券顶的下方，有冉冉升起的赤黄色太阳。直径16厘米，内绘三足金乌，作鸡鸣状。可为金鸡报晓，天将大亮。

右侧券顶的下方，有直径14—16厘米的月亮，呈银白色，内绘参天桂树，树下玉兔伴嫦娥，充满了民间传说的神奇色彩。

日、月、星辰的天文图象，为考古发掘所罕见。它的发现为研究历史，古代天文、历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实物依据。证实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做出的卓绝贡献。

（三）墓门

墓门正面的上方，在券顶拱形门的左右上角。谓之门楣，呈分离的两个对称的三角形，内绘牡丹花卉，花蕊为赭红色，黑白相间，墨笔线条，圆润娴熟。拱形门有一半圆形的门额，上绘牡丹花卉，黑白色的勾叶，墨线轮廓，衬以艳丽的红花，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非常遗憾的是门额上的白灰，原附在门额上的门板上，因年久木板腐朽，白灰与木板脱离，在敲取封门砖时，随之脱落。后虽经捡拾脱片，也难以



甬道壁面

复原。

以上两处牡丹花卉有含苞待放的，有争芳斗艳的，红心衬以绿叶，红绿相间的牡丹花卉，色调和谐，绘枝高超，实为我中华民族之骄傲。

汉族以牡丹花卉为贵，而契丹族墓葬壁画的出土，说明契丹族与中原汉族文化交往频繁，习俗互为影响，契丹族古墓出土的牡丹花卉壁画，大约也是取其“吉祥富贵”之意。

（四）尸体与祭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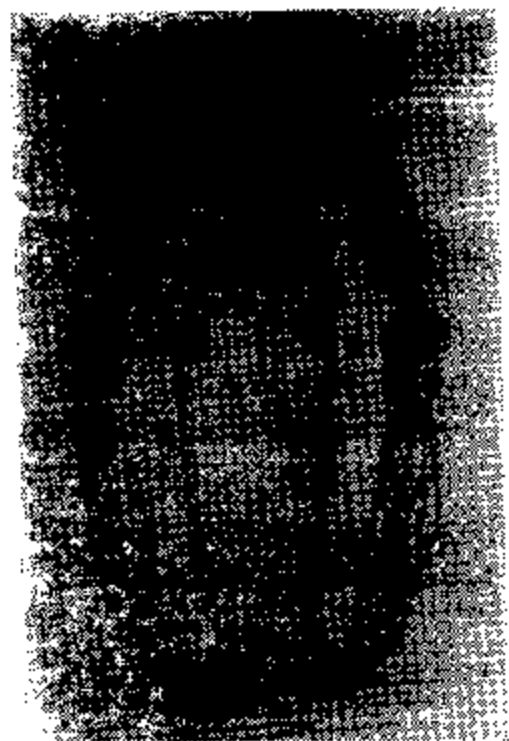
尸床和祭台是紧紧相连的一个整体。祭台在前，尸床在后，是墓的核心。整个墓的精萃。它面对墓门正面的高台是祭台，祭台正面与两侧及尸体两侧，均绘壁画。入主室墓的迎面祭台并列四个柿蒂形小龕，龕与龕之间用四叶花饰衔接，形成一个正体图案。小龕之上绘玉叶秋葵，边中填绘花纹，花涂赭石色，图案显得清晰幽雅。

尸床、祭台两翼，各有一个与祭台正面一模一样的柿蒂形小龕。大小与祭正面小龕相近，花式图案完全相同。

四、随葬品

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保存完好。出土的随葬品为近代辽代考古所罕见。出土的器物有：“故陈国公主墓志铭”、金器、银器、铜器、木器、陶瓷器、玻璃器、玉器、琥珀、玛瑙、水晶器、腰带、马具等。

（一）墓志 甬道的中部，置松软的绿沙石雕刻的墓志一合。呈方形，盃顶式志盖，边长89.5厘米，志厚12厘米，盃厚16厘米。盃顶阴篆刻八个大字故陈国公主墓志铭。四周刻十二朵卷云纹，每面各三朵，四角刻一朵牡丹花卉。四周的各个斜坡面上各刻三人，每人手执竹板，身穿肥



1、琥珀纓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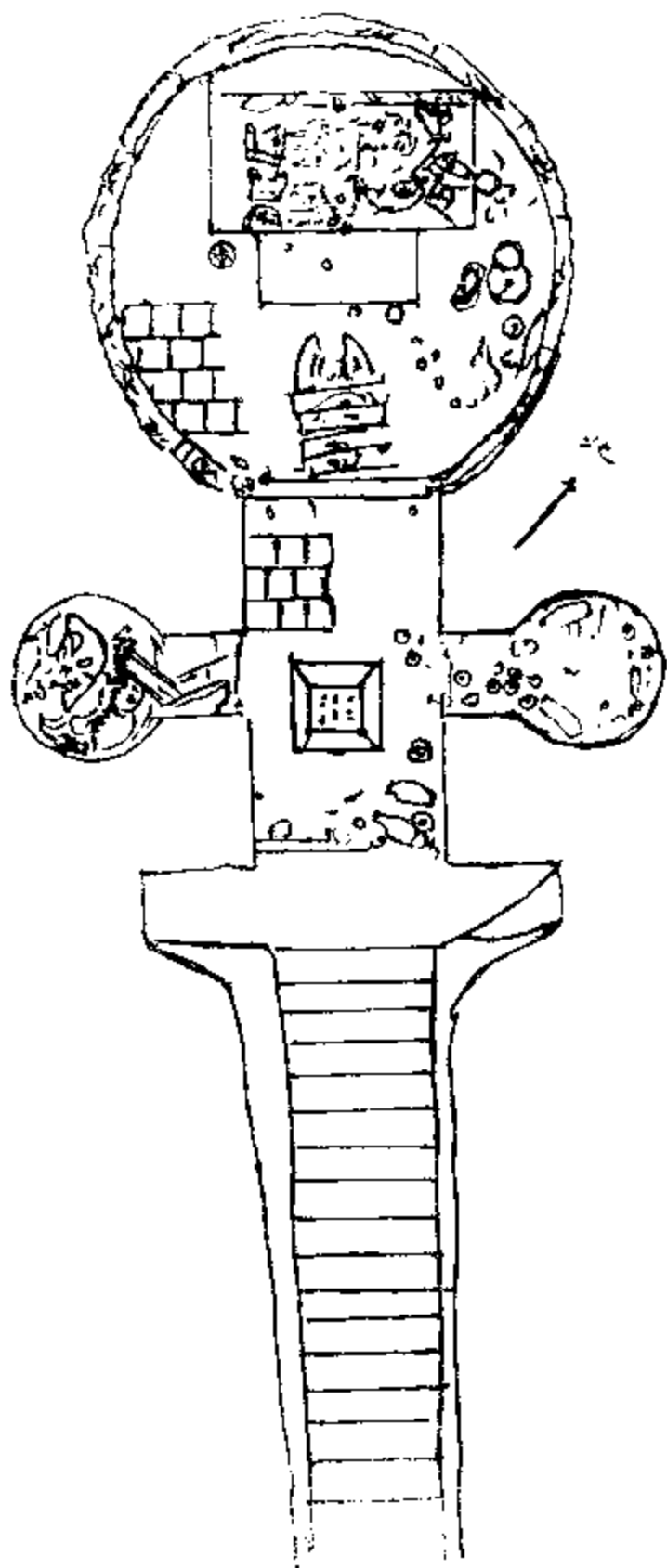


2、鑿花鑲金銀靴



3、鏤孔鑲金銀冠

1	2
	3



大的长袍，面稍侧外立其貌恭谨。十二个人的姿式、神态，穿着打扮形如一人。但细瞧冠顶各异，按顺时针方向分别镌刻“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属象。

墓志上，四周侧面镌刻缠枝纹，志铭四周刻几何纹，志铭阴刻楷书27行，计513个字，志文清晰，记载明确，年代确凿，现存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辽史》并无记载。从墓志铭得知：她原是景宗皇帝的孙女，圣宗皇帝的侄女，秦晋国王皇太

弟肖氏之女,吴国公主之妹,据《辽史》皇子表记载四帝景宗生四子,睿智皇后肖氏生三子,耶律隆绪为长子,后来为辽代的圣宗皇帝;耶律隆庆字燕隐小字普奴为次,八岁封恒王,统和十六年(公元998年)徙王梁国。开泰初年(公元1012年)更王晋国,进为秦晋国王,追封皇太弟,初兼侍中,统和中拜南京留守,开泰初加守太师,兼政事令拜大元帅,赐金券。年轻时战功显赫,统和十七年(999年)南征为先锋,至羸州遇宋将范庭召列阵以待,隆庆遣肖柳击败之,逃入空野,围而尽歼。统和十九年(公元1001年)。复败宋人于行唐。大概是父贵子荣的缘故吧。其女陈国公主虽于妙令十八岁夭折,却屡受皇恩。初授太平公主,再进封越国公主,为其高升鲁馆广启沁园,给公主提供优越的得天独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公主于病危期间,圣上亲临顾问,愈切抚怜。诏太医选灵方服良药而绝神效,则终天已诀。终年仅十八岁,圣上特遣使臣速营葬事,并至于追封之命——陈国公主。赙赠之仪并加于常典,皇恩浩荡可谓隆重矣。

陈国公主先人乃漆水人,漆水准确地址不详,从资料里未得查证。目前仍得不出结论。

从墓志得知:公主幼而聪明,有辩才,年轻温柔而又贤慧。玉德琢成,静含温润,兰仪秀出,动发英华,道出公主聪明娟秀,才貌双全,品德兼优的好人品。虽下嫁公相之门,不因贵出王宫却礼遵妇道,婚后夫妇琴瑟和谐和睦相处。

驸马肖绍矩《辽史》无传,从墓志明得知:曾任泰宁军节度使,捡校太师,捡校太师于《辽史》记载中均有传。但此位捡校太师无传,恐为故后追加封号。且驸马都尉肖绍矩先公主而逝,其寿终的日期,享年无记载,病故或战死均未

记载。深为遗憾。

陈国公主死于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三月七日，薨于行宫北之私第，当年闰四月五日迁神椁于灰山，启先太师之熒附焉。行宫《辽史》并无记载，更谈不上它的地理方位。查证《辽史》上京所辖州县并无泰宁军节度使的防地，因此，目前对行宫准确地址，暂不能做出定论

“陈国公主墓志铭”明确记载，迁神椁于灰山，启先太师之熒附焉，交待出公主与驸马为合葬墓，今号曰“庙山”辽代应称灰山。灰山名号的确定，当为研究辽代地理史料，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

附：

《故陈国公主墓志铭》

故陈国公主耶律氏墓志铭并序。

太中大夫守卫尉卿知枢密承旨事上柱国扶凤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马贻谋撰

公主耶律氏先漆水人也

景宗皇帝之孙秦晋国王皇太弟王妃肖氏之女吴国公主之妹木其姓氏之始曾高之裔乃六叶。

帝王之族矣国史备载此不复书公主幼而聪辩长乃柔闲玉德琢成静含温润兰仪秀出动发英华盖禀天钟

由姆训在室挺神仙之质作嫔归公相之门虽贵出王宫而礼遵妇道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驸马都尉肖绍矩即皇后之兄也自结丝罗之援克谐琴瑟之和任领外藩功资内助驸马先公主而逝今皇帝因思同气追怀手足之悲俯念诸孤特降丝纶之命自太平进封越国公主高开鲁馆；广启沁圆受慈爱以方深痛沉痾而是染圣上亲临顾问愈切抚怜诏太师选灵方服良药而绝神效无何身之存歿大限难移寿之长短冥数已定奄薨颜而早谢与薤露

以俱零以开泰七年戊午三月七日薨于行宫北之私第享年十八
终天已诀远日邇期速遣使臣以营葬事至于追封之命赙赠之命
并加于常典以当年润四月五日迁神榭于灰山启先太师之莹附
焉礼也噫月娥晦彩星鹜沉辉别风台而入夜台辞归戚里而归蒿
里贞魂常往休煎玉釜之香懿范永存须刊银钩之字卿遵睿旨斯
文谨为铭曰；

悠悠苍天，降寿不延
膏肓遭疾，药石难痊
眉凋翠柳，脸谢红莲
暮封马鬣，地下牛眠
悽悽草树，惨惨风烟
呜呼自古人虽皆有死
陈国公主大天年

（二）金 器

金面具二件，覆盖于死者面部。用薄金片制成。肖绍矩面部的一件脸型稍长，头部微突，鼻梁瘦长。双耳另制。用3银铆钉与面具连为一体。面具整体呈金黄色，瞳仁，双眉及上额处一窄长条为浅黄色，面具边缘一周有26个孔，用银丝与尸体头部的银丝网络连结。面具高21.7上额最宽处18.8厘米。

八曲花式金盒一件。扁平、八曲花瓣式，子母口，上部用金链连接下部有金链连接的插栓，闭合后可以固定。通体锤鍱花纹。一面为水波纹地上有对仙鹤；一面为水波纹地上有对鸳鸯；边缘一周为连珠纹。直径5.5，高1.5厘米。

镂雕金荷包1件。略呈椭圆形，用薄金片制成，边缘有十个小孔，其间以银丝缀合，上有金链以便配挂。通体镂雕缠枝草叶纹。长13.2宽7.4厘米。

簪花金针筒1件。长圆筒形，有盖及链。外壁篆刻缠枝草叶纹。长11.5，筒径1.1厘米。

双龙纹金镯2件。椭圆形，正面篆刻盘绕在一起的双龙，末编为两对龙头相对。长径7.3、宽径5.5厘米。

缠枝花纹金镯2件。椭圆形，镯体扁宽。正面篆刻缠枝花纹，末端为两兽头相对。长径7.7，短径6.4厘米，镯体最宽处1.6厘米。

金戒指17件。用薄金片制成，正面四瓣花形。长2、直径1.7厘米。

金球饰4件。用金丝组成的椭圆形球，中空。长径1.8，短径1.5厘米。

(三) 银器

鎏金银冠1件。用银丝连缀16片镂雕鎏金薄银片制成。前面2片，左右两侧各三组6片，后面2片银片边缘多呈云朵形，唯后面上片为山形。前而下片正中篆刻一道教人物像，并篆刻云朵，凤凰，前面上片篆刻双凤。两侧下部两组银片上亦篆刻凤凰。后面两片均刻双凤、云朵。冠前面缀21件镂雕凤凰，花卉纹饰的圆形鎏金银牌。一件宝珠形鎏金银牌饰和二件立雕鎏金银凤凰。口径18，高31.4厘米。

高翘鎏金银冠1件。用镂雕鎏金的薄银片制成。冠顶圆形，两旁各有一立翅。冠正面及立翅上均镂雕相对的凤凰，周围衬以云纹。口径19.5，高26，立翅高30厘米。清理时银冠旁边有一银质鎏金道教的造像。像下为双重镂空六瓣花叶形底座，像后背光，边缘有九朵卷云或似九枝灵芝。造像人物高髡长须，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捧物盘膝而坐。座底有二孔，与冠顶二孔相吻合，推测原应缀于冠顶。底座径7，背光高6.1，人物高4.4厘米。

金花银枕二件。枕面前低后高，枕背焊接一个半圆形银座，枕面篆刻双凤，火焰宝珠，云纹，鏤花处均鎏金。肖绍矩的一件长49，宽36.8，上高13，下高1厘米。另一件大小相近。

金花银靴2双。用薄银片制成。靴口椭圆形，靴筒上宽下窄，外测略呈扇形，靴头较尖，底细长微凹。靴筒篆刻四支凤凰，靴面篆刻两支凤凰，每支凤凰旁有四朵祥云，鏤花处均鎏金。两对靴的图案布置略有不同。肖绍矩的一双比陈国公主的一双略大。高34，底长32厘米。

金花银盒，1件。子母口，平顶，圈足外撇。盖上锤鏤蟠龙戏珠图案，盖外侧壁鏤凤凰牡丹纹饰，鏤花处均鎏金。口径25.4，底径21.8，通高21厘米。

金花银钵1件。直口微敛，弧腹平底。器内壁口沿下鏤两周连珠纹和一周波浪纹，底部鏤荷叶连花纹饰，鏤花处均鎏金。口径16.8，底径13.8，高8.1厘米。

银长盘一件。宽折沿，四角微弧，平底微凹，光素无纹。长33.6，宽13—14.4，高1厘米。

银唾盂1件，盘口，束颈，鼓腹、圆底，圈足。口径24.5，底径9.9，高16厘米。

银盏托3件。盏托口径8.4，盘径16，圈足径6.8，通高7.8厘米。

银壶1件。直口，折肩，鼓腹，肩部接椭圆形流，柄宽扁，盖上有宝球式纽，纽与柄间系银链。口径4.6，底径5.6，通高10.1厘米。

小银罐子2件。溜肩，鼓腹，平底。带盖，盖顶饰螺旋式纽。口径5.4，底径4.2，通高8.2厘米。

银粉盒3件。圆饼形，子母口出土时盒内残留白色粉末和黑褐色粉块。口径5，底径5.2，高2.5厘米。

银器盖2件。薄银片制成。盖顶有螺旋形纽。盖上有压柿纹。直径9.5、通高4.8厘米。

玉柄银刀子1件。刀身细长，刃部锋利，末端成锥形嵌入玉柄中，玉柄圆柱形，末端刻一“王”字，配有鍍金银鞘。刀连柄通长26.6，宽1.2，鞘长24.8厘米。

玉柄银锥1件。锥末端圆形中空，嵌入圆柱形玉柄中，配有鍍金银鞘。锥与柄通长17.5，鞘长14.8厘米。

鍍金银勺2件扁平椭圆形，柄细长弯曲，呈竹节状，末端錾刻成双鱼形，双鱼尾相对处有直径0.3厘米的圆孔。通高23厘米。银勺1件扁平椭圆形，柄细长而弯曲。末端呈鸭蹼形。长21.8厘米。

（四）铜器

鍍花铜盒1件。已残，敞口，平底。内壁口沿下錾刻一周几何形纹饰。口径54.4。底径31.2，高19.6厘米。

铜盒1件。八角形口沿、浅腹、平底。壁甚薄，无纹饰，底部有一铁钉疤痕。口径38.4、底径24、高8.4厘米。

鍍银铜镜1件。较厚重、宽平沿，半圆形纽。纽内穿一根直径0.38厘米的粗银丝，扭成长环形，以便悬挂。镜背光素。表面鍍银，光耀夺目，仍可照人，直径44厘米。

鍍金铜锁及鍍金铜钥匙二套。锁为长条形。长32.4厘米。钥匙长条形，中间稍宽，柄端圆形，有一直径0.3厘米的穿孔，钥匙头转折成齿钩。长20.1厘米。

（五）木器

木制鸡冠壶1件。与陶瓷鸡冠壶器形相近，故名。是用硬木挖削成两个半边，然后粘在一起。发现时仅存半边。上部有一孔，平底，外表经磨光、涂油，相当光洁，高29.2厘米。

木弓檠1件。用硬木挖削成两个半边，后面用3个半圆形银合页连接在一起，闭合时前面下端的半圆形银合页可用插销插入固定，上面亦有银质的小形固定装置。内部挖有沟槽以置弓，弓的放入或取出均须打开木弓檠。弓檠至今仍可启闭自如。外表经磨光，涂赭色并用墨线勾描云朵。长74.5、宽10—25厘米。

木俑2件。下半身已残，但上半身出土时颜色新鲜。戴幘头，用墨画眉眼及八字胡，身着右衽长袍。残长24厘米。

木围棋子80枚，有的已残。为中间厚边缘薄的小圆片。两面涂白、直径1.6，最厚处0.5厘米。

(六) 陶瓷器

彩绘陶盒1件，胎质较粗，白色，火候甚低，器壁厚重。直口、方唇、平底。口沿，内壁和底部均施白色釉。外壁不施釉，用墨线勾勒双重仰莲24瓣，填桔黄色。口径25.3，底径20.1，高10.8厘米。

茶绿釉牛腿瓶，3件。缸胎。小口，短颈，器身修长，平底。口径6.4，底径13.3，高54.8厘米。

绿釉长颈瓶1件。缸胎，深绿色釉。圆唇、口微撇，长颈、溜肩、鼓腹，平底微凹，颈、肩部饰两周凸旋纹。口径12.8、底径10.8、高54.4厘米。

绿釉盖罐1件。缸胎，深绿色釉。短颈、鼓腹、矮圈足。盖顶有纽。肩部饰两道凹旋纹。口径12.4底径10，通高23.2厘米。

花口青瓷碗5件。口沿较薄，外撇，弧腹，作十曲花瓣形，圈足。青釉呈绿色。口径19.2、底径6.4、高7厘米。

青瓷小碗3件。敞口、弧腹小圈足，外壁有六周细旋纹。青釉呈绿色。口径13.5、底径4、高4.5厘米。

花口双蝶纹青瓷盘3件。敞口、弧腹，作六曲花瓣形，圈足略外撇。盘内底部印双蝶图案。青釉呈暗绿色。口径16.4、底径10、高5.厘米。

花口菊纹青瓷盘1件。口微内收、弧腹，作六曲花瓣形，圈足略外撇。器内口沿下印卷云纹一周，盘底印三朵缠枝菊花，线条纤细流畅。青釉呈暗绿色。口径17底径10.7、高4.6厘米。

花口白瓷碗9件。胎白而细、敞口，深腹作十二曲花瓣形，圈足。口径14.8、底径9、高7.7厘米。

白瓷盒2件。胎白而细。扁圆形，上盖下盒，子母口。盖饰两道凹旋纹。盒弧腹，矮圈足。釉色白中泛青。口径12.6、底径7.2、通高9.3厘米。

莲纹白瓷盖罐1件，胎白而细。直口、鼓腹、矮圈足。肩部饰双重俯莲13瓣，腹部饰三重仰莲12瓣。圈足内刻一“官”字款。盖顶略凸，宝珠式纽饰双重花瓣。口径5.8、底径5.1。通高11.4厘米。

(七) 玻璃器

带把玻璃杯2件。1件已残。透明、深绿色，外表有风化层。口微敛器壁作圆筒状，肩部外鼓，腹部徒收，假圈足。在口与肩部连接扁圆形把手，把手上端有突起乳角便于把持，底外部有吹塑疤痕。口径8.4、底径5、高11.6厘米。

刻花玻璃瓶1件。已残。无色透明，表面有风化层。宽折沿、细长颈、折肩、桶形腹、平底。颈、腹部磨刻几何形花纹。底部有吹塑疤痕。口径6、底径8.、高17厘米。

乳钉玻璃盘1件。无色透明、表面有风化层。敞口、弧腹、腹壁饰一周28个乳钉，圈足。口径25.5、底径10、高6.8厘米。

(八) 玉、琥珀、玛瑙、水晶器

工具器玉佩1组7件。均为白玉。上端为一透雕玉莲花，下用金链垂挂刀、锥、锉勺、剪等工具形玉饰件。饰件长5.8—8.2厘米。

动物形玉佩。1组6件，均为白玉。上端为一花边方形玉雕。下用金链垂挂蛇、猴、蝎、蛙、蜥蜴等动物玉饰件。方形玉雕正面花边内雕一圆形，其中以极细的线条刻划十二生肖。方形玉雕边长5厘米，动物饰件长2.5—5.4厘米，金链长2.5—1厘米。

龙、凤、鱼形玉佩，1组6件。均为白玉。上端为一透雕长方形玉饰，用金链缀透雕双龙、双凤、双鱼、飞鱼、鱼形玉饰件。长方形玉饰长6.5、宽4.1厘米，其它饰件长4.9—7.5厘米，全链长3.5厘米。

双鱼玉佩，2组4件。均为白玉立雕。一组鱼身弯曲，另一组鱼身扁平。鱼嘴上穿孔内系金链玉雕长6—6.4厘米，金链长3.5—4厘米。

鸳鸯玉佩2件。白玉立雕。两支鸳鸯交颈而卧，长6.5厘米。

凤字形玉砚2件。青白色软玉。平面呈“凤”字形，墨池为斜面，前部有两矮足。一件长12、宽7.1、厚2.6足高0.8厘米；另一件长8.5、宽5.2、厚1.9、足高1.1厘米。

玉水盂1件。青白色软玉。椭圆形口，作四出花瓣形，弧腹、平底。高2.3厘米。

琥珀珍珠耳坠2件。各用4个琥珀雕刻的鱼龙形舟和6颗大珍珠、11颗小珍珠以金链连缀而成。鱼龙形舟上雕刻出两个摇橹者和船舱。鱼龙形舟长3.2—1.7厘米，珍珠直径大的0.8、小的0.3厘米。

琥珀双鱼形盒1件。用琥珀雕刻成两条并联的鱼形，中间挖空、互助扣合。鱼嘴部系金链、鱼形盒扣合后，可用活动插销固定。长7.8厘米。

琥珀鸳鸯2件。其中一件碎裂。现仅一件为琥珀立雕。鸳鸯颈弯曲向下，头贴于左翼。背上挖空，附一荷叶形金盖。用金链拴于颈上，长5.7厘米。

琥珀小瓶1件。扁平椭圆形，圆底，附荷叶形小盖。肩部有相对小孔。通高6.2、宽4、7厘米。

玛瑙碗1件。红色、半透明、有光泽。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口径7.4、底径4.4、高3.6厘米。

玛瑙盅2件。白色。敞口，圆唇，直腹，圈足。口径4.3，底径2.3、高2.9厘米。

水晶杯一件。无色透明，椭圆形口作四出花瓣形。弧腹，圈足。腹外壁刻卷云纹。口径5.3、高2.3厘米。

提链水晶杯3件。无色透明。圈唇、筒形腹，平底。口沿下有两个对称小孔，系金链，配有鍍金银盖。口径2.8、底径1.8、通高3.5厘米。

水晶串珠152枚。形状不规正。大小不一。一般长1.2厘米。

（九）腰带

玉挎银带1条。用薄银片代替革鞣。带上缀方形白玉带挎14件，桃形有孔白玉挎1件，圭形白玉铈尾1件，长方形金带扣1件。带挎和铈尾匀无纹饰，用银钉铆合在带上。带长163.7、宽1.4厘米。同样一条长28.2、宽4厘米的短银带，一端有金带扣，16个扣眼，应是与前者配合使用的。

金挎银带一条。以薄银片代替革鞣，带上缀方形金带挎14件，桃形有孔金铈5件，圭形金铈尾1件，长方形金带扣

1件，金带跨1件。方形金带跨正面饰兽面纹，桃形有孔金跨上饰云纹，金带扣饰花卉图案，均用银钉铆合在带上。方形带跨的下部有长方形“古眼”，其下悬垂用银片代替革鞅的小带11条。7条小带上各有2件长方形金跨和圭形金铉尾；2件小带上各有2件长方形金跨，并佩挂一件略呈方形，正面刻双凤，祥云的金花银囊；还有两条小带上各有三件长方形金跨。带下端各悬1件饰有兽面纹的倒置葫芦形金饰件。带长156、宽3厘米。

铜跨银称带1条。用银片代替革鞅。带上缀圆形银带跨3件，桃形有孔铜带跨3件圭形银铉尾1件，椭圆形银带扣1件，铜带箍1件。圆形银带跨下部有长方形“古眼”，内穿银片制成的小带3条，小带形制各不相同，有两条小带下端横挂长条形饰件。带长137.5、宽3.9厘米。

玉跨丝带一条。带已朽，仅存白玉，跨及一些铜附件。有方形玉带跨11件，大小不一的桃形玉带跨18件，圭形玉铉尾1件，圭形玉饰8件。还有镶玉鍍金铜带扣1件、鍍金铜带跨10件，鍍金小铜扣4件，鍍金葫芦形铜带饰2件，9件方形玉跨下部有方形“古眼”。玉带饰上均附有银铆钉

金跨丝带1条。带已朽。仅有8件金跨。跨为圭形，四边折缘，背面有5件铆钉。正面镶一条蟠龙四周附以山水、云纹。长11.8、宽607厘米

(9) 马具

西耳室内置两套马具。其中一套较完好。其辔、鞅、鞍、鞮等都用银片制成，并使长条银片连接在一起，铁镫也曾镀银。在鞍上鍍对称的龙凤，鍍花图案处均鍍金。辔、鞅、鞮上钉缀立雕的白玉动物形饰件若干。鞮面上彩绘灵禽神兽和云纹。马具的大小形制相近。鞮为桃形。每侧长64、

宽59厘米，这种银马具专为随葬制作的冥器。

此外，死者身上附上百件琥珀珠，不再一一介绍。

结 束 语

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肖绍矩合葬墓的简介，仅根据个人发掘记录编写而成。文中提到的墓的形制与结构，壁画、随葬品，只是按照墓与出土的实际状况，简单地予以叙述，仅供爱好者一阅，以便初步做个了解。

墓中出土的器物不下千余件。这里仅是重点向大家介绍几样。但这些都未经专家鉴定，如有出入均以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的发掘报告为准，特敬告读者。

附：新华社电讯稿（人民日报1987年9月28日一版）

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有了珍贵实物

内蒙古出土一批罕见文物

距今九百多年的银丝网衣在国内首次发现

据新华社通辽9月27日电（记者马义、卜捷）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发现辽代契丹别具异彩可与汉代金缕玉衣相媲美的银丝网衣等一批珍贵文物，一些考古专家惊喜地说：这是我国考古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发现，它对重新评价我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在缔造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历史贡献，及深入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举世罕见的银丝网衣等珍贵文物是在距今900多年、保存完好的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中出土的。这种银丝网衣在国内还首次发现，它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相比更具特色和魅力。

1986年7月，当考古工作者进入墓室以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双双躺在尸床上的公主和驸马，但见他们从头到脚被金银、珍珠、玛瑙包裹着，全身珠光宝气。最引人注目的是穿戴在全身的银丝网衣。公主和驸马头戴鎏金银冠，着仿人面形金质面罩，足登鎏金刻花银靴。公主的鎏金银冠镂满缠枝花纹和变形凤纹，两个冠翅高耸，有契丹特色。驸马的鎏金银冠更特异，令人叹为观止。公主的两只耳坠堪称一绝，它们分别由四只琥珀鱼形舟与珍珠联缀而成。更令人惊奇的是公主和驸马手上戴的银丝网络分指手套竟与现代妇女戴的网状手套相似。公主的十个手指上都戴有金戒指。

这座古墓由砖砌的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左右耳室和主室组成，全长14米多。墓主室结构呈圆形，它的穹窿顶酷似现在的蒙古包，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风格。壁画上的人物形态和服式、发式也具有契丹民族特色。墓甬道顶部绘有黑色天文图象，除银白色的星斗外，还绘有民族民间传说的金乌玉兔，从中可看出契丹族和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甬道中出土墓志一盒。据此表明，这座古墓是辽圣宗时代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的合葬墓。陈国公主于公元1018年3月7日病死，年仅18岁。驸马萧绍矩为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驸马都尉，先公主而亡，死期和年龄不详。



历史上的鄂尔土板

梁风云

鄂尔土板（也叫板街），蒙语之意是有山丁子树的村庄，因其周围山上长满山丁子树而得名。它位于内蒙古奈曼旗的南部，现青龙山镇古庙子村。鄂尔土板在历史上不仅是库伦、奈曼等地通往朝阳、承德的交通要道，也是库伦、奈曼、阜新等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对鄂尔土板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承德府志》上。《承德府志》谈及朝阳县时有这样的记载：“乾隆三十九年，设三座塔捕盗把总一员；鄂尔土板外委把总一员，并隶督标管辖。专听热河道府等差遣侦捕。”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朝阳县三座塔厅又在鄂尔土板设立了巡检兼典史署。署内设巡检官一员，正九品级，年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皂隶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遇闰月每名加五钱）；门子、马伕各一名，弓兵十六名，铺司十二名，每名工食银六两（闰月加五钱）。鄂尔土板第一任巡检于世宁，巡检署由他经手建成；第二任巡检江万锦，江苏宜兴县人，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任。以后各任是：程长荣，河南永宁县人，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任；周光岳，江苏宝山县人，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任；萧宏忠，江西安山人，嘉庆四年（公元一七八八年）任；温维祺，山西太谷县人，嘉庆十一年（公元一八〇一年）任；张从龙，江苏吴县人，嘉庆十五年（公元一八一〇年）任；史洛书，河

南洛阳县人，嘉庆二十年（公元一八一五年）任；吕椿，浙江山阴县人，嘉庆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二〇年）任；张学澂，江苏江都县人，道光五年（公元一八二〇年）任；黄道心，湖南咸宁县人，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任；还有王缙、秦炳曜等。

鄂尔土板巡检署基址于鄂尔土板街北，南北长二十丈，东西宽十三丈。建署后巡检王缙修过一次。光绪元年，秦炳曜巡检重修时又扩建了巡检署，增建大堂三楹，花厅三楹，还有土地祠、马神祠等。巡检署的主要事务是调节处理附近地区的各种民事案件，收缴各种官税，有时也帮助旗王府催地租，还负有防匪防盗的任务。

嘉庆年间，在大清朝廷“兴教建庙”风气的影响下，地方官吏与鄂尔土板巡检不顾蒙汉人民的死活，利用行政手段募集巨额资金，修建了工程庞大的庆安寺，当地人称老爷庙。庙址在板街东，占地面积四亩左右，是附近地区最大的汉庙。庙中正殿是老爷殿，殿内有关公、财神、药王的贴金坐像。老爷殿东侧是龙王殿、娘娘殿。龙王殿内有龙王、牛王、马王的泥塑坐像。娘娘殿内有三肖娘娘、眼光娘娘、耳光娘娘的鎏金坐像。老爷殿西侧是文昌殿、鲁班殿，文昌殿内有文昌、岳飞、包公的泥塑坐像。鲁班殿内有鲁班像。除老爷殿内有四个泥塑站像外，其它每个殿内都有六个泥塑站像。所有殿堂都是雕梁画栋，彩绘满墙，古色古香，清新幽雅。正殿的前面还有碑楼，马殿，钟楼、鼓楼。其建筑规模及其精湛的艺术，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老爷庙建成后，尽管和尚不多，却很有生气。每逢庙会更是人声鼎沸，青烟缭绕。按习俗每年二月十九是财神会，四月二十八是药王会，五月十三是老爷会，六月初六是虫王

会，六月十三龙王会。其中药王庙会是规模最大的香火庙会。每逢四月二十八，鄂尔土板街及其附近的群众、官吏、地主和商人们都来到庙上，降香还愿，求佛赐福，并组织各种活动。同时也做些比较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买卖，庙里的和尚身披袈裟，手持升斗，帮助量米量面，从中收些布施钱。

光绪年间，鄂尔土板的商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街内出现了买卖家、当铺等。老爷庙中为了增加经济来源，老当家的广村与其徒弟本慧在庙内办起了赁息铺，租借成套餐俱，结婚用的禧裤、禧衣等。并无偿的为百姓传书送信。广村去世后，本慧的徒弟本真掌管庙中诸事。民国时期，本真又在庙中厢房办起了学堂，请来先生，收徒授课。

老爷庙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庙地收入，敛寿粮和庙会的宗教活动收入等。据说和尚本真上庙时，还带了不少马匹和财物，献给庙里，做为庙产。

我们翻开大清帝国地图，从中可以看到，在鄂尔土板的地域上以显著笔墨注上了“阜新”二字，这就是历史上阜新县署所在地。取“物阜民丰，焕然一新”之意的阜新这个名字，就从这里开始使用了。

光绪二十九年冬（公元一九〇三年）朝阳府为管理北部汉民，决定设阜新县于鄂尔土板，县衙署设在原巡检署里，巡检署与县衙合并，知县兼管司法。从此，库伦旗、喀尔喀旗、土默特左旗和奈曼旗等地的汉族居民一律由县衙管理。各旗王爷之间发生矛盾时也由县衙予以调节，阜新县成为朝阳府管理北部蒙汉地区的重要行政机构。阜新县的首任知县名叫王维墉，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冬任。以后历任知县分别是：郑焯，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五月任；甯人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冬任；王翰

卿，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冬任；姚致远，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九月任；沈大燮，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秋任；还有畅瞎子（绰号），刘西福、杨钱搭子（绰号），郑青天等。光绪三十四年，朝阳府在库伦设立绥东县管理库伦、奈曼二旗的事务后，阜新县因设置过于偏北，于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八月移址于水泉，即现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所在地。

阜新县设置于鄂尔土板期间，是这里商业发展最兴盛的时期。东西一华里半长的街面上挤满了买卖家、当铺房和各种手工作坊。最热闹的南大门，集聚着大量的买卖家和大车店，还有一处私塾，设师授徒。当时较大的商号有福兴和、德发河、益尚兴、福德店等三十余家。其中福兴和是当时板街最大的商号，老板王三老虎是下洼人，与方圆几百里的商贩、地主都有交往，资金也比较雄厚，不仅开当铺、商店，还开着两个烧锅。据说开一个烧锅最少也得用七八十名劳力，二千多石粮食，可以想象这个买卖家的规模了。德发河、益尚兴也是大买卖家，经营花旗布、大布、酱油、醋、盐、皮毛制革等日用商品和农用商品。比较出名的还有天德店、德兴泰、天德昌、三和馆饭馆、候豆腐房、王铎子炉、瓷器铺、木匠铺等。街面上的房子大多是前突两檩的建筑，因此看上去十分整齐。小商贩们则在大买卖家的屋檐下叫买叫卖。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阜新县的设立，使鄂尔土板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但也给鄂尔土板和全县各族人民带来了重重灾难。当时，虽然清政府明令规定，蒙汉分治，县理汉事，旗管蒙务，但实际并不如此，常常是旗扎萨克保息股催地租头脚出门，随后就有县衙门的保甲跟进来要地饷。在这种双重压迫下，贫苦农民

逐渐破产，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大买卖家和少数官吏、地主手里。普通百姓只能利用房前一、二亩小园，种点大烟或给人榜青扛活来维持生活。

阜新县设在此地后，社会治安也未见好转。县衙兵丁只会敲诈民财，吃喝嫖赌，根本不去维护社会治安。人称杨瞎子的畅老爷任知县时，有一个比较大的胡子队强占了鄂尔土板，胡子队里有一个叫温宝璋的人，人称“瘟皇上”，看中了知县的小姐。畅老爷无法逃身，只好将女儿嫁给了他。三日后，温宝璋上街时被仇人杀死，畅老爷无奈只好逃回康平老家。平民百姓家就更是苦不堪言了，若遇上砸明火的，只有家破人亡。兵灾匪患扰得人民日夜不得安宁，群众形容当时的状况是：“听不到狗叫算安宁，闻不到枪声是太平”。

阜新县移址水泉后，鄂尔土板归绥东县管理，一部分买卖家也移到水泉。但板街内仍有二十多处商号，人口千余人。接福兴昌后兴起的保和永烧锅成了板街最大的商号。县里在街上设立了增税局，管理本地的商业。热河都统汤玉麟先后派大营、二连、十二连等部队在街内驻扎，维护本地的社会治安。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绥东县设汉一区于板街，区办公地点就在原县衙署。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绥东县从库伦迁往八仙筒，县公署又在板街设立了警察署，管理本地区的一些事务。当时又有部分商户移于八仙筒，板街剩了十来家商号，全街二百五十八户，八百九十七口人。康德元年（公元一九三四年）九月，县公署又设立屠宰场于此，板街仍是绥东县内比较大的集市。

原来鄂尔土板街很大，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后因战乱不断发生，大门常常遭到破坏，重修一次，大门回缩

一次，最后缩到东西街长一华里半，南北街长半华里。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秋，朝阳等地的金丹教民起事，十一月金丹教民的一个首领王凤得率领几百人的队伍盘踞在鄂尔土板街，被“奉军”尤得胜、张兆熊所率部队包围，经过激烈的拚杀后，金丹教民阵亡二百多名，余部多被烧死在板街。此次战斗平息后，北大门就堵死了。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侵略魔爪直接伸到了东北各地，同年阴历九月份，动用两架飞机对驻扎在鄂尔土板的热河部队十二连进行轰炸。当时，王连长命令士兵把马牵到屋里，日军只是炸了拴马桩，军队并没有损失。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再次对鄂尔土板街进行轰炸，在警察署和驻军的方向投了两枚炸弹，炸毁民房两处，炸死了王乃更和其侄子二人。这时，板街的买卖家因战乱而无法开张，多数都移居他乡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日军九辆汽车，一个洋马队计八十余人，从赐福图方向来到鄂尔土板，人马安置在老爷庙内。侵略者到处追捕百姓，砸门掠夺，见人就杀，找不到人就点火烧房子，昔日繁华的鄂尔土板街一日之间化为灰烬。这次日本人杀害了赵海龙、张喜、王麻子、王巖轴子等五人，打伤了和尚庆元、柳三等多人。板街内只剩下房家一处房子和马殿、东西廊房被烧掉的老爷庙。

一九三四年端午节，板街附近来了三个日本人窜入老百姓家，要吃要喝，抢劫财物，激起群众憎恨，人们操起棍棒赶打，追到板街的“益尚兴”商号里，爱国志士周荣久闻讯赶到，当即开枪打死一名日本人，活抓两名，拉到河南杖子村南山沟里处死。日军知道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于本年六月再一次轰炸鄂尔土板，街内剩下的一处房子也被炸毁

了。只剩下一座残缺不全的破庙。一九三六年九月，周荣九抗日失败，在乌鲁木齐头山遇难，日军割下他的人头，挂在庙外的树上，示众了七天。

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一度兴盛的鄂尔土板从此不复存在了。残破的老爷庙也在“文革”期间被毁。幸存下来的一对石狮子，现移置在青龙山镇政府的大门两旁，只有庙前的几棵老松树仍然长在那里。正如庙中遗诗所讲：

庆安古寺一古松，
冷冷清清几千冬，
可叹古松今还在，
不见当年栽树翁。

栽树翁虽然见不到了，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古庙子村，以崭新面容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奈曼东部部分地区

农垦的起源与发展

杨晓春

民国初期，奈曼旗波日和硕以东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小清河蜿蜒而过，叫来河横贯其中。这片水肥草美的广袤草原，隶属于奈曼王爷的领土。

对于这片蕴藏着丰富资源的膏腴之地，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垂涎已久，他们打着“开发”、“共荣”的旗号，公开推行经济渗透政策。一九一七年，日本大仓组同华人冯万良、李玉生相勾结，在通辽县城东门外设立了华兴公司，以种植粮食为业，公然掠夺我国农业资源。华兴公司除占据卓索图王爷若干荒地外，又在沈阳同奈曼王爷苏珠克图巴图尔达成协议，以二十二万元的典价，租押了上述荒地二百方（约合十万余亩）。并迁来大批朝鲜移民，由朝鲜人高总办、李总办和奈曼华人王子恒出面管理，利用当地丰富的水利资源，修渠打堰，种植水稻。华兴公司奈曼分公司将十万余亩土地中的可耕地按每二百号划分成块，共划出一百号地。分公司场部设在绥东县（今库伦镇）至开鲁县的电话通讯线东侧，二号地西南约三华里处。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公司还在波日和硕庙前修筑了拦河大坝。迫使叫来河改道向南，拐到腰营子村后才返回旧河道向东流去。

尽管华兴公司的朝鲜农民有娴熟的种稻技术，但由于他们一直处于奴仆地位，长期受到公司里日本管工的残酷欺凌与剥削，所以他们工作并不卖力，时常发生怠工现象。加之在土地开发修筑田间工程上的巨大耗资，三年过后一核算，公司不仅未赚钱，反而亏损了许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一九二〇年春，总公司又派斋藤、何端、武田、门司等六个日本人来亲自管理奈曼分公司的各业生产。为了保护这六个日本人的安全，公司又组建了以李明雅、张福祥为首的保镖队，欺压百姓，保护主子。

斋藤等六个日本人接管公司后，不仅加紧了对公司农工的欺压与剥削，而且也加速了对这一地区资源的掠夺。公司在继续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又购进了优良品种的羊、猪、牛、马，大规模地发展起畜牧生产。由于草场不足，畜牧业生产受到限制，公司又派蒙古人白子明出面，和奈曼王爷协商，又以十二万元的典价，把约六千余亩的浩尔沁宝冷甸子押给了华兴公司。然后由奈曼王爷派人把甸子上仅靠放牧为生的牧民全部赶到沙坨子里去了。公司西以绥（东县）开（鲁县）通讯线路为界，南到东胡四台，北到白土营子，东近东科中旗的石佛，方圆十几万亩土地和草牧场都不准当地人进入打柴、放牧，使这一带成了科尔沁草原上的外国租界地。

中国农村当时还处于黄牛木犁的时代，而公司则引进了当时较先进的农、牧业耕作技术和先进的农业机械。公司用拖拉机开垦了约二万余亩耕地，每年可打粮食二百余万斤。同时修筑了公路，用汽车运送各种物资。并在一号地修建了一座很大的青贮饲料库，专供冬季喂养牲畜。这些二十年代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加速了这一地区农垦事业的发展。

展。

华兴公司在这一带租赁土地开田种稻，严重地侵犯了当地农、牧民及中、小地主、牧主的切身利益。他们除经常采取对抵行动外，并不断向当时的各级民国政府反映。为此，奉天省政府曾派人调查此事，但奈曼王爷矢口否认卖地一事。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通辽县政府遵照奉天省长指令，对华兴公司采取驱逐行动。通辽县公署民国十二年968号训令指出：“华人冯万良、李玉生借外国人资力设立华兴公司，设坝截水，私侵国土，不惟妨害水利，并有辱国权。”遵照省长“在奉界内之该公司与农场人等不分中外一律驱逐出境”的指令，于八月三日在通辽城东站将该公司副经理李玉生查获。除将华兴公司人员即日驱逐外，并请陆军协助将所有在农场之作业者全部驱逐。以重省令，而保国权。

通辽县公署奉奉天省长指令，对设立在通辽县城东站的华兴总公司采取了断然措施，但对属于热河省管辖的绥东县境内的华兴分公司却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奈曼华兴分公司仍我行我素，继续发展。并一度出现较繁荣的景象。奈曼华兴分公司年产稻谷已达五十万斤左右。大量的粮食、肉类、皮张等农牧业产品都被源源不断地运走。随着这一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一些为公司生产服务和方便农工生活的商业、手工业及服务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在绥（东县）、开（鲁县）电话通讯线路西侧，出现了大车店、铁匠炉、百货店、杂货铺、肉铺等十几家店铺，还有茶馆、赌场和妓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北沦陷之后，在日本兵大举进犯之际，东北地区大批散兵游勇和土匪逃窜到通辽、开鲁、奈曼一带，与当地土匪纠集在一起打家劫舍，烧杀奸淫，肆意骚扰。社会治安混乱不堪。

为了防御匪患保护公司的安全，公司成立了保安队，配备了大小枪支七十多支。由李明雅担任队长。但不久，李明雅同白子明，王子恒之间因保安队员薪饷和个别保安队员携枪逃跑的问题发生了矛盾，李被公司撤职并赶出了华兴公司。李明雅一怒之下，对华兴公司采取了报复行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李明雅勾结“高山”、“君子人”、“石河”、“大林字”（均为匪号）等一千多人，对华兴公司发动武装进攻，并于十月三十日将公司占领。公司的日本人东逃被截回，后由大仓组派飞机接走，王子恒、白子明南逃，公司的财物除被胡匪抢走一部分外，其余全部被付之一炬。公司的场部、牛号、羊号、马号、粮仓、配种站及拖拉机、汽车等都烧得片瓦无存，化为灰烬。公司烧毁后，八百多朝鲜农工及家属也都陆续东迁。具有十五年历史的华兴分公司在烈火中销声匿迹了。

公司烧毁之后，土地被当地的地主占用了一部分，当地的农民也耕种了一些，但大片的土地还是任其荒芜了。

公司虽然被烧毁了，但日本人却始终未忘记这块被他们掠走大量资财的土地。一九三五年，日本大仓组又和前华兴公司华人经理王子恒相勾结，重返奈曼，公开建立了大仓农场，场部设在原公司的六号地段。并派门司、武田邦夫等日本人亲自管理农场事宜。农场大量招募当地和从关内逃荒来此的中国农民，改水田为旱田，将土地租给他们。农场规定：租种者与农场在庄稼成熟后六、四分成。这样，农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农民手中夺走百分之四十的粮食。农场招募的农工陆续定居在原华兴分公司的二号、三号、六号、七号地段上，以地号为村名，这就是现在奈曼旗治安镇的二号村、三号村、六号村、七号村。

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大仓农场经营了近十年，直到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后农场才告消亡。

一九四六年，奈曼王府又以此地原属王府所有为理由，向当地农民收取一九四五年地租一年。直到土地改革后，这片富饶的土地才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为了继续开发利用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使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于一九五二年在此成立了六号国营农场。现在，这一地区的耕地面积已发展到五万六千余亩，粮豆年产量已近两千万斤，成为奈曼的主要粮食产区之一。



八仙筒镇的商业史料

奈曼旗八仙筒镇的商业形成于民国前期，是现今全旗甚至全盟地区商业形成较早的城镇之一。

清朝初期，八仙筒地域是个水泡子，以后随着地壳变迁和河流改道等原因逐步演变成陆地，并随之有了人烟。

民国前期，小库伦（今库伦镇）某商号在八仙筒设立了第一家商铺“广生合”（该商号后来发展为八仙筒镇的最大商号），从而此地算是有了自身商业。民国十九年（1930年），绥东县公署由小库伦迁至八仙筒，为八仙筒镇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前景。

“九·一八”事变以后，该地很快形成了近二平方里的镇基，外地商号纷至沓来。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期间，该镇商号发展最多时达百余家（包括摊床），这些商号主要来自小库伦和下洼，日久自然形成地域性帮派，以十字南北街为界，街东为库伦帮，街西为下洼帮。

当时该镇的最大商号“广生合”，从业人员达三十名，东家是辽宁省义县人，姓苗，经理李秀荣，绰号李老秀。该商号主营杂货，其交易所得多用于购买牲畜，加上部分蒙古人直接用牲畜进行交易，故其资本主要体现在牲畜存栏数上。当时“广生合”牲畜存栏最多时达牛千头、马千匹、羊不计其数，还有少量骆驼。这些牲畜遍布当时的奈曼、库伦、宾图（即科左前旗）三旗四乡。每当年终结算时，三岁

牛、马就不上帐，可见该商号资本之巨。

日伪统治初期，日本人对东北的经济统治主要侧重于产业，“七、七”事变以后，统治范围扩大，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随着经济统治的深入，八仙筒的商号已多数倒闭，少数未倒闭者被组合到一块，勉强维持生计。

一九四六年冬至一九四七年春，八路军相继在八仙筒建立了公营的“仁义”商店和大北公司（其中“仁义”商店归辽吉一分区供给处领导，大北公司为辽吉二分区专员管理），以保障军需民用，稳定市场物价，回笼货币。一九四七年末，“仁义”商店与大北公司合并，归锦西省企业管理处领导，当时八仙筒的私商也开始经营起商店、摊床和小门市，从此，该镇的商业逐步开始复兴。

（郑记）



工程庙泡子

王文涛 嘎力僧扎木苏

距大沁他拉镇偏西北八华里，有一座长六公里、宽四公里的天然湖泊，这就是驰名遐迩的奈曼红尾鲤鱼产地——工程庙泡子。

据说，自建奈曼旗就有这个泡子，至少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早在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奈曼旗第十任郡王阿旺都瓦底扎布的陵墓就葬于此处，距今已有一百四十年了。光绪三年（公元1887年）四月，在这里建成了奈曼王爷的陵寝庙——孟根庙，该庙的法名叫功成寺，此后该泡子被称为功成庙泡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是什么时候，人们就习惯地写为工程庙泡子，此名无人矫正，也就一直延续到现在（这里的蒙古族群众都称其泡子为“塔日干淖尔”）。解放后，功成寺被毁，现已荡然无存。

昔日工程庙泡子的水源是孟克河，孟克河在造床前期，曾流经舍力虎甸子，形成舍力虎泡子，大雨之年，该泡子蓄水过多，在东北低洼沙丘处向北溢流决口，经过二等甸子，流入功成寺西边的天然洼地，遂形成了现在的工程庙泡子。后来，孟克河形成了河道，经敖汉旗的梧桐好来、长胜甸子进入奈曼，最后流进工程庙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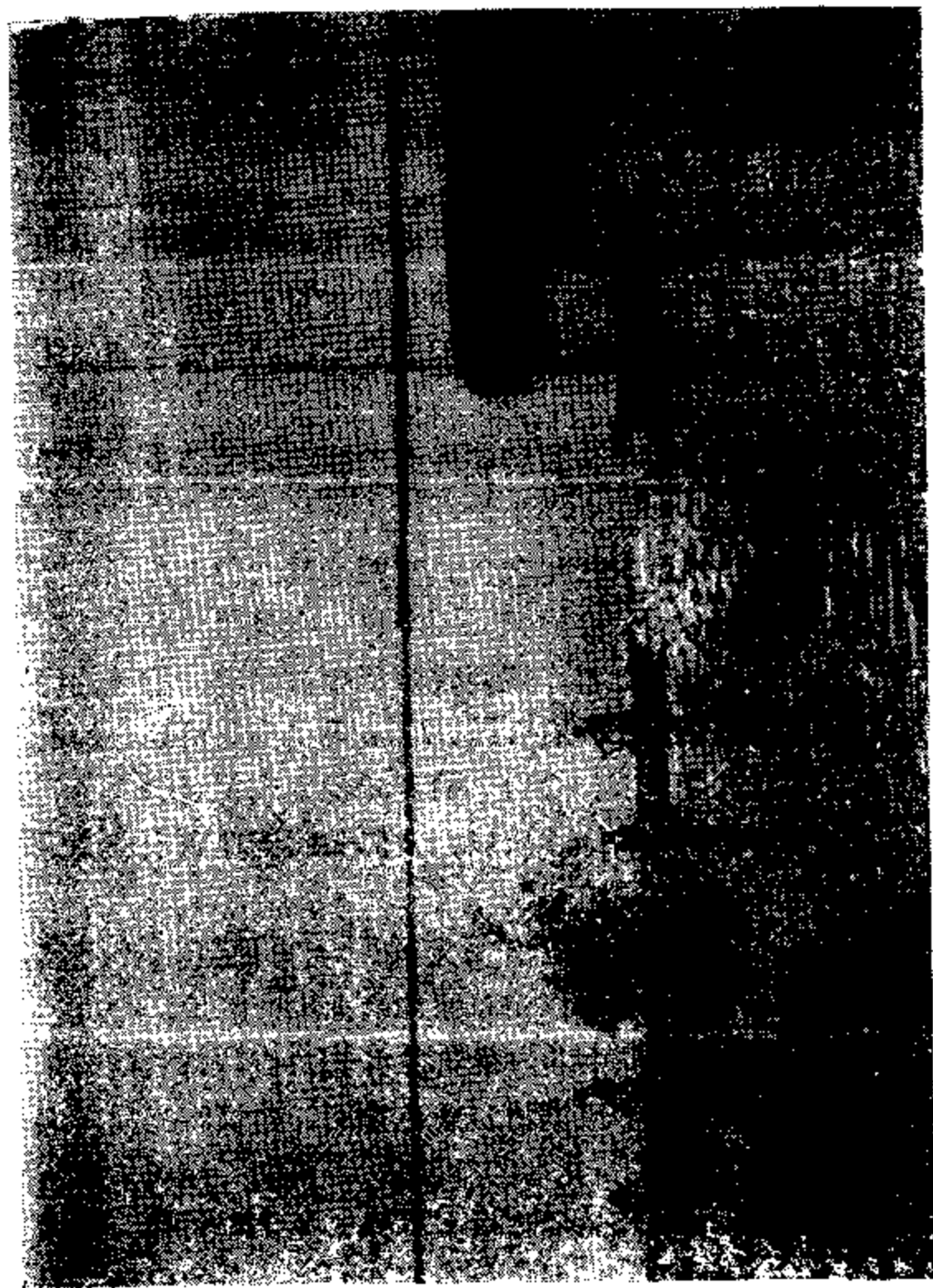
六十年以前，整个泡子是由四个小泡子组成：东南角的塔力干淖尔，东北角的太力虎淖尔，西北角的沙巴尔图淖尔，西南角的东哈日淖尔。其中塔日干淖尔为最大。这四个

泡子的中间有四个旱滩：阿个滩汤，毛顿汤，沙日沟汤，巴冷图汤。其中阿个滩汤为最大。旱滩上草木繁茂，各种鸟类栖息。湖的四周（北侧除外），全是树筒，湖西是窑筒（今长胜一带），湖东是皮匠筒（今雷达站一带），湖南是得力特筒。那时的林带象原始森林一样，茂密森森，遮天蔽日，牛群马群只要钻进林地就难以找见。所以，当时的大沁他拉的别名叫毛盾艾力（木头营子）。那时，湖的北侧是沙巴嘎梁，南侧是王爷储粮地赛沁梁，湖东有一渡口名叫乌力根敖老木。当时曾有人量过，湖东西长45华里，南北长15华里，东至现在的先锋乡，西至现在的长胜屯，要比现在的湖面大得多。

关于工程庙泡子，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传说其一是湖中间有三棵很大很大的叶茎皆黄的卷心金白菜，菜心的每片金叶里都卧着一尾金鱼，有两条最大的金鱼，围绕着金白菜不停地游动。金白菜光闪夺目，在风平浪静的晴空朗口，它的光亮可以把整个湖面映照得金波鳞鳞。这是因为金白菜的根须很长很长，有人说，它植根在深深的地心河的金泥里。每当盛夏季节，金白菜的菜叶就变成碧绿的颜色，这时，整个湖色也为碧绿，所以，人们又称工程庙泡子为绿色的小湖。

解放以后，国家重视渔业发展，大力加强渔业基本建设。工程庙泡子成了科尔沁草原的渔业生产基地。一九五九年，诗人李欣（即原中共内蒙党委书记、宣传部长胡昭衡同志）来此视察，见沙原湖泊，景色秀丽，建议将工程庙泡子改名“奈曼西湖”。一九七〇年以后，“西湖”渔场年捕鱼量高达四百吨之多。商品鱼除供本旗外，还供应哲盟、内蒙和首都北京。每年春节期间，从四面八方来购鱼的车辆络绎不

绝地开往西湖渔场。盛夏季节，各处游人也不断来这里游泳避暑。因此，人们称赞奈曼西湖既是富饶的“宝湖”，又是风光秀美的旅游胜地。（见下图）



叫 来 河

王 文 涛

叫来河从西地村入本旗境内，向东北流，经义隆永、太和、太山木头、章古台、桥河、白音他拉、衙门营子、八仙筒、好土、东明、得胜、治安、六号国营农场入开鲁县境，旗内长度为一百八十五点三公里，旗内流域面积为五千一百五十平方公里。

叫来河，明代称遥刺河，清代称那拉特河，是哲盟三大河流之一，属于西辽河的一大支流，它发源于昭乌达盟敖汉旗的金厂沟梁，上游较大支流有腾克力河，白塔子河和克力代河。小支流有少海河、岗岗河、高力板河，在下洼北部完全汇于叫来河中，河道自发源地起到科左中旗小王家窝堡汇入西辽河止，全长五百五十九公里，总流域面积为九千二百九十五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为一亿三千万立方米，多年平均输沙量为九百八十万吨，折合为七百五十三万立方米。年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七十六点六公斤。

叫来河在下洼以上二千零八十三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为主要产流区，是该河洪水和泥沙的来源，本旗境内面积虽大，但产流甚微，每当敖吉、克力代、豁牙子山、腾克力山等地降大雨或暴雨时，叫来河就必然发生洪水。

该河属于季节性河流，冬春水量不大，正常流量只在一至三秒立米之间，冬季枯水期最小流量到过零点一八秒立米。夏秋之交降雨量大，特别是七、八月间，容易发生较大

洪水。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汛期超过一千秒立米的洪峰就有十一个年份，其中，以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为最大，洪峰流量达四千一百七十秒立方米（下洼站），其次为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一日，最大洪峰为三千零九十秒立方米。

叫来河是多泥沙的河流，一九六二年的输沙总量达三千零八十万吨，是输沙量最高的年份，一九六五年的输沙总量为二千六百九十万吨，仅次于一九六二年。

由于该河泥沙大，每当发生大洪水时，往往导致河流改道，近百年来明显的改道有六次，因为发生洪水自然改道四次，由于治河措施人工改道两次。

关于叫来河的由来，说法不一，但有这样两种说法，却流传久远而又广泛。一说是，一百二十年前，奈曼旗第十二任郡王萨噶拉（外号“疯王”），经常狩猎，每当出猎无获，就要杀人，以充猎物。所以，每当疯王出猎，猎场周围的黎民百姓就向苍天祈祷，求上帝保佑。上帝可怜平民，硬是流下一条河，阻拦疯王残害百姓，因此，人们称此河为“叫来河”。还有一说是，郡王萨噶拉嫌自己管辖的境内无名山大川，欠缺风水，于是就命令百姓把下洼一带的大小支流连接起来，使之汇成一条大河，然后流入奈曼旗境内，因此当时称此河为“叫连河”。各种说法都无可靠的历史依据，所以都是传说而已。可现在人们又常常写作“教来河”，这大概是由于解放后人民多年治理它，改造它，变害河为利河而得此名。

解放前，叫来河洪水灾害连年不断，官方无人过问，受苦受难的是两岸的平民百姓。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叫来河的治理工作，三十多年来，国家投放巨额资金，全旗人民付出辛勤劳动，从第一阶段的修堤防水到第二阶段的

滯洪淤地，又延續到第三階段水土資源的充分利用，從而使叫來河得到徹底根治和充分利用，僅就修建嘎土好來滯洪區和道力歹攔河樞紐兩大工程的三十四年中，為國家和人民創造財富共達一億六千四百五十八萬元。昔日的害河變成今日造福於民的利河。我們完全可以相信，隨著四化大業的迅速發展，叫來河的水土資源將為奈曼人民創造出更加巨大的財富。



解放前奈曼旗教育概况

涂献廷 王化中 高福德

解放前，奈曼蒙汉文启蒙教育，都是从私塾开始。私塾形式有三种：一是家塾，富有之家聘请教师教自家子弟，也有的自家教师教自家子弟；二是当地有声望的人士出面承办学馆，称其谓学董，聘请教师执教，招收众人子弟读书，学生交纳束脩；三是塾师自设学馆，招众人子弟读书，学生付钱或粮谷。这几种办学形式统称为私塾。私塾又分蒙馆、经馆、混合馆三种：蒙馆是进行启蒙教育，学生入学先读三本小书，即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再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读庄农杂字、明贤集、千家诗、弟子规、女儿经、妇女家训等。本旗私塾多属于此类。经馆是高级的，学生读五经，即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开始讲做文章，准备应举考试。混合馆是从启蒙到高级。私塾的教学方法采取单人教授法，耳聆面授，“填鸭式”，读、认、写为重点。管理实行体罚。办学时间长短无定期规定，没有学制，教学进度因人制宜，同时发蒙或同读一本书，各有先后，而且无论年龄大小，能者居先。

为叙述方便起见，按历史时期分别概述如下：

（一）晚清和民国时期

蒙文私塾：

奈曼旗的蒙古族教育自晚清一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前，没有超出私塾的办学形式。原因是部落分散，居民居住不集

中,屯与屯相距较远 集中办学困难。更主要的贫苦牧民生活低下,不易办教育,只有王公贵族、富有之家以及有声望的人士,才能设家塾或承办私塾。

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图特那木吉(协理),在现西湖以东先锋附近办家塾,亲自教自家两个学生,学蒙文、满文和珠算。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图特那木吉的长子关根斯冷(扎兰)办私塾,亲自任教,学习蒙文和珠算。学生有月亮、舍布吉、好日老等九人。学生好日老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在舍金(现巴嘎波日合苏木)办私塾,教蒙译《三字经》、《明贤集》,实行早晚制,谁来教谁,断断续续,到一九四五年才完全停办,前后共教过三十余名学生。

一九一〇年,双合村(现先锋乡)席家设家塾,请人教自家子弟五台那木吉、席品三,还有其外戚家的两名学生。

一九一〇年,有喀喇沁旗人乌力吉白音,汉名辛化祥,人称他喀喇沁先生,在白音蒿(现黄花他拉苏木)程家承办的私塾任教,用蒙汉两种文字教学。该塾于一九一四年停办。一九一五年布合勿苏(现太山木头苏木)梁乌凌嘎(管旗章京)邀请辛化祥任家塾师,用蒙汉文教四书,坚持十年之久,一九二六年停办。一九二七年下宝贝河(现沙日浩来苏木)侯家邀请辛化祥任家塾师,一九二八年停办。一九二九年辛化祥又到布合勿苏梁家任家塾师一年。一九三二年双合村龚家邀请辛化祥任家塾师,用蒙汉文教四书,学生六七人,现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晓声阿同志,就是在此受到启蒙教育的。该塾一九三六年停办。辛老先生蒙汉文造诣很深,在奈曼从事教学二十五年之久,勤勤恳恳,治学严谨。

颇受人们的尊敬。尤其对蒙语文的学习和使用，作出了积极贡献。曾用蒙文翻译过《三国演义》、《论语》，可惜，因年久，现仅存蒙译《论语》一本。一九五四年病逝，终年85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西哈托好来（现固日班花苏木）德勃（梅林）主办私塾，请李德力加布任教，教蒙文，有学生八九人，办学十多年，至一九二三年停办。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少努达瓦，喇嘛出身，在巴嘎波日合达哈拉贵家，办早晚制私塾，教蒙译《三字经》、《明贤集》，有学生二、三人。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吐默特旗人拉喜旺都特兼通蒙汉文。经在大沁庙做工的同乡人陈士清推荐，在大沁庙办私塾，学生是大沁庙里的十几名小喇嘛，教蒙文三本小书《明贤集》，一年多停办。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拉喜旺都特在哈力德斯格（现太山木头苏木）办私塾，教蒙汉文三本小书、四书。蒙汉族学生来自附近各屯。一九三三年停办，先后有四、五十名学生在该塾就读过。一九三四年，哈斯宝（伪满奈曼旗长）邀请拉喜旺都特在业拉玛吐（现黄花他拉苏本）办私塾，教蒙汉文，学生二十多人，一年多停办。一九三五年拉喜旺都特在他能皋（现沙日浩来苏木）办私塾，教蒙文。该塾于一九三六年合并到沙日浩来学校，拉喜旺都特老先生也随之转成为正式教员，一直到伪满垮台。解放后老先生仍从事教学工作，一九五三年因年岁大退休，一九七一年病逝，终年八十六岁。老先生一生从事教学一丝不苟，深受家长和学生的爱戴尊敬。三十几年，为奈曼蒙文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上述私塾外，还有很多地方设有蒙文私塾。尽管这些私塾存在时间有长有短，基本上都是启蒙教育，但它对奈曼的蒙文教育的发展提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蒙文家塾、私塾教育的发展，为今天奈曼蒙文教育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汉文私塾：

汉文私塾教育是在土城子、义隆永一带最早出现的。

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秀才索溱在岗岗（现土城子乡）开设私塾馆，招众人子弟读书。这是本旗最早的一所汉文私塾。索溱之后其子索桂林，在土城子一带从事私塾教学多年，病故在教学岗位。索溱之孙索惠民，民国和伪满时期，一直在土城子一带从事私塾和学校的教学工作，培养出好多人才，深为人们所敬仰。索惠民之子索纪先伪满时期教学，解放后仍从事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索家四代人以教学工作为业，可谓教学世家，为土城子一带的早期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五家（现义隆永乡）王弼办家塾，请山东荣××教自家两名学生，一九〇六年停办。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秀才李梅，在五家开办私塾馆，学生二十多人，读三本小书，四书。二年后该塾迁至下洼街。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宋国珍在大营子（现义隆永乡），设私塾馆，学生数十人，坚持十多年。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大营子（现义隆永乡）李殿清主办私塾，请张遵任教，学生数十人。一九一四年，绥东县长王百川到地方视察，口令该塾转为私立小学。设初高两级，初级四年制，高级三年制。到一九一八年停办。该校是

国中国时期本旗最早的一所私立小学。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王弼在五家开设私塾，亲自任教，学生三十余人。该塾于一九三〇年改为私立小学，一九二六年停办。

据调查材料表明，民国建立以后，私塾遍布全旗各地，先后不下百所。这些私塾形式各异，存在时间长短不等，但它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普及众人读书识字，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一二年之后，办学形式开始出现由私人单一性办学，向社会性办学的方向转变。

学校教育：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建立了绥东县，辖库伦、奈曼两个旗，县址在库伦。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县公署设立劝学所，所长张谨，奈曼旗偏坡营子人。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撤劝学所，改立教育局，局长侯勋烈，系奈曼旗土城子人。由于县建制和旗建制并存，县教育局不管理两旗的蒙古族教育事宜。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绥东县长刘修建批准大营子（现义隆永乡）建立一所公立初级小学，学生几十人。接着在七家子（现土城子乡）建立一所公立初级小学，教师索惠民。一九二五年，在三岔沟（现土城子乡）建立一所公立初级小学，教师赵洪奎。

一九二九年绥东县教育局统计：全县有公立高级小学一所；女子初级小学一所；男子初级小学四所。这六所学校有三所在奈曼境内，即上述大营子第三初级小学、七家子第四初级小学、三岔沟第五初级小学。

一九三〇年三月，绥东县公署迁至奈曼旗八仙筒，教育局局长张铨，奈曼旗偏坡营子人。当年在八仙筒建立初高级小

学一所，初级四年制，学生百余人；高级三年制，学生十五、六人。校址在现八仙筒中学东北处，教师六、七人，校长隋方。开设国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经学等科。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在全旗各地相继建立一些公立小学（实际是由私塾转为公立）。据绥东县教育局统计资料载，“九·一八”事变前，全旗有公立初高级小学一所；初级小学十六所。高级学生五十四人，初级学生五百二十一人。学校分布如下表。

顺 序	校 址	学生数	校长或教师
初高级小学	八仙筒（现八仙筒镇）	150 余人	隋 方
第二初级小学	阿尔土板（现青龙山镇）	24	厉九卿
第三初级小学	车圈子（现义隆永乡）	20	丛丕芳
第四初级小学	岗岗（现土城子乡）	36	索惠民
第五初级小学	三岔沟（现土城子乡）	19	郑学增
第六初级小学	土城子（现土城子乡）	13	徐 芳
第七初级小学	七家子（现土城子乡）	××	马凤祥
第八初级小学	库力吐（现土城子乡）	18	韩世英
第九初级小学	哈力沙巴（现先锋乡）	32	孙兴仁
第十初级小学	道力毛都（现白音他拉苏木）	××	×××
第十一初级小学	嘎什土（现昂乃乡）	24	张 琦
第十二初级小学	浩沁苏木（现东明镇）	23	李 范

顺 序	校 址	学 生 数	校 长 或 教 师
第十三初级小学	南梁（现义隆永乡）	28	丁汉卿
第十四初级小学	四林筒（现衙门营子苏木）	21	李凤鸣
第十五初级小学	大营子（现义隆永乡）	××	×××
第十六初级小学	清水塘（现南湾子乡）	××	杨国春
第十七初级小学	八户（现南湾子乡）	××	王守成

绥东县设立教育局之后，即对汉文私塾着手进行整顿。经县公署认可的私塾，便可转为私立小学。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绥东县教育局委派视学员王万令到地方调查整顿私塾。塾师教授认真的私塾，准予改为私立小学；塾师教授不认真，句读不分，误人子弟者，立令解散，并令散塾学生家长，将学生送入就近公私立小学肄业。查竣后，全县有二十二所私塾改为私立小学，报县公署在案。一九二七年，绥东县教育局遵照热 河省教育厅第二十四号训令“飭将私塾切实调查积极整顿”的指示，对全县私立小学和私塾又进行一次调查整顿。教育局在向省厅呈送调查私塾办理情形报告中提到，“查去年批准的二十二所私塾改为私立小学，今存二十处，学生三百四十五人，教师二十人。私立小学教授新课程，设国文、修身、珠算、论语、习字、还有的开笔算、音乐课。”据资料记载，当局是积极提倡兴学校，废私塾的。不过，私塾数量还是不断强加的（附私立小学一览表）。

从上述发展情况可以看出，清末时期全旗蒙汉文教育，

处于启蒙阶段；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1933年），迈向发展阶段，公私立学校逐渐增多，私塾教育日益扩展，读书识字的人多了，但是由于交通闭塞，农牧业生产低下，加之统治者横征暴敛，蒙汉劳动人民子女，还是得不到读书深造机会的。因此，旧中国时期，全旗蒙汉族青少年念大学的极少；念中学的也屈指可数，并且都是经济上富有人家的子弟。据我们初步调查了解：民国时期有大学生八人。中学生也不超过二十人。（此数字仅是了解到的，遗漏难免。）大学生有：

卜和克什克，蒙族，汉名梁玉岚，原籍本旗太山木头苏木。在本旗大营子私立小学毕业后，考入朝阳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私立俄文大学法专系，后转入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俄文系。毕业后曾在北平蒙藏专门学校任蒙文教师。伪满时期任兴安西省文教科科长，创办了开鲁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蒙文）并兼任第一任校长，还创办了开鲁蒙文学会。以后又任兴安总省实业厅长。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开鲁。

卜和温都苏，蒙族，汉名梁玉岗，原籍本旗太山木头苏木。在北平国立医科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得精神病，已故。

恩根包老，蒙族，汉名包庆章，原籍本旗太山木头苏木。在北平宏达学院语文系毕业，已故。

吉莫，蒙族，汉名陈树棠，原籍新镇乡大歹村，在北平蒙藏专门学校毕业，已故。

王家驥，汉族，原籍义隆永乡五家村。在北平私立民国大学经济系毕业。伪满时期在库伦旗养正学校、库伦皂户沁国民优级学校任教，现年八十六岁。

李洪瑞，汉族，原籍本旗义隆永乡大背子村。在北平平

民大学读书，未毕业，已故。

张明，汉族，原籍本旗太和乡偏坡营子村。天津北洋大学未毕业，已故。

巴士吉拉根，蒙族，汉名陈×，原籍新镇乡大歹村。北京某大学未毕业，已故。

附：一九二七年私立小学一览表（见下页）

区别	校 别	教员姓名	年 岁	履 历	学 生 数	校 址
第一区	第一私立小学	赵凌云	40	充改良塾师十五年	17	任家湾子（现南湾子乡）
第二区	第二私立小学	刘鼎三	38	师范专科充塾师十年	20	赵家窝铺（现沙口浩来苏木巴哈教）
第三区	第三私立小学	荣世平	43	简易师范毕业充塾师十年	15	大沁他拉
第四区	第四私立小学	王永禄	31	朝阳中学肄业充塾师四年	22	哈沙卜（现先锋乡）
第四区	第五私立小学	陈子厚	50	充塾师二十年	10	哈沙卜
第四区	第六私立小学	桑景春	32	充塾师四年	31	勿根包冷
第四区	第七私立小学	甄善科	42	充塾师十六年	20	应家店（现桥河丰收村）
第四区	第八私立小学	高德禄	39	充塾师十九年	18	哈付营子
第四区	第九私立小学	王文隆	29	充塾师七年	15	套不格（现章古台苏木）

区别	校 别	教员姓名	年 岁	服 历	学 生 数	校 址
第四区	第十私立小学	王树林	44	充塾师二十年	22	三道衙门（现章古台苏木）
第五区	第十一私立小学	王作卿	50	充塾师二十年	10	善宝营子（现南湾子乡）
第五区	第十二私立小学	张志春	34	充塾师六年	12	介台营子（现土城子乡）
第五区	第十三私立小学	张 殿	47	充塾师八年	90	小哈达（现土城子乡）
第五区	第十四私立小学	马 功	68	充塾师四十一年	20	北大沟（现土城子乡）
第五区	第十五私立小学	付化轩	51	充塾师三十二年	13	德本八山（现白音他拉苏木）
第五区	第十六私立小学	尉东旭	51	充塾师十七年	15	文哈拉（八仙筒镇）
第五区	第十七私立小学	杨建智	54	充塾师十五年	15	协他拉（现好土苏木）
第五区	第十八私立小学	杨玉堂	40	充塾师十五年	24	侯沁苏木（现东明）
第五区	第十九私立小学	郝善智	64	前清生员、充塾师十八年	24	敖包桶（现衙门营子苏木）
第四区	第二十私立小学	梁万斛	48	充塾师十八年	9	巨力河（现八仙筒镇）

（二）日伪统治时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旗内多数公私立小学解散或停办，存在的亦转入私塾形式。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军进入绥东县公署，令原绥东县长何庆伦代理县长，维持政务。五月，经赤峰日军办事处总务科长諏访批准何庆伦为正式代理县长，着手恢复县公署，设二科四局。教育局长仍是张铨。八仙筒初高级小学开始复课，校长郭希禄。开设国文、算术、地理、史历、日语、体育等科目。当年在八仙筒成立一所女子初级小学，称第二校，学生三十左右，教师毕桂珍、王凤贤。后来因为日伪官吏不断到学校骚扰，年令较大的女生不去上学，该校于一九三六年合并到第一校，即初高级小学。一九三四年，在八仙筒又成立了一所初级小学，称第三校（全旗排为第二十小学），学生五六十人，教师二人，一九三六年合并到第一校。

一九三五年三月，日本人主持解散了原奈曼旗公署和绥东县公署，取消绥东县制，库伦旗划出，重新组成新的奈曼旗公署。公署设内务科、总务科、财务科、警务科。内务科下设教育股，股长佟其颖，科员一人，雇员一人，管理全旗蒙汉教育事宜。八仙筒高级小学：初级校长杨芬，高级校长里瑶轩。

一九三五年七月，周荣久攻下八仙筒，杀了参事官山守荣治、左左木等八名日本人。不久，日本人恢复统治。是年秋季，将旗公署迁至大沁他拉。大沁他拉原王府当子房私塾，改为旗立小学，校址在现食品加工厂。校长杨世奇。一九三七年，该校迁入新校，即现在一中院内，改为王府初高级小学，校长杨芬。

据资料统计，当年九月全旗有公立小学二十二所，有高级学生六十五人，初级学生八百三十六人，教师二十人。

一九三六年，在布林满都乎（伪满警务科长）的倡导下，建立了沙日浩来蒙汉初高级小学，汉文授课为主，学生近百人，教师四、五人，校长隋方。开设国文、算术、地理、历史、孝经、日语、体育。蒙文初级班每周加蒙语文数节。当年在砬石、朝吉庙两地设立两所喇嘛小学，招生对象主要是各喇嘛庙的小喇嘛，但附近村屯一般蒙族百姓的子女也兼收。

一九三八年，实行新学制，小学分为国民优级学校（有五、六年级的学校），国民学校（一至四年级），国民学舍（难以设置修业四年制或不适宜设立国民学校的地方，实施简易国民教育，属公立），国民义塾（属私立，认可的私塾）四个类别。八仙筒学校、大沁他拉王府学校、沙日浩来学校，改称为国民优级学校。

一九三八年沙日浩来国民优级学校，不再招收汉生，变为纯蒙校，改用蒙文授课。校长哈斯通拉嘎，这是本旗有史以来第一所纯蒙文高级小学。

一九四〇年，在大沁他拉建立了王府女子国民优级学校。校址在现邮电局院内，学生近百人，校长王化坤，教师二人。这所学校是奈曼旗第一所女子学校。

一九四〇年，由蒙民厚生会倡办，在大沁他拉筹建蒙族国民优级学校，校址在现旗委院内。一九四一年春开学，学生约二百人，校长王业喜，伊能礼一（日本人）任主事（伊能礼一还兼任王府、沙日浩来两所优级学校主事）。

一九四一年，衙门营子（现青龙山镇）国民学校，增设高级班，改为国民优级学校，校长崔玉清。

一九四二、四三两年，搞教育统合，把设在偏僻农村的国民学校、国民学舍进行整顿合并，有好多学校被砍掉。

一九四三年，在八仙筒建立一所蒙族国民优级学校，学生一百多人。校长王国荣。

日伪统治期间，推行实施的是奴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殖民地教育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统治初期，其教育政策的重点是废除原有的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一九三三年开始恢复建立学校，设置日伪教材，散布殖民主义教育思想，日语列为主课，向学生灌输“日满一体”、“共存共荣”、崇拜日本天皇，尽忠于皇帝的思想。一九三八年开始实行新学制，小学为三·二制，初小四年为国民学校；高小二年为国民优级学校；村办三年为国民学舍；私塾为国民义塾。教育方针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昭之趣旨，以感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为忠孝之大意，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方针。”这就是要使中国青少年成为俯首贴耳、忠实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忠良”亡国奴。在课程设置上，把原来的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砍掉，国语改为满语，日语讲授占总课时一半，设“建国精神”课，也就是政治课，讲授伪满皇帝发布的《即位昭书》、《时局昭书》、《回銮训民昭书》以及“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日本亲帮”、“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精神内容。每天早晨课前为“朝礼”时间，师生集会先向日本天皇遥拜，再向新京（长春）帝宫遥拜，行九十度鞠躬礼，唱日伪国歌，用日语、汉语背诵《国民训》：“……至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

然后才能上课。体育课喊口令都得用日语，早午晚学生见到老师，得用日语问好。学生找老师办事或请假，也得先用日语讲开头话，然后再用汉语说明事由。很多青少年只认自己是“满洲国人”，不知道是中国人。

在职教师分为教谕、专科教谕、教导、教辅四个级别。高级师范毕业的、师道学校毕业的、女子国民高等师道科毕业的、初等教育教师养成所毕业的及初等教育“教谕”考试检定合格者，授予“教谕”状；师道教育专修科毕业的或初等教育“教导”考试检定合格者，授予“教导”状；“教导”以下称“教辅”。有这几个等级衔的教师，才能有在国民优级学校，国民学校任教的资格。在国民学舍任教的称教师，但也有的是“教导”或“教辅”。

日伪统治十四年，学校数、学生人数，同民国时期比较是有扩展的。据资料统计，日伪倒台前夕，全旗有国民优级学校七所，其中蒙文三所，优一级学生（五年级）382人，优二级学生（六年级）302人。国民学校二十七所，其中蒙文八所，一年级学生1306人，二年级学生846人，三年级学生553人，四年级学生427人，共有蒙汉文教师103人。此外，还有国民学舍、国民义塾，因数字不详，未做统计。高小毕业生升学，得到外地报考，一般平民百姓子女很少有念中学的，念大学根本不可能。因为缺少资料，据我们多方调查了解，不完全统计，日伪时期全旗蒙汉族大学生、留学生有十八人，蒙汉族中学生约五十人左右。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人民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旗蒙汉族劳动群众，不仅政治上当家做了主，经济上翻了身，而且有了学习受教育的权利。人民政府大力兴办中小学教育，实行为劳动群众子女开门的方针，同时还积极开

展成人业余扫盲教育。目前，全旗幼儿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已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一九八六年，全旗完成了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任务，城镇普及了初中教育，并实现了少青壮年无盲旗。从现在起，开始着手逐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建国三十八年来，考取大专院校的蒙汉族学生1234人，其中有些人已成为高级工程师、学者和各级领导干部；考取中等专业的蒙汉族学生2453人（不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数字）。

附：伪满时间大学生、留学生名单：

姓 名	民族	原 籍	毕 业 学 校
布和温都苏	蒙族	先锋乡	东京高等师范
照力格图	蒙族	先锋乡	日本早稻田大学
布和吉亚	蒙族	先锋乡	奉天农业大学
晓声阿	蒙族	先锋乡	长春建国大学
梁完达尔乎	蒙族	太山木头苏木	日本函管师大
那木云道尔吉	蒙族	太山木头苏木	日本仙台师大
旺楚克道尔吉	蒙族		长春建国大学
李树荫	汉族	义隆永乡	长春建国大学
斯琴	蒙族	沙日浩来苏木	哈尔滨医科大学
戈瓦	蒙族	沙日浩来苏木	长春法政大学
杜玉	蒙族	白音他拉苏木	奉天农业大学
宝地乎土嘎	汉族		王爷庙医学院
舍冷道尔	蒙族	黄花他拉苏木	日本早稻田大学
确吉嘎瓦	蒙族		长春法政大学
张振清	汉族	他沁他拉镇	长春建国大学
韩起国	汉族	土城子乡	奉天军官学院
张寿昌	汉族	土城子乡	锦州农科大学

关于解放前奈曼旗各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状况，内容很不充实，并且错误难免，恳切希望所有了解情况的同志，提出批评、修改、补充意见。





我的教育生涯

王家驲口述 张斌整理

我名王家驲字志轩，奈曼旗义隆永乡五家子村人。一九〇二年出生，现年八十六岁。

我八岁开始念书，当时正是清末民初的换代时期。我一连念了二十年，小学在奈曼旗义隆永乡大营子村的私立学堂就读，十八岁考入朝阳中学，二十二岁考进北平民国大学经济系。这所大学是北洋政府内务部出资创办的，张学良兼任校长，校址在北京内城太平湖附近，原溥仪的家。当时在北京读书的，绥东县只有我们八个同学，这八个人就我一人是汉族，那七人全是蒙族，他们是：布和格什格、布和温都苏、陈树堂、恩和宝老、马哈喜里、林沁好老、拉喜曾格。据悉，这七位同学都先逝于我了。

我考入民国大学后，因不会英文，先入预科补习英文。那时，我们学校课程较紧，一时也不敢耽误，即使放假，学生也大都留校温习功课。当时的大学教授一般都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课。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曾经在民国大学兼任历史、地理课，我几次见过他，但可惜没有聆听他的讲课。他遇难被害后，我在上学路上目睹了他的灵柩。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他的灵柩移往西山碧云寺时，我曾持“奉安”送灵证（每班只出五名学生）为先生

送灵，幸亏，我排在宋庆龄夫人的马车旁，相距不超五尺远，一睹了她的尊容。在民国大学期间，我还认识了乌兰夫同志（当时只知道他叫云泽），因为他的两个妹妹云秀桐和云秀芳（可能叫此名），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乌兰夫和他的弟弟有时去看她俩，所以我们也时常见面，有时也随便交谈几句，但没有更深的交往。

二

我的人生之路是父兄教导下确定的。在我进学堂读小学时，父亲就教诲我：“读书不为升官发财，能成个明白知礼之人就好，要象你大哥那样，做一个教书的先生。”

我大哥王家骥，他于天津单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对我父亲说，绥东县只有我一个汉人在外念书的，我想振兴一下本地教育事业。他的想法得到父亲的允准和支持。宣统二年（1910年），我父亲领我大哥去绥东县，找到当时的县长孙汝楷，此人江苏籍，进士出身，不热心办新式学校，那时因废除了科举制度，人们管学校叫“洋学堂”。后来，孙县长还是勉强同意，可群众对“洋学堂”的看法一时还不能提高。经我大哥再三宣传，且不规定入学有什么条件限制，最后才招进五十多个学生。开始没有校址，就借了老爷庙东廊房做校舍。孙县长虽然表示同意办学，但不积极支持。学校里外只我哥一人，又得教书，又得管总务，还得挨家逐户动员学生，由于操劳过度，遂于民国二年（1913年）八月二十二日不幸死在校内，时年二十四岁。

兄范父嘱，奠定了我人生奋斗的思想基础，决心努力求学，将来接替哥哥的事业，终生从教。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我回到绥东县和同学们发展教育事业，仍在我大哥王家骥创办的关帝庙学堂执教。那

时，县与旗的教育事业太落后，学校成立多年，连一个升中学的都没有。我和同事们商量，咱们齐心协力，将来一定成立一所绥东县中学。当年三月，绥东县公署由库伦镇迁移八仙筒，学校不能迁移，留我和同事三人：郭喜禄、杨芬、王芳。学校距县府三百余里，经费不足又无人过问，条件十分艰苦。尽管如此，我和同仁们还是振作精神，奋发努力，学校不仅没有散伙，面貌还发生了变化，学生数不断增加，校舍环境也大有改善。

在关帝庙学堂我教了三年之后，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四月，同仁将我调到养正学校。这所学校是民国八年八月八日创建的，校址在福源寺东小院，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来经赵连仲将学校迁到皂户沁（厨师屯），买个旧院，新盖五间正房，打上院墙，盖上大门，门上用砖刻上“养正学校”四个字，这才有养正学校的校名。校长赵连科，教员有王世济。那些年社会上对念书热情减退，穷人家的孩子交不起书杂费，不愿念；富人家宁肯给学校购买用品，也不叫他的孩子上学。无奈，学校施以强迫教育，学校雇一个老头，买一匹马，负责召集学生，并规定入学学生不限年龄，随便上学。为把学校办好，从沈阳买回木料打桌凳，劝诱学生念书，即使这样，学生念书的劲头仍是不大。但也有立志求学的，我从奈曼前前后后就领过十一名学生到库伦念书，记得有哈斯同力嘎、色冷道尔吉、王业喜、苏思格土、卓力格土、梁完达尔乎等。由于同仁努力、旗公署又极力援助，加之施以强迫教育，养正学校越来越有起色。

我在北平民国大学学的是经济系，教初高两级用不上，只好担负教汉语文课。那时的教材大都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文，课文内容几乎都是反映封建帝制的古文和

诗，也有三民主义的单行本。当任的旗长时常到学校听我讲课，看我讲些什么，讲得怎么样。我的宗旨是，教书的就是给社会培养人才，不能误人子弟，要把文化知识和如何做人传授给学生。五六年级的学生都是我教，分班上课，每班五十多个学生，一天上五六节课，那时不给学生留什么课外家庭作业，就是当堂消化，因此，课外也不处理学生作业，只是背好课就行了。平均一个月小考一次，一学期总考一次，不及格的学生都降级。

当时我在养正学校教书很卖力也很安心，所以我在库伦安了家，收了个蒙古族老婆。也许我从年青时就和蒙古族青年生活、学习在一起的原故，虽然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也有差异但我在少数民族地区却非常习惯，这主要是热心于民族教育事业所致。我的同仁中后来有另谋他业的，有的还升了官发了财，他们也劝我改行，并为我改行帮忙，我就是坚持不变心，不愿离开相处多年的蒙古族同胞，不愿离开我认为神圣的学校。我的这个决心和信念使得一些人很不理解，他们甚至说我迂腐，不识时务，我对此不屑一顾，一笑了之。

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从库伦回到奈曼老家，顺便去探望我的同学好友布和格什格。他当时在伪兴安西省任职。他一再求我到开鲁跟他一起到政界去干，给我任个职（过去他也给我来过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前思后想拒绝了他的好心聘请。因我从少年到青年时期就接受了父亲的训嘱，立志接替我大哥做教育事业，不愿从政，不想做什么大官，只想终生从教，为社会培养人才，能成为一个“明白”人就是最高愿望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那时，我每月的薪金不多，勉强维持温饱。不过，那时的思想也根本没有任何奢望，只要能生活下去就足了，太困难的

时候，同仁们就伸出友谊的手帮助我，逢年过节给我送米送面送肉。那时生活虽然艰辛，但精神很是愉快，终日 and 天真的学童在一起，很感神怡而甘，常年未有苦脑。

三

正当养正学校越办越好的时候，不幸到了伪满时期，学校派进了日本人。他们把持学校一切大权，用文化侵略我们。他们将蒙汉学校归并到一起，统管起来。他们尤其歧视汉族教员。我的教学法和教学思想大概不适合日本人的教学口味和教学目的，因此他们处处刁难我，特别是那个叫永井金藏日本人，非常阴险恶毒，时时对我怒目相视。无奈，我告病假去开鲁“休养”。在开鲁整整一年，给蒙文学会的附属小学教课，有时也给蒙文学会帮忙做些事情。直到永井金藏离校后，我才回到库伦学校消假上课。不久，他们又把蒙汉学校分开。当时的文教股长紫田（日本人）非让我去库伦国民优级学校当校长，我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怕受骗上当，坚决不干；再说，人要有自知之明，我总觉得自己还是站课堂教学顺手，我从心里崇尚教师的职业，况且自己又不是个当“长”的材料，于是我就婉言拒绝了。后来是王叁三任了校长，我仍当我的教员。那当时，国难当头，学校也不安定，所以这个学校也没办出什么成绩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学校当作一块圣地，是其乐无穷的“净土”天堂，容不得任何人贬低和欺辱。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的一次搅乱学校的重要事件中，我被痛打关押，至今想起，仍愤慨不平。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午后，还没到放学时间，有一个身穿长袍的男青年，手拿花生瓜子，放荡不羁地直接闯入教室，我班级最大的女生满喜谈话。学生见此人举止轻浮，语言无礼，就报告了校长。我当即把他请到办公室，问其来

意，他却蛮横无礼，非要找那个女生谈话。我气怒地说：“你和他非亲非故，有什么好谈的？再说，上课时间，哪有谈话的闲空！”他不听劝阻，执意要找那位女生。这时，许多男生聚集在办公室，气愤不已，群起逐他出校。他无奈被迫退出门外，出口不逊，大骂不止，对此，男学生怒不可遏，愤然与他欧打。他见寡不抵众，急行逃掉，边逃边声言：“你们等着瞧！”

原来他是库伦街上驻防的警备军。没有多时，就有八九个持枪的兵士闯进学校，不问青红皂白，野蛮地逮扑了校长拉希德门格尔（五世杰），教员玛哈巴尔迪（王恩）和我三人，一路劈头盖脑地痛打。我们三人被押到街里广生合商号，由张连长审问。他的翻译是个朝鲜人，不时地拳击脚踢打校长和我，不容我们说理。审问了两三个小时就把我们三人关在一间空屋里，门外有持枪兵士看守。

我三人被抓走时，学校师生跑到旗公署见旗长罗布桑林沁和参事官岩满三七男，要求立即放人。旗长令人见张连长，经过交涉，把我们三人领回。但惹下祸端，每日有士兵五、六人数次来校寻衅闹事。学校不得已被迫停课。我三人只好躲起来。一礼拜后，三家子玛老爷出面调解，他说与张连长结义拜把子。时间不长，未等调解好，警备军调防他处，此事也就罢论。学校受辱，在我心灵深处留下不灭的印记。

我在库伦从事教育事业，为期十六年（1929—1945），虽然没做出什么惊人大业，但我问心无愧。十六年，我亲手培养了一千六百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大多成了社会的有用人才，经我写过学习成绩出国留学的就有六、七名，大多去了日本，也有去别的国家的，有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的在

社会科学领域，不少成了专家学者。解放后，还有不少学生担任了领导职务，省、地、县级都有，前几年去世的盟长那木吉，就是我的学生。还有盟法院院长巴图，盟政协副主席富日来，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负责人梁完达尔乎，库伦旗政协副主席齐克奇等都是我的学生。不少在外地的学生也都做着大事业，年长日久不得信息，也就知道了。我现已八十六岁老齡，到了耄耋之年，生命将就木矣。但每当想起自己那十六年的教育生涯，就有一种充实的满足感和欣悦的幸福感，抚慰着我的心灵——这辈子总算还为社会尽了一点力。因此，我也常常感叹：如今世道大好，祖国要繁荣，首先要振兴教育啊！



(题头照片 萨木拉摄)

中兴印刷局的由来与发展

刘贵民 忆述

胡永平 整理

解放前，我在大沁他拉与人合股经营刻字印刷业，自立字号“中兴印刷局”。“中兴印刷局”虽然只是个小手工企业，但在当时的大沁他拉街上，却算是比较大的轻工业厂家。现就开办中兴印刷局的过程及其生产、发展情况，作一简略介绍。

中兴印刷局的由来

我家原籍在朝阳区三区缸窑岭刘三家子村。十八岁为了谋求生活，经人介绍到朝阳街“合兴润”杂货铺学徒。那时朝阳街地面不大，但大小商号和各种作坊不少。在小杂货铺当个“柜腿子”，除了自己吃穿外，每年挣不了多少钱。我有个同乡叫王德轩（他家住缸窑岭潘三家子，与我村相邻不到半里地），比我早一二年就在朝阳街道德会印刷厂当学徒，也因为挣不多少钱，在民国廿四年夏天来到大沁他拉开个刻字所。第二年春天，他回朝阳时跟我说，奈曼那地方开辟得晚，生意比较好做，于是我就离开“合兴润”跟他到大沁他拉来了。起初，我俩合股开刻字所，干了半年多，听说八仙筒印刷所要停业，东主李子纯要回原籍，他有一台旧的二号石印机要出手，我们就买了下来。就这样，从民国廿五年夏秋开始，我们在经营刻字业的同时，又搞起了石印印

刷，还设置了铺面，兼营文具纸张。那时开铺子、办作坊，大小都得有个字号，我们就商量起了名字叫“中兴印刷局”。

中兴印刷局的生产及发展情况

搞起石印印刷以后，由于人手不够，我们又雇了一名徒工。起初几年，里里外外就我们三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没有“脱产”人员。

那时的印刷行业中，石印也好，铅印也好，都是手工活，工作效率和生产质量都远远比不上现在的机械印刷。印刷形式一般分凸印、凹印和平印三种。我们搞的石印印刷属于平印形式，其生产过程既笨重又繁琐，每印一件活，都得经过原稿设计、制版、修版、印刷和裁断等四、五道工序，其中最费工费力的是制版和修版。

制版：就是把设计好的文字或图表的原稿内容，书写或描画在一种药纸上，然后把书写或描画好的药纸反铺在碎平的石板上，再用“过板”压平，反复摇动压轴，把文字或图表的印迹“过印”在石板上，这样石板上拓印下来的就是要印制的文字或图表的反面印迹。这个石板就是印版，一般称为“负版”。这就是初步制成的“版”。

修版：就是修正初制的印版上的文字或图表的印迹。主要是检查制版时“过印”得是否清楚，如果印迹模糊不清，或漏掉了笔划、印迹，就得一点一点地加以修补，直到把版上所有不清楚的笔划、印迹描补清楚、均匀后，再撒上松香粉，最后再涂上一种叫“桃胶”的药水，用扇子煽干，这样字迹就带上油质变得发涩，才容易着墨。这些工序处理好之后，“版”就算修好、制成了。

印刷之前，必须用湿抹布把印版擦拭一遍，这道工序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是利用油水不相融合的特点使印迹着墨，因为印迹上有松香、桃胶等含油的药物，能挂墨而不沾水，无印迹的“空地”则光滑无油，虽沾水却不挂墨。把印版擦湿后，再用油滚上墨，然后把纸铺在印版上，盖上压板，再在上面摇动压轴，使着墨的印迹印在纸上，最后把印上印迹的纸轻轻揭下来，按设计要求裁断后，这张纸就印完了。再印下一张时，还得照上述程序反复一次，而这些过程都是手工操作的。这样两个人干一天，一般也就是印八百张左右，最多时也只能印一千来张，不够现在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干的。

如果再印别的内容，得费很大劲把印版上用过的印迹磨掉，重新制版。要想在原版上换印别的颜色，也得用汽油把版上的油墨洗净，才能换用所需要颜色的油墨；要印制套色活，那就更繁琐了。

解放前，大沁他拉除伪满旗公署四个科八个股外，还有十多家店铺、作坊和两所学校。我们的生意主要是承印这些机关、商铺和学校的公文纸，各种表格、帐目和票据等，再就是印制和经营些学生笔记本，刻制些机关公章和私人手章等。

旧社会生意不好做。印刷刻字这种生意，要赚钱就得多承揽些活，要多承揽活就得同各方面主顾搞好关系，更不能得罪日伪警察。如果搞不好关系，活就不好承揽；要得罪了有权势的主顾，做出活来，人家也故意挑剔、刁难，这时还得给人家陪笑脸，说好话，连句解释辩驳的话都不敢说。那时，我们每年都给旗公署承印不少活，给各科、股承印的活，都到总务科财会股领款，要得罪了总务科，他们就常常

“卡脖子”，不是拖着不给付款，就是找茬子，挑毛病，有时干脆不给工本费。这样，逢年过节还得拿上礼物去“拜望”人家。那时做生意最怕的是伪满经济警察。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年）搞过一次“七、二、五”定价，就是以康德七年二月五日作为统一定价的时间起点，所有货物、产品都得贴上价码标签，如果不贴或标价不对而被经济警察查出来，轻则打骂、没收、罚款，重则给封门，不叫营业。有王家小铺，货物没贴标签，店主挨一顿打，还给封了门，后来托人送了礼才准许营业。我们柜台有一件商品，明明贴了个标签，他们也硬找错缝打了我一耳光，我也没敢说什么。

中兴印刷局开办以后，王德轩我俩在一起干了二三年，他就又回朝阳了。后来朝阳道德会印刷厂停业了，我们从那里又买下一台二号石印机和一台八页铅印机，还有铅字和一些零星设备，又在朝阳开个印刷所，也是我与王德轩合股办的，算是中兴印刷局的分号，那时叫“分拨子”。到民国廿八年，这个分号也搬到大沁他拉街来了。从此我们又有了铅印。

随着机器设备的增加，我们又雇了两名工人。到民国卅三年即光复的前一年，中兴印刷局发展到六个人，我和王德轩算是股东，但也不完全“脱产”，另四人是雇用的工人，其中两名是徒工。这一年王德轩我俩分开，他去开烧锅，中兴印刷局按一千二百元资产核定归我单独经营。王德轩分出去不到一年，日本鬼子倒台，祖国光复了。

光复后到建国这段时间，只有我和一名工人支撑门面。头一年揽不着活，我跑几次小买卖，厂子里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有时接点零活也不多。这期间曾经给旗王府印过一次“白票子”，就是旗内“流通券”。因为日本人倒台后，伪

满的“赶羊票”不花了，为了市面上交易方便，旗王府就印了些“流通券”，但流通范围不大，时间也不长。后来在市面流通的除了旗内印制的“白票子”外，还有国民党发行的“东北流通券”和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流通券”。

一九四六年三月，奈曼旗人民政府成立。不久，财务科科长高寿明跟我商量，在中兴印刷局门市上办了个东北新华书店分店，主要经营图书、报纸（当时没有邮政部门）。旗委还派来两个人跟我合作，一个是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叫李子恒，他跑外，叫我兼书店经理；还有一个叫龙芬（现在通辽市税务局工作）当店员兼会计。那时图书报纸不多，主要通过一些宣传品，宣传八路军解放东北，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主张。这个书店办了半年多，到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就撤了。此后中兴印刷局仍由我单独经营。

中兴印刷局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不久我旗建立了工商业联合会，我被选为工商联委员。建国后，随着社会形势的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兴印刷局也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形势，笨重的石印印刷逐步减少，后来就全部改为铅印，并逐渐增添了设备，扩大了生产，除承印各种文字材料、表格、账簿、票据外，还能承印一般的图形和套色活，基本上能满足全旗各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各农社印制印刷品的需要。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除我外，有工人三名，二、三号石印机各一台，八页铅印机一台，还有一台小手扳子，加上厂房和其他设备，全厂资产核定总额为三千九百多元，中兴印刷局也改名为“公私合营奈曼旗印刷厂”了，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到一九七九年我退

休时，印刷厂已经发展到三十八人，年产值三十多万元，成为机械化的地方轻工业企业了。





宝石柱艺术成果录

王占山

著名蒙古族民间艺人宝石柱是奈曼旗人，生于一九一〇年。从小手巧伶俐，喜爱绘画，由于家境贫寒，十几岁就到寺庙学艺，他设计的建筑装饰纹样，雅俗共赏，情趣横生，他雕塑的各种佛像，多姿多采，既庄严肃穆，又朴素生动，他绘制的壁画，吸取了藏、汉寺庙壁画的优点，又具有浓厚的蒙古族生活特色，用色鲜艳明快，笔法流畅自如，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宝石柱同志的精湛技艺，是半个世纪以来勤学不怠、博采众长，刻苦钻研，努力实践，经常总结，不断提高的结果。

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才知道光明的可贵。解放后，宝石柱热爱新社会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在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根。他以自己的手艺热心为人民群众服务，每逢年节，农事稍闲，他就搞剪纸，他的剪纸作品，内容基本来自农、牧民生活，表现了蒙古族人民勤劳、勇敢，热爱大自然美好风物的思想感情。宝石柱同志自从参加旗文化馆工作，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艰苦的环境下，成功地复制了一套《收租院》泥塑。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以极大的创作热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五十多年积累的民族民间图案素材创作出一百三十多幅图案画，被专家称为国内外罕见的民间艺术珍宝。

宝石柱以自己的工作勤奋，攀艺术之高峰，力争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他年事虽高，但艺术才华犹如喷泉之水源源不断。近年来他收徒传艺，把技术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宝石柱同志于1980年7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多次出席过内蒙古自治区的群英会。现在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内蒙文联委员。宝石柱在新长征的道路上，精神振奋，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附：

重点作品目录

一、泥塑类

顺序号	时间	作品名称	发表展出地点
1	1937年	美岱尔佛（一丈高）	绰尔吉庙
2	1940年	袞楚克王爷（一丈高）	衙门庙
3	1941年	扎木斯冷佛	波日胡硕庙
4	1946年	达木林	波日胡硕庙
5	1946年	达玛臻	波日胡硕庙
6	1946年	尚伦	波日胡硕庙
7	1946年	四大天王	库伦葛根庙
8	1957年	小女婿	大沁他拉镇
9	至 1960年	西厢记	大沁他拉镇
10		牛郎织女	大沁他拉镇
11		嘎达梅林	大沁他拉镇
12		工农兵	大沁他拉镇
13		火车、拖拉机	大沁他拉镇
14	1967年 至 1972年	收租院 (人物与道具120多个)	大沁他拉镇

顺序号	时间	单 品 名 称	发表、展出地点
15	1984年	释迦牟尼佛	奈曼王府佛堂
16		接引佛	奈曼王府佛堂
17		绿豆母菩萨	奈曼王府佛堂

二、剪纸类:

18	1955年	接羊羔	内蒙古日报
19	1956年	打 狼	内蒙古日报
20	1956年	打 猪	内蒙古日报
21	1961年	安代舞	哲里木报
22	1962年	庆祝春节	哲里木报
23	1979年	蒙古族图案	内蒙《实践》杂志

三、绘画类

24	1934年	奈曼第一任王袞楚克画像	孟根庙
25	1936年	释迦牟尼40幅	大沁庙
26	至 1946年	班禅额尔德尼15幅	
27	1950年	宗喀巴15幅	
28	至 1952年	美帝国主义侵华史 (连环画)	大沁他拉镇
29	1953年	送公粮	内蒙古日报
30	1954年	卖余粮12幅	内蒙古日报
31	1961年	范国贵翻身忘本记 (连环画)	奈曼、开鲁
32	至 1966年	麦新、钱家店村史 (连环画)	通辽巡回
33			展 出
34	1973年	王富家史(连环画) 小铁厂	吉林博物馆
35	1974年	考 古	吉林博物馆

顺序号	时间	作品名称	发表、展出地点
36	1977年 至 1979年	蒙古族民间图案130幅	民族画报、 内蒙古画报、 《实践》杂志选发
37	1982年	回 府	中国美术馆
38	1982年	灯 会	中国美术馆
39	1984年	佛舞图	哲里木文艺
40	1984年	奶 酒	哲里木文艺

此外，大沁庙、工程庙、朝吉庙、双山庙、波日和硕庙、奈曼王府的雕梁画栋、壁画图案均由宝石柱设计而成。

(题头照片 周钰摄)

蒙医药学家占巴拉道尔吉与 《蒙药正典》

周惠民 乌力吉白音

蒙医学是中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蒙医药学家，清代奈曼旗的占巴拉道尔吉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不朽名著《蒙药正典》独树一帜，在蒙古族药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蒙古族人民同自然界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许多医疗知识，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医学体系。公元十七世纪以来的三百余年，是蒙医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增加，藏、汉、回等兄弟民族的医药学书籍也相继传入。传统的蒙医学在同其他民族的医学交流中，取其精华，融汇贯通，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许多医药学专著也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在学术上也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他们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推动了蒙医学的发展。但由于一些著者的粗心和偏见，在某些药物的名称和使用上造成了混乱，导致以讹传讹，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地整理蒙医药学的工作已势在必行。十九世纪，占巴拉道尔吉的《蒙药正典》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蒙药正典》（有译“蒙药本草从新”；藏名：斋萨日

密格占)是著者在整理前人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编纂而成的一部较完整的医药学专著。书中纠正了当时药物名称上出现的混淆和错误,同时也兼收了藏、汉等兄弟民族医药学的一些内容。关于编著此书的目的,占氏在序言中写到:“今之医者,各持认药之偏见,错迳甚广。或随意取名,或与汉药名混淆。有将芍药认作玛努(青木香),黄芪认作利德日(苦参)者……这些大多数是由于关布扎布※等人的著作中所造成的混乱。鉴于谬误流传,欲正其误,使药书诠释与医者经验相结合,故编此书”,并声明编写此书的宗旨是“为消除边陲贫者之疾患,仁念为怀,示以草方”。书中共载入八百七十九种药物,并根据药物的性状与功能分为珠宝、石、土、滋补、木、草、汤药、动物产等八部,每部又下分几类。如土药部下分天然土药、土产盐……等三类,计八部二十四类。每味药物名称都用蒙、汉、藏三种文字对照,还附有五百七十六幅药物插图。其产地、形态、性味、功能、入药部分、收采时间、贮藏及炮制方法等均有详细记述,书中还描述了一些外科术疗使用的器具、样式和用途;放血、针灸术疗、身体各部划分法;记载了三百多个穴位,对重要穴位还标有图解,并对其适应症作了深入的阐释。全书用藏文书写,共二百八十四页,有木刻版本。该书自问世后,即成为后人学习和研究蒙药学的指南与范本,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有人把该书与十七世纪蒙医方剂学家占布拉著的《方海》、十八世纪青海蒙古人伊舍巴勒只尔的五卷名著《甘露之泉、白露医法从新、甘露……》

※关布扎布,公元十八世纪初锡盟乌珠穆沁旗人,曾任北京唐古特学教习。著有《药方》一书,书中收有多种药物及验方;还著有一部《藏蒙词典》,其中收入了许多医学名词术语。

点滴、甘露汇集、认药白晶宝鉴)同列,并称为蒙医药学的三大经典代表作。

据考证,古巴拉道尔吉(博尔济吉特氏)系奈曼旗第十三任扎萨克萨噶拉之长子,波日和硕庙(庙址在奈曼旗治安镇境内)第四世葛根。关于他的具体生卒年代其他业绩,因缺乏文字记载,目前还不十分明了。现仅举以下几事,或可间接知其大概:奈曼旗第十三任扎萨克玛什巴图尔是古氏胞弟,于1869年继承王位,1905年去世;其长子舍冷旺布生于1886年,八岁时(1894年)被聘为波日和硕庙的第五世葛根。他既是古氏的亲侄与下任,也是波日和硕庙的末代葛根,于1969年在呼和浩特去世。由此可以推断,古巴拉道尔吉生活的年代,是在1894年以前的近一百年间。古氏圆寂后,其属下遵其遗嘱和有关庙规,同他的前两任葛根一样,将遗体安置于泥塑像内供奉于庙中。现治安镇一带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多有曾见过三尊塑像者。可惜在土改中,这些塑像和波日和硕庙一样遭到了被毁灭的厄运。庙中的经卷及其他书籍皆被付之一炬,有关古氏的记载,也就难以查找了。

令人不解的是,在《蒙药正典》一书中,除能反映出古氏系奈曼旗籍之外,著者对于自己的其他情况,包括成书年代一概没有披露,所以到目前为止,对于他的生平仍缺乏足够的了解。



奈曼旗鼠疫及防治概况

徐宝栋

奈曼旗在建国前的二十多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散在的人间鼠疫发生和流行。1949年至1957年，虽有部分年份发生人间鼠疫，但由于党和政府极为重视，防疫工作积极稳妥，不仅未酿成大患，而且于1958年后再未发生人间鼠疫。

一、人间鼠疫流行情况

据调查及盟、旗防疫站有关资料记载：奈曼旗在1922年、1924年、1925年、1927年、1928年、1929年、1932年、1933年、1934年均发生过散在的人间鼠疫。1935年至1948年间，发生和流行人间鼠疫较为严重的有五年，即1937年、1938年、1943年、1944年和1945年。其中1944年于三十个自然屯发生鼠疫，病人865名，病死766人；1945年于四十三个自然屯发生鼠疫，病人1245人，病死997人。现据调查资料表明，当时绝大多数病例为腺型鼠疫，少数病例续发为肺型鼠疫。1949年至1957年间，发生鼠疫的仅有五年，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最后于1957年干歹屯发生一例鼠疫病人而终止。

据统计，奈曼旗从1922年至1957年的三十六年间断续发生人间鼠疫二十八个年份，于一百四十四个自然屯发生一百八十三次。其中发生一次的一百一十三个自然屯，发生二次的二十四四个自然屯，发生三次的六个自然屯，发生四次的一个自然屯。发生鼠疫病人为4276人，死亡3518人。于一百四

十四个人间鼠疫疫点内及其附近发现鼠疫动物病的疫点二十一个)

二、鼠疫防治措施与效果

(一) 鼠疫预防

奈曼预防鼠疫是针对鼠疫流行过程的三个环节，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季节和不同流行特点，有重点地采取综合性预防措施，其中包括宣传教育、检诊检疫等组织和技术措施。

1、宣传教育：奈曼鼠疫疫区面积大，人多，又都处在农村、牧区，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加之解放初期群众和基层干部缺乏防疫知识，从而使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疫区广大群众和干部反复宣传鼠疫的基本知识、鼠疫的防治办法，消灭鼠疫的有利条件，以达到克服恐惧心理，破除迷信思想，树立与鼠疫作斗争的信心，使之积极投入到防治鼠疫工作中去。随着人、鼠间鼠疫逐渐得到控制，把各时期预防鼠疫规划，各阶段的工作部署告诉群众，紧紧围绕当时中心工作宣传鼠疫对生产、生活的严重危害，使疫区广大群众和干部，充分认识到为完成党的中心工作，必须把鼠疫防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宣传形式多种多样，忆苦思甜是经常采取办法之一，即发动群众忆旧社会的苦，控诉旧社会统治者对疫区采取烧光政策；通过鼠疫患者的现身说法，忆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思新社会党和人民政府对群众的关怀，结合典型人物报告，激发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把鼠疫防治变成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此外，通过党的会议、人民代表会、专业会议及广播、放映幻灯、培训基层卫生人员

等形式，加强了对各级领导和疫区群众的宣传教育，使鼠疫防治知识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控制人间鼠疫和消灭鼠疫疫源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疫情报告：采取早期发现疫情，早期报告，及早处理疫区和控制疫情扩大蔓延的措施。

建国以来，在鼠疫地区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逐级报告疫情，形成了一个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群众组织组成的疫情报告网，即街、屯、生产队（卫生组长、卫生员）→村、生产大队（卫生委员、农村医生）→区、公社（卫生助理）→旗（卫生科）→行政公署（卫生处）→自治区卫生厅→流研所。疫情报告内容，明确规定了报告不明高热病人，不明病死鼠、不明急死病人制度。向上级报告时间，农村不超过12小时，城镇不超过6小时。上一级接到报告后专业部门要在2小时内组织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疫区处理。对义务报告人员，给予相应的补贴和奖励。疫情确定后，除逐级上报，还通报当地铁路、交通、驻军和毗邻地区，防止疫情扩大蔓延。

3、预防接种：广泛接种鼠疫菌苗，增强人群免疫力，预防鼠疫发生。1949年前后主要使用死菌苗及苏联生产的EV活菌苗。其后，广泛使用了我国生产的EV活菌苗。1956年开始改用皮上划痕法。

预防接种范围是：经常发生人、鼠间鼠疫的村屯居民及其相邻地区，近6个月未接种的居民；进入疫区内捕猎疫源动物的人员和从事强毒鼠疫菌工作人员。

（二）、灭鼠灭蚤

1、灭鼠：

灭鼠类型：重点在人、鼠间疫区紧急灭鼠，要求在较短

时间内，尽可能把鼠类消灭干净；其次是预防性灭鼠，要求在疫源地及其邻近地区的一定范围内开展或在疫点周围进行，要求普遍降低家、野鼠密度，防止鼠疫流行和扩大蔓延；再次消灭鼠疫自然疫源（群众称为灭鼠拔源），是有计划地在疫源地内，充分利用自然屏障和生物屏，大面积连片灭鼠，要求鼠密度达到动物鼠疫不可能流行的程度，并提出一定指标要求，以期根除鼠疫。

灭鼠方法：主要采取因地制宜，抓住有利时机，实行家、野并重开展灭鼠工作。在灭野鼠方法上主要采取“三包五定一奖”制，土洋结合，突出与经常相结合的措施。在技术上实行“捕、毒、熏”等方法。

捕：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行之有效的土工具进行灭鼠。如鼠夹、鼠笼、桃杆、鼠灌、鼠车、地箭等，这些方法群众使用方便，人畜安全，又利于疫源检索工作。在有水源地方还可以用水灌灭鼠。鼠密度较低地区用锹挖。

毒：用鼠药制成毒饵灭鼠，在实际灭鼠活动中使用最多，灭鼠面积最广。五十年代灭家鼠用安妥，对褐家鼠杀灭率为31.2~51.5%。用亚砷酸浸煮玉米灭野外黄鼠，灭洞率为84.3%。但是，药物灭鼠中使用最多的仍为磷化锌，其浓度用于室内灭家鼠为1~10%。六十年代除上述方法和药物外，还开展熏蒸灭鼠法。到七十年代开始使用高效低毒的敌鼠纳盐毒饵。在药物灭鼠中，投药方法和饵料的使用不断得到改进。

熏蒸剂种类较多，六十年代主要使用烟炮灭黄鼠和长爪砂土鼠，烟炮是用助燃剂加某种灭鼠药制成，其配方有10余种，主药多用六六六原粉，亚砷酸、氯化苦、敌百虫等。用烟炮灭鼠还有杀虫效果。1949年后通过上述灭鼠方法，消灭

了数以万只各种鼠类。

2、灭蚤：

灭蚤分环境灭蚤、鼠洞灭蚤、衣物灭蚤、家畜灭蚤和野外灭蚤。在技术方法上又用物理灭蚤，即烧燎、抹、熬和化学灭蚤即药物灭蚤。

物理灭蚤方法在各疫源地区都实行过，而且在五十年代初期是一种主要的灭蚤方法，当时对控制人间鼠疫起过重要作用。

药物灭蚤，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国家制药工业的发展，则普遍应用六六六和二二三药物进行喷撒。而且在灭鼠的同时，结合毁洞达到消灭洞干蚤的作用。这对控制人、鼠间疫情，灭蚤居特别重要地位。

（三）疫源检索

奈曼鼠疫鼠源地分布范围较广，发现疫源地确切时间是五十年代初期，在境内鼠疫动物病流行猛烈并引起人间鼠疫的流行。由于开展找源灭源工作，到五十年代后期，控制了人、动物间鼠疫流行。六十年代扩大查源范围，发现了以黄花塔拉苏木为重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从此控制了人、动物间鼠疫流行，这是奈曼旗鼠防战线上的重要成就之一。

1953年旗防疫队设立检验室，1964年~1966年8月在重点疫区和毗邻地区，建立了强毒鼠类解剖站，在每个解剖站的周围设立若干收鼠点。在疫区形成了一个由解剖站、防疫站在基层设检验室和旗设中心检验室三级检验网。为了防止实验感染，造成人为的传播，各检验室和解剖站都制定了鼠疫检验自身防护规划和制度。为了缩短实验诊断时间，在实践中逐渐将“四步”检验的制定时间从96小时缩短到12~48小时，大大缩短了检验时间，从此，人、鼠间疫区得到了及

时处理。

（四）鼠疫疫区紧急处理

不论发生人间鼠疫或动物间鼠疫的疫区，都立即采取紧急的疫区处理措施，以彻底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防止扩大蔓延。

1、确定疫区：接到疫情报告后，要求苏木、乡、镇和大队卫生人员在1小时内向上级报告，旗防疫站必须在二小时内出发，迅速赶赴现场。凡有鼠疫流行病学指征和较典型的鼠疫临床症状，又不能排除鼠疫患者，即可确定为疑似鼠疫病人，并划为一定范围视为疫区，立即进行处理。

2、建立临时指挥部：为加强疫区管理，做好疫区处理工作，必须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成由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卫生防疫人员和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临时防疫指挥部。其任务是：动员、组织群众采取紧急疫措施，管理隔离封锁，掌握并随时向上级报告疫情动态及工作进展，供应疫区处理药械和生活品，最后提出疫区处理总结报告。

3、划定和处理大小隔离圈，根据不同疫区和人口居住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在新镇乡三家子村和黄花塔拉苏木的后查干套布日格屯疫区处理，则以患者家为中心，将其范围可能被污染的房舍划为小隔离圈，全面进行检诊、消毒、灭鼠灭蚤和搞好环境卫生。将隔离圈半径周围3~5华里范围内的居民点，街道和野外划大隔离圈。根据鼠疫的临床病型感染来源，流行情况，污染范围等，采取相应卫生措施。人口稠密的地区，再在大隔离圈周围，划定半径5~10华里的警戒圈，采取疫情监视，灭鼠灭蚤，交通检疫等必要的预防措施。

疫区隔离封锁和解除须经旗人民政府批准方能实施。解

除疫区封锁须在发生最后一例患者，经疫区处理后9天再无新患者出现时方可宣布。

总之，奈曼的鼠疫防治工作，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级鼠疫防治专业人员和全旗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战，取得了很大成就。

解放初期，鼠疫防治工作主要任务是控制人间鼠疫。1955年与1949年以前相比下降90倍。从1956年开始进行鼠疫疫源地普查工作，此期间积极开展灭蚤灭鼠为中心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控制了奈曼鼠疫发生和流行，并总结出适合奈曼情况的一套鼠疫防治工作经验和综合性措施，为根除奈曼鼠疫疫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奈曼旗四任王爷被削职的经过

希儒博

自清崇德元年（163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世孙袞楚克被清太宗皇太极封为奈曼旗扎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始，至伪满州国康德二年（1935年）取消扎萨克职止，该封建家族，世袭罔替统治奈曼达三个世纪。

这三百年间，共有十二世十六人历任奈曼旗扎萨克之职。在他们新老交替相互继承中，并不是都按自然法则的规律老故少继、承上启下的。其中有四个人不是终身任职，而是由于种种缘由，半途被执政当局削去爵职，剥夺王位，甚至险些成了刀下鬼。那么，这四个人都是谁，“悲剧”又是怎样造成的，受到了什么处罚等一系列问题，是需要了解的。

（一）

《内蒙古各部王公世系》一文奈曼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次袭阿罕，袞楚克次子。顺治十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十六年，以罪削。”

清顺治十年（1653年）奈曼旗首任扎萨克郡王袞楚克寿终正寝。依照清廷“世袭罔替”的典规，其次子阿罕（有的书上记作阿尔罕）名正言顺地承袭了奈曼旗扎萨克郡王爵。在阿罕的任期内，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奈曼旗发生了一起“策反”事件；

当时，本旗绰尔济庙的达喇嘛名叫扎木苏绰尔济。他出于摆脱清朝统治，另起炉灶统辖一方的目的，千方百计收买、拉拢旗下练兵（旗内正规军）密谋反清。此事被清廷察觉后，便下令通缉绰尔济喇嘛，限期捉拿归案。但是，奈曼郡王阿罕拒不执行命令，相反将绰尔济喇嘛窝藏起来。哪曾想，阿罕认为万无一失的秘密却被其属下人（仆役）翁俄拜发现了。阿罕想到此事非同小可，假如走漏了风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为了摆脱困境，他左思右想，谋划出了一条毒辣的手段——杀人灭口，严防泄密。随即将翁俄拜全家投进了监狱，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满门抄斩，制造了一起灭绝人性的惨案。

阿罕的所为，欲盖弥彰，终究被朝廷查处了此案。最后，清廷置阿罕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于不顾，仅以窝藏罪犯为由，撤销其奈曼旗札萨克郡王职务，削为平民结案。这件事，在《清世祖实录》中留下了如下一段记载：“顺治十六年冬十月，甲寅，削奈曼部落达尔罕郡王阿罕王爵为庶人，并夺其所属人役。以其隐匿绰尔济恐所属翁俄拜首告，遂抄杀翁俄拜全家也。”（台湾华文书局版1534页）

（二）

阿罕被削职后，清廷封其弟札木萨（袁楚克第三子，亦写成扎木三）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继承了奈曼旗札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职。

康熙十四年（1675年）夏历三月，察哈尔布尔尼（前察哈尔林丹汗内侄儿，时为朝廷命官——义州王）反清。当时，奈曼旗郡王札木萨则积极响应，表示声援和支持布尔尼的反清之举。他不但率兵进驻察罕郭勒（即察罕河，为奈曼东南方界，与土默特左翼旗隔河相望）与布尔尼部“全联声援”，

而且派遣得力心腹到扎鲁特等旗，串联和煽动札萨克联合起来，一致反清。

为尽快平息布尔尼的叛逆行动，朝廷命令抚远大将军，信郡王颉礼率师征讨，布尔尼叛军在清军重兵追剿下，已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到达禄（今库伦境内）一带更是一败涂地，布尔尼率残兵败将继续北撤。据传，当年在我旗今固日班花苏木东南部叛军和清军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死伤不计其数，后来这个当年鏖战过的地方就命名为敖伦陶鲁盖图、敖伦苏木图（敖伦：众多的意思；陶鲁盖：头颅、苏木：箭筒，意为有众多头颅、众多箭筒的地方）。就在这次战斗中，札木萨命令其部，将箭头卸掉，以空杆射击，佯做阻击。因而使叛军残余“突破”了包围圈向北逃遁了。到扎鲁特境内，布尔尼被科尔沁额驸沙津阵斩，全军覆没，轰动朝野的“布尔尼反叛事件”历经半年时间，终于被平息了。

同年十月，“论平布尔尼功……以次各晋爵，罚助逆奈曼等部”。

直到这时候，札木萨才如梦出醒，感到自己同叛逆者合污罪责难逃，便赶紧向朝廷自首投案“蹙缚乞罪”。康熙皇帝鉴于札木萨能认罪自首而旨谕“特旨贷死”饶其一命。并且削去札木萨奈曼旗札萨克郡王职务，为平民。与此同时，对那些不附叛逆的台吉们都一一予以晋级、奖赏。其中奈曼旗的有：

和硕额驸巴达礼(袁楚克长子)之子，一等台吉颉齐尔在其叔札木萨煽动反清时，没有参与他的活动。同时以防不测，便率其妻小及所辖九箭箭丁秘密转移到喀喇沁旗隐居。对此，康熙皇帝嘉其忠诚，旨谕：颉齐尔由一等台吉晋郡王爵，封为奈曼郡札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并记功于清廷《功

劳薄》；乌勒木济由二等台吉晋贝子；格噶尔由二吉晋一等台吉；额齐尔长子额尔德尼授三等台吉。

(三)

康熙三十六年（1707年），额齐尔之孙却经（有写“吹忠”的）承袭其父班第职爵，成为奈曼旗第六任札萨克郡王。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以罪削”。关于却经被削去札萨克郡王爵职的原因迄今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却经在其任职期间，仿照北京皇宫，大兴土木，建造奈曼王府。在今新镇乡呼和格尔村附近建成了相当豪华的宫殿。所建王府不但大大超过了一个郡王府的规格，而且耗银无数。为此，有人告了御状，经清廷查明后，以“图谋不轨”削去其郡王爵。

其二是，康熙皇帝出关到热河巡狩，命令却经王伴驾。但是，他不等巡狩结束竟未经请命，擅自率部归府了。因为，清朝时，巡狩不仅仅是消遣娱乐，而重要的是把它看成是一次严格的军事演习。受命各旗札萨克王必须如数率领其练兵按指定时间，地点参加围猎，如不服从命令或擅自离开就要治罪。所以，却经王的行动已经触犯了朝廷定规，从而被削职是不足怪的。在《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系图表》一书中，用满蒙文记载着一段话，译成汉文其意为：“康熙五十九年，却经王随皇帝巡狩。因未经请命，私返回府而获罪，革去爵职，命其弟阿萨拉继王位。其他原因未见记载。（大连市图书馆M. 3号卷）由此可见，却经被削职的原因在于后者的可靠性较大，但也不否认前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四)

康德二年（1935年）三月，伪满政府撤销了绥东县治，结束了县旗二署并存的局面，合二而一，重新组建了奈曼旗

公署，受兴安西省管辖。新旗公署由奈曼旗末任札萨克苏达那木达尔济任旗长（从此取缔了延续数百年的“札萨克”之称）日本人山守荣治为奈曼旗参事官。旗公署仍设在八仙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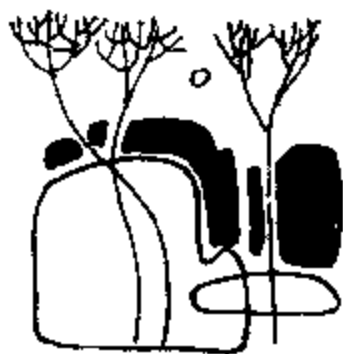
当年七月下旬，发生了以周荣九为首的奈曼“抗日救国军”一度攻占八仙筒的事件。在双方交战中，抗日军民击毙了参事官山守荣治和警察指导官中根长一，俘获署官佐佐木正太郎以下八人，除一名叫须藤的日本人外，驻八仙筒的日伪军警全部被歼灭。对所俘三名日本人也经公审后执行了枪决。

这一起反满抗口事件，轰动了日伪朝野，反响很大。日本人唯恐事态发展危及其所为“强化治安”，便采取了野蛮镇压的手段。他们一方面派重兵追剿周荣九部，同时，以策动事件的嫌疑对奈曼旗上层知名人士也下了手，这是因为，当时的王府保安大队长马全宝（亦叫“马老排”）派亲信部下小敖日布等带领七十多人马，会合周荣九部参加了攻打八仙筒的战斗。这件事不能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所以，伪兴安西省政府派潘井科长（日本人）通知苏达那木达尔济、何文章、龚子全（亦叫“龚梅林”）、王宪中（曾任绥东县财政科长）等人，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在开鲁予以拘留。马老排也被捕入狱。对此，奈曼旗不少较有名望的人士去开鲁交涉，强烈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日本人生怕夜长梦多，在审讯又毫无所获的情况下枪杀了马老排、龚子全、王宪中等人，这更加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他们一方面慑于奈曼民众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为进一步追查八仙筒事件的线索而对苏达那木达尔济、何文章未下毒手。同年各押解到长春（当时叫新京）监禁。

《满州国现势》康德四年版上反映，康德三年（1936

年)“各蒙旗旗长、参事官名单”中载:兴安西省“奈曼旗旗长:缺,参事官:关日猛”正是指苏达那木达尔济被监禁期间。直到康德三年冬,伪满政府正式宣布,撤销苏达那木达尔济奈曼旗公署旗长职务,释放回旗。自康德四年(1937年)起,哈斯宝封命任奈曼旗公署旗长职务。

苏达那木达尔济对日本人解其职务是怨恨或对其刀下留情而感恩,他人是不得而知的。但有一点是可以断定:他明白了自己大势已去,政坛上再没有他的表演余地了。所以,他从长春获释(何文章也一同放回)回旗后便退避三舍不问国事,在其北仓住所过上了与世无争的日子,一直闲居到伪满垮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达那木达尔济再度出山,在奈曼政坛上又活动了一个短暂的时期。



奈曼旗郡王玛什巴图尔传略

希儒博

玛什巴图尔（？——1905）于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九月，袭昭乌达盟奈曼旗札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爵，是本旗历史上的第十三任札萨克，系先王萨嘎拉之次子。

玛什巴图尔原名拉布丹。他粗豪强悍，能骑善射，枪法出众。因为“玛什”指枪栓，“巴图尔”意为英雄好汉。所以，人们就叫他“玛什巴图尔”表示“神枪英雄”之意。从而他的原名就鲜为人知了。

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肆宣扬喇嘛教，以宗教迷信笼络民心，欺骗民众，企图削弱蒙古人的反抗意志，这是他们一贯的策略。他们一方面以喇嘛教的“圣洁、高尚”迷惑人心，另一方面以发放度牒免捐征税为诱饵，发动大批蒙古族青少年削发为僧，争先恐后地去当喇嘛。仅以奈曼王室为例即可见一斑：

玛什巴图尔郡王的长兄占布拉多尔济是本旗较大的喇嘛庙——波日和硕庙（安乐寺）第四世呼毕勒罕葛根（亦叫活佛）；玛什巴图尔王共有六个儿子。其中长子舍冷旺宝（玛王原配福晋，达尔罕王旗卓里克图亲王之女禹吉所生）转世呼毕勒罕被本旗波日和硕庙奉请为该庙主持——第五世，也是末代呼毕勒罕葛根，继承了他伯父的钵；次子苏珠克图巴图尔承袭奈曼郡王爵职，也是禹吉所生；三子特古斯阿拉坦胡雅嘎是玛王侧室，本旗箭丁阿拉他斯迪之女谢氏所生，被封

为辅国公；四子是玛王续弦福晋、北京宗室橐贝子之女所生，自幼故去；五子苏达那木达尔济亦是续弦福晋所生，曾为本旗大沁庙喇嘛，伪满时期首任旗公署旗长；六子古鲁巴斯尔是谢氏所生，为大沁庙喇嘛，专管庙仓经济的“六爷葛根”。这样，玛什巴图尔王六个儿子竟有三个是喇嘛，可见其对喇嘛教的虔诚。

奈曼旗在历史上曾修建过二十四所喇嘛庙，其中有五座是在玛什巴图尔任期内，不惜重金修建竣工的。它们是：

于光绪三年（1877）建成的奈曼旗王室陵寝庙—孟根庙法名“功成寺”；

呼拉斯台庙也是同年竣工；

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的敖来哈日盖拉庙俗称“癩喇嘛庙；”法名“法诚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成的乌力吉砬石庙”

光绪二十六年所建成的索布日根苏莫亦叫“塔子庙”法名是“尚经寺”。遗憾的是因为历史的变迁这些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了。可谓幸存者的建筑那就是由奈曼札萨克，驸马王德木楚克扎布生前始建，直到玛什巴图尔王即位初年才竣工使用的“奈曼王府”了。它座落在大沁他拉镇，现已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整修一番后，竟旧貌换新颜，再现了本来面目。游览参观者络绎不绝。这座王府是仿照达尔罕旗卓里克图亲王府第建造的四合院住宅，距今已有近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了。

玛什巴图尔郡王大量建造庙宇，大批发展喇嘛，对于蒙古民族而言是一件可悲的事情。然而，喇嘛在庙上可以学藏文、蒙文、宗教理论、医药知识或一些建筑艺术，从这一点，它对发展蒙古民族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喇嘛当

中确实也出现了很多学者、名人。彼时为呼毕勒罕葛根的古布拉多尔济经过多年的研究，在藏医、蒙医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他编著了《蒙医正典》一书，为蒙古医学、药学的发展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了近代著名的蒙医学家。这就是具体例子。

玛什巴图尔郡王也很受清廷器重，光绪六年二月，清廷为玛什巴图尔赏戴三眼花翎，封为御前行走，前引大臣。光绪十五年正月（1889.2）因光绪皇帝“大婚礼成，以彰庆典”而为玛什巴图尔等赏用紫缰；后来，于光绪十八年十一月（1893.1）朝廷准奏热河都统奎斌的“查明剿匪出力各旗蒙员，请量予奖叙”和“查明剿匪阵亡索图、昭乌达盟各蒙员请分别议恤”的咨呈，嘉奖奈曼札萨克玛什巴图尔以“平乱有功”晋升多罗亲王衔

在玛什巴图尔郡王任期内，奈曼旗曾发生两起较有影响的事件。其一是金丹教民骚扰奈曼；其二是王爷卖地民众抗争。

光绪十七年十月（1891.11），朝阳“金丹教”教民起义这年是辛卯年，所以也叫“辛卯之乱”

金丹教教民起义，教徒们四处纷扰，“胁汉人为匪，遇蒙人则杀，占官署、毁教堂、蹂躏甚惨……”敖汉、奈曼、翁牛特、土默特、喀喇沁等诸蒙旗无一幸免，均受其害。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所到之处皆成废墟。彼时，奈曼旗札萨克郡王玛什巴图尔不畏强暴，率领旗属箭丁，配合官军（奉天提督左宝贵所属总兵张永清部当时正驻防鄂尔图板）全力以赴，屡战教徒，最后在本旗哈他海庙附近（今衙门营子苏木）平息了骚扰奈曼的教民之乱。事后，于同年十二月玛什巴图尔向热河都统衙门并转朝廷的咨呈中写道“朝阳教匪于

十月初十日起衅，烧毁敖汉贝子府，十五日窜入奈曼旗界。其中约有四五十名先行占踞札萨克衙门，所有庙宇、房产、财物、档案均被烧毁。并将旗备存仓粮军械抢掠一空。幸蒙奉直官军剿除逆匪。现在该旗被难台吉壮丁十室九空。”热河都统在转奏咨呈中称“该郡王无力救济，恳请代奏，恩施赈恤。”光绪帝准奏“著李鸿章，奎斌飭属筹款，妥为赈抚”。是年十二月（1892.1）清廷“赈热河被匪灾区，凡敖汉等五部八旗为银十七万两有奇，全济民。”继而于光绪十八年正月（1892.2）“拨库帑五万两于热河，赈敖汉、奈曼两旗蒙古贫民。”翌月（1892.3）“拨户部银五万两，续赈敖汉、奈曼各旗。”为此，于同年十一月奈曼札萨克郡王玛什巴图尔以平息骚乱安抚地方有功而受到清廷嘉奖，晋升为多罗亲王爵。

光绪十八年，对于玛什巴图尔王，可以说是悲喜参半的一年。所谓“王爷卖地民众抗争”的事件正发生在他晋升亲王的时期。

早在光绪十一年十一月（1885.12）清朝政府就批准了热河都统谦禧所奏“请将蒙古玛什巴图尔旗空闲牧场开垦，以期得租济赈”的咨呈，但是始终没有放垦，不知何故。

到光绪十八年，即一八九二年，因上年被教民烧毁抢掠而旗财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虽有朝廷赈济但也是杯水车薪，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入不敷出的局面。加之，玛什巴图尔王在京当差时挥霍无度，债台高筑更是雪上加霜。为摆脱这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七年前开垦牧场以租济赈的旨意，决定出卖本旗布洛斯格他拉（今敖汉下洼到大沁他拉一带）叫来河两岸的丰美牧场，开荒种地，面积为三百六十顷。这等出卖“领土”之事，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本旗民众的

强烈反对。下等台吉却登和平民孟可将生死置之度外，代表全旗四万余人民的意志，提出了强烈抗议，据理力争，执意不出卖旗地。但是，玛什巴图尔王违背民意，强令出卖。同时，命令王府卫队武力弹压。他以“聚众闹事，犯上作乱”为由，非法枪杀了却登，把这一抗争正义行动强行镇压了。此事发生后，玛什巴图尔王在奈曼旗是失心于民，声望急剧下降，处境日益困窘了。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1896.2）玛什巴图尔郡王因病辞去御前行走、前引大臣的职务，从京师返回奈曼。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7）病逝，任奈曼旗札萨克郡王职凡三十五年余。



年轻的札萨克——苏珠克图巴图尔

希儒博

苏珠克图巴图尔（1890—1926）于清末民初出任奈曼旗第十四任札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他是先王玛什巴图尔次子，玛王原配福晋、达尔罕王旗单里克图亲王之女禹吉所生。

清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05.7），玛什巴图尔病故。因为玛王长子色冷旺宝（亦禹吉所生）已经出家充当了本旗波日和硕庙呼毕勒罕葛根了，所以，苏珠克图巴图尔便无可非议地承袭了旗札萨克王位。时年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飞黄腾达了。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3），清廷命奈曼札萨克多罗达尔罕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为御前行走；同年六月（7日），赏戴三眼花翎，时年十九岁。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共和政府。民国元年八月（1912.8）民国政府公布《蒙古待遇条例》规定：“各蒙旗王公原有的管辖治理权一律依旧；内外蒙古各汗、王公、台吉的世爵位号照旧不变”等项。虽然清朝末代皇帝逊位，王公们在清廷的职务随之罢免，但苏珠克图巴图尔却由多罗郡王爵晋升为和硕亲王爵。十一月，授予二等嘉禾章。

同年，民国政府所遣赴昭乌达蒙旗慰问使周正朝在上报

大总统，国务院蒙藏局的咨呈中声称：“与奈曼王筹商订立合同，将树筒荒地（五十里宽，七十里长）租出开垦，候春暖时设局招垦以便移民种植”。但究竟何时租出开垦这一大片荒地尚待查证。

民国二年十月（1913.10），苏王被任命为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锡林郭勒四盟宣慰使。

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政府将绥远、热河、察哈尔蒙古地方改为特别行政区，用以代替盟旗制。奈曼旗划归热河行政区都统管辖。热河都统在辽河以南的各蒙旗及各县分别设置“努图克”和“区”制，重新区划。彼时，奈曼旗划成五个汉区和七个蒙区（即努图克）。各区和各努图克分别由绥东县署和奈曼王府统辖。任命区长和努图克达，取代了历来的扎兰职务。然而，因蒙区大都为蒙古人所聚居，况且实行箭佐制历史较长。所以，虽然撤销了“箭佐制”，但实际上是名无实存，在旗内仍保持了原来五十个箭十二扎兰的区划，一直到伪满时期。随着旗内行政区划的变更，奈曼王府卫队由原来二十五名增加到一百人。各努图克设正式警兵三十人，保甲三十人用于维持蒙区治安，次年十月，汉五区亦各设一个警察分驻所，配备马警四十名以半数驻所，统一由绥东县警察事务所（驻县公署所在地库伦镇）节制。

民国四年（1915）一月，命苏珠克图巴图尔授用黄纓。

二月，授予一等嘉禾章。

同年八月，任昭乌达盟盟长职，时年二十五岁。

民国五年（1916）因镇抚巴布扎布党徒有功而授予亲王双俸。六月，授予一等文虎章；十二月，以宣慰各蒙旗有功而任命为昭乌达盟备兵札萨克（兼）。

民国六年（1917）七月，被选任参议院议员。

民国七年（1918）因宣抚奉天、热河各省各蒙旗之功，命苏珠克图巴图尔为遐威将军。直到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苏珠克图巴图尔平步青云的黄金时代，此时尚不到三十岁。

民国十三年（1924），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列宁缔造的联共（布）大力支持下，喀尔喀蒙古（即外蒙）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周围，推翻王公贵族的封建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使北洋政府惊恐万状，生怕内蒙古还要“闹”，对其统治不利。安抚内蒙势在必行。于是乎，蒙藏院就以“蒙事紧急，赤党滋蔓，特召集蒙事会议筹商防止办法”为由，经大总统批准，于三月二十日在北京召集了蒙事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蒙藏院总裁，企事、参事，翻译官；蒙古宣慰使及宣慰使公署官员；内札萨克六盟盟长（副盟长或盟务帮办）和盟长全权代表，共三十六人。时任昭乌达盟盟长的苏珠克图巴图尔以正式会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并任提案审查会审查员。

苏珠克图巴图尔提出了“收复外蒙建议案”，“请向热河都统交涉免除蒙民商捐并保留巡警管辖权案”及“准蒙民在各旗境内自由居住谋生案”等若干提案都在会上进行了审查和议决。其中在“收复外蒙建议案”中苏指出“收复外蒙统一蒙族统一国家诚为当今之急务矣，兹将所拟办法归纳四项：一曰责成蒙人以宣慰之；二曰精练蒙兵以镇慑之，三曰若不得已而用兵切勿毁其庙宇；四曰若不得已而用兵，必须多设翻译（即翻译一编者）”并且一一作了较详尽的说明。审查会对本案和类似本案的三个提案一并审查。写出了审查报告。然后由大会依据审查报告予以公决：其大意为“建议

政府由每盟编练蒙军二千名。以一千名自卫，一千名备收复外蒙。其枪弹概由政府发给。自卫军队饷项仍各盟旗自行负担，至收复外蒙军队则饷项应归政府发给之。”

会议之后，各盟即着手组建自卫军和收复外蒙的预备军。配备枪支弹药投入训练。

民国十三年（1924）8月，民国政府任命苏珠克图巴图尔为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锡林郭勒四盟警备总司令。是年九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入关，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直军全军复灭。冯玉祥与奉系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此时，张作霖的实力更强大，权力更集中了。后来，他闻讯林西会盟之事唯恐王权集中日后有变，便下令取缔四盟警备司令部，免去苏珠克图巴图尔警备总司令职务令其回旗。张作霖仍不放心，就派遣奉军“黑马队”二千余人盘踞奈曼武力弹压。同时命汤玉麟部张连同旅进驻开鲁以防蒙旗“不轨”。

由于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耗费了大量资金而急待补充军需。他强令奈曼王筹措十万支枪的军费开支。当这笔巨款无从筹办时，张作霖（通过张连同）又生一招，强制苏珠克图巴图尔将本旗老哈河，叫来河流域的大片肥沃土地出卖以付军费。苏王对此无理要求坚决反对而软磨硬顶，交涉了两年多时间直到他病逝始终没有答应。后来王府（当时王位继承人尚未确立）抵不住奉系军阀的压力只好以四六分成的条件勉强同意出卖土地。自1927年开始丈量招垦，这是后话。

苏珠克图巴图尔在其任期内一般是常驻北京，很少亲政旗务。特别是在北京娶了两个汉族福晋后，更是尽情享乐，

大量挥霍了钱财。极大地增加了本旗的财政开支，加重了旗民的负担。

1926年9月，当北伐军占领武汉时，冯玉祥摆脱了张作霖，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毅然将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此，奉系军阀张作霖是不能容忍的。而当时在北京的苏珠克图巴图尔却拥护和声援了冯玉祥的行动，更加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几年来，苏一直与张对立，对自己后果如何是不能不考虑的。苏珠克图巴图尔生怕张作霖对他下毒手而躲进英租界地避难一个时期。此间，他派人向张作霖送了一大笔钱买通关节才得到“既往不咎，但不准常驻北京，限期返旗”的答复。在这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身偕两妾忍痛离开了北京。在归途中，因他又气又累病疲交加而于民国十五年十一月（1926.12）某日暴病死于本旗波日和硕庙。享年三十七岁。

当苏珠克图巴图尔的灵柩送往王府陵寝庙一功成庙安葬的当天，其一宠妾吞服大量鸦片烟土自尽，以身殉情。为此，将其遗体安葬在苏王坟旁修立“贞节碑”以示尊重。另一妾江氏，同其五叔子苏达那木达尔济同居，据说为丈夫争得奈曼王位还出了不少力。

可以说，苏珠克图巴图尔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札萨克。他才华出众，在旗民中以至在整个内札萨克四十九旗都颇有威望。但是，他在奈曼执政二十载，正处在中国社会之大变革时期—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军阀混战，确属政局动荡，错综复杂的年代。他年轻负重任，缺乏应有的官场阅历和治理经验，以至后来锐气颓废，束手无策。历史发展规律和他本人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没有改变奈曼旗多灾多难、水深火热状况的回天之力。《兴安西省奈曼旗事情》一书中有这样

一段话：“他（指苏一编者）身居要职，常驻北京，对旗内政务不闻不问，加之热河省政府的蚕食、吞并，旗民失去大量土地，以至移入汉民开荒种地占去大量草牧场。因而官民之间、蒙汉民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全旗财政亏损，入不敷出，经济贫困，民不聊生。对此，官运亨通，身居要职的旗札萨克是当有其责的。”这段所叙，大概就是对当时情况的较为切实的品评吧。



波日和硕庙及其末代

葛根——舍冷旺布

金长岭



蒙古勃兴时期，喇嘛教传入蒙古。1215年宪宗(蒙哥)皇帝招聘了西藏名僧八思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尊称八思巴为国师，并由八思巴制定了蒙古文字，之后便称佛教为喇嘛教。1313年元顺帝(妥懽铁木尔)时代和明代阿拉坦汗统辖的蒙古族地区人们都热心信奉喇嘛教，教徒遍布蒙古各地。

经过元明到清代以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收买民心，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防止蒙古再度兴起，便大力推崇喇嘛教，用来充当麻痹、统治蒙古族人民的工具。只要有点因由就大兴土木，建造庙宇，招收喇嘛。十八世纪初，奈曼先后修建庙宇二十四所，喇嘛达二千四百多名。

喇嘛教传入蒙古的数百年间，大量的蒙古族青年当了喇嘛，人口逐渐减少，人民趋向愚昧，生活更加贫困。

清朝在修建庙宇的同时，为了发展喇嘛，大肆宣扬喇嘛教的至高无尚。采取发放“度牒”的措施，诱惑人们当喇嘛。喇嘛在庙里读几年藏经，达到标准就发给“度牒”(即证书)。有

了它就不负担国家一切徭役和税收，也不出壮丁。如果一家出三个喇嘛，那就更了不起了。当时在蒙古族人民的心目中，喇嘛是唯一的“至尊”。

喇嘛庙气势宏大，喇嘛的权威甚至超越王公贵族。广大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家里只留一名继承人，其余男孩都送到庙上竞选当喇嘛。如奈曼旗第十三任王玛什巴图尔有六个儿子，除老四从小夭亡，老二苏珠克图巴图尔是奈曼十四代王，老三阿拉坦胡牙嘎是辅国公外，老大、老五、老六均是喇嘛。

蒙古人之所以信奉喇嘛教，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和来世的吉凶祸福都寄托在喇嘛教上，喇嘛教控制了蒙古族人民的意志和精神世界。当上喇嘛的感到无比幸福，一生的志向是赴五台山、西宁塔尔寺和西藏拉萨参拜修行，认为这样来世就更幸福。结果清代蒙古地区的喇嘛人数急剧上升，几乎占男性的半数。

波日和硕庙兴盛时期在册的喇嘛达七百名，直到末期（1936年）还有279名。

波日和硕庙（安乐寺）建于1813年4月（清嘉庆年间），原址在今东明镇东南，塔甸子北、文革前留存的塔甸子的塔就是庙上所属。东明镇的原名浩沁苏木即为旧庙的意思。

该庙建立在东塔子子村北的白沙坨子边。白沙坨庙又叫查干特门扎拉（蒙古语为白骆驼坨子），据传建庙前有一名喇嘛牵着白骆驼一路念经舍善，传经拜佛经由这里，白骆驼走到白沙坨上就趴下死了，后来，旗民为纪念白骆驼建了这座庙。1812年叫来河河水泛滥，将庙冲毁，该庙才移建于波日和硕。

该庙前后共有五代葛根（活佛）：

第一代活佛是建庙初期一个老喇嘛，卒于浩沁苏木（传说他是从内地来的和尚）。

第二代活佛“转世”于旗内平民家庭，卒于波和硕庙。

第三代活佛“转世”于旗扎萨克王公贵族家庭，卒于波日和硕庙。

第四代活佛是旗扎萨克萨喀拉的长子古巴拉道而吉，卒于波日和硕庙。

第五代活佛是旗扎萨克玛什巴图尔（拉布丹）的长子舍冷旺布，卒于呼和浩特。

第二、三、四代葛根的尸体，1947年土改时还在波日和硕庙“沙日林”苏木（灵堂庙）里存着，土地改革时才被毁弃。第五代活佛舍冷旺布（别名丹毕嘎日布，丹毕道敖日布，溥尔济吉特代）于1886年出生在奈曼旗大沁他拉，是第十三任扎萨克玛什巴图尔的长子。八岁时被请到波日和硕庙当了葛根。后来该庙大喇嘛席京会同青海塔尔寺斋巴葛根，五台山的章家葛根赴西藏拉萨，向达赖喇嘛请示，批准舍冷旺布为正式葛根。

舍冷旺布简历如下：

九一十四岁，在庙里学经。

十五一二十三岁，在绥远西七百里的巴达嘎尔庙向丹森喇嘛拜师学经。

二十三岁一二十七岁，在波日和硕庙，接受群众的磕头拜礼，并收取金钱财物。

二十八一三十三岁，又到巴达嘎尔庙学经深造。

三十四一三十五岁，在波日和硕庙。

三十六岁又去巴达嘎尔庙，在学经的同时，还向巴达嘎

尔庙的丁和尔及甘珠尔两葛根传授佛经。一九四〇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舍冷旺布取得了佛学“都染巴”学位。

四十四—五十一岁，赴印度取经，回来时取道香港、北京返到波日和硕庙。

五十四—五十五岁，到新京（长春），担任伪满洲国喇嘛宗教团体的教务部长（都冷“召宝”）。办公地址在阿鲁科尔沁旗汗苏木（皇王庙）。因实行轮换制，只任职一年，五十七岁时离职。后由兴安北省省长沁巴图请去继续从事佛教活动，直到祖国光复。

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舍冷旺布于1946年8月16日，随同胞弟苏达那木达尔济、塔尔巴巴音到阜新蒙古贞一带陶斯营子庄潜住。同年10月10日，驻沈阳国民党东北军总司令杜聿明，委派吉日嘎拉动员全体喇嘛归顺。正当舍冷旺布犹豫不决之际，嘎拉僧葛根等前来动员他们返回内蒙古地区，并传达了乌兰夫同志的邀请和保护宗教人士的指示。经过再三考虑，他毅然决定同胞弟苏达那木达尔济分道扬镳，奔向光明。1947年4月，由嘎拉僧葛根率领二百一十多名宗教界的著名人士、活佛、呼毕勒汗，返回内蒙古地区。之后，协同麦德尔葛根、波日和硕庙葛根、察干葛根、敖来海力喇嘛、胡芦斯台喇嘛等于1949年5月1日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当时舍冷旺布葛根，向自治区政府贡献了二百块银大洋和一些元宝，另加全鞍鞴好马一匹，表示对自治区政府成立的拥护和祝贺。

舍冷旺布做为出身贵族家庭的佛教界头面人物，以大局为重，同胞弟决裂，并参与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这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上层人物，宗教界人士和广大蒙古民族的影响，是很大的，许多人都效仿他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到维

护祖国统一、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来。

舍冷旺布从1947年便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历任顾问、参事等职。195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搬迁到呼和浩特后，他又出任中国佛教协会内蒙古分会副会长，继续从事佛教活动。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参与自治区大事的协商研讨。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舍冷旺布遭到了审查、批斗，他的经卷、医药著作和资料亦被焚之。后来，因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折磨，在呼和浩特小召庙去世，终年八十二岁。遗体火化后，骨灰由阿木扎力嘎拉收藏了三四年。后来，海如布喇嘛又把其骨灰安放到舍冷旺布曾经深造的地方——巴达嘎尔庙。

舍冷旺布自幼年走出家门，进入寺庙专心致志学习藏文，研究经典，二十多年来，不畏艰险，为振兴和发展喇嘛教、传播佛经，东奔西走，不仅到过巴达嘎尔庙、青海塔尔寺、西藏拉萨，还不远万里去了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他不但通晓蒙文，而且精通藏文，在继承和发展藏蒙医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波日和硕庙历史以来就有门巴拉全即医学科），他继承占巴拉道尔吉的医学医术，亲自培养了庙上的旺代，沙巴敖的满特嘎，小台吉白的却那木得嘎，东胡芦斯台的巴乙尔，大台吉伯的舍布各扎布等有名的蒙医。后来，这些人在奈曼旗东部广大劳苦牧民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舍冷旺布葛根是位爱国爱教并在宗教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奈曼旗文史资料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1 7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